

5061/5600.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UB  
JUL 28 1959

# 中國語文

一九五五年

五月號

35.

# 中國語文 一九五五年五月號 目錄

## 討論和研究

- 談談拼音文字的標準音問題……………江 成 ( 3 )
- 什麼不是詞兒——大于詞兒的不是詞兒……………林 漢 達 ( 6 )
- 詞類大系——附論“詞組”和“詞類形态”……………黎 錦 熙 ( 9 )
- 關於漢語的詞和漢語單音節說……………鄭 林 曦 ( 14 )
- 關於中國語拼音化問題……………實藤惠秀 ( 19 )
- 漢字拼音化與漢字簡化……………高 元 白 ( 21 )
- 對漢字改革問題的幾點體會……………王 均 ( 22 )
- 我對少數民族語文工作的幾點體會……………鍾 秀 生 ( 24 )
- 鎮寧民族中學解決語言隔閡提高教學效果的經驗……………任 以 均 ( 28 )

## 拼音文字和漢字的比較

- 蘇聯打字排鑄機介紹……………陳 越 ( 31 )

## 語文知識講話

- 音位和音位學 (下) (語音學常識之十四)……………田 恭 ( 34 )

## 報道·消息

- 北京語言學界茶話會座談漢語規範化問題…………… ( 39 )
- 關於詞類的討論…………… ( 40 )

## 信 箱

- 我主張字母國際化……………秋 穎 ( 33 )
- “停”是詞嗎?“止”不是詞嗎?……………潘 山、呂 叔 湘 ( 43 )

## 語文筆記

- 語言的形態學分類法 (語言學名詞選譯)……………力 山 譯 ( 27 )
- 我們需要一個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周 有 光 ( 30 )





# 談談拼音文字的標準音問題

江 成

我們討論標準音問題爲的是給拼音文字確定一個語音根據，也爲的是給將來的民族共同語音尋找出一個發展的基礎。

拼音文字的語音根據和共同語音的發展基礎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也應該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不能說兩者完全是同一個東西。

共同語音的發展基礎是已經存在的東西，我們的所謂尋找實際上就是經過討論取得一致的承認；承認了它就拿它作爲語音根據來製造拼音文字。我們決不能找一個不可能作爲共同語音的發展基礎的方音來作爲全國拼音文字的根據。兩者的關係之所以密切，之所以應該基本上一致，道理就在這裏。

拿某種方音作爲語音基礎，並不等於把某種方言中所有的字音毫無選擇地反映到文字上去。即使在某一地點方言中，語音也是有些混亂的，自然主義地反映這些語音並不是在確定標準音，而是在製造文字的混亂。同時，在某個地點方音中，一定有些比較偏的成分，我們在整理這個語音時，應該尽可能剔除其中的偏僻成分，保留其中更符合一般規律並且和其他方音比較一致的成分。所以，拼音文字的語音基礎“活語音”還是可能有一些距離的。

此外，文字還有固定字形的要求，爲的是區分同音詞。方言甲的同音詞，在方言乙可能是不同音的，不妨用代表方言乙的音的符號來區別方言甲的同音詞。文字裏有了某些音素符號，口頭上也不一定要把話說出來。文字之所以不一定完全和語音一致，道理就在這裏。

不過，我們並不是在主觀主義地製造什麼將來的共同語音。大家知道，語音也是歷史的範疇，將來的標準音或共同語音和現在標準音可能不相同，但是我們不能跑到歷史的前面去替將來的標準音或共同語音製一套書面形式；儘管語音是在變動中，但是我們所截取的還是某一方音的現在的斷面；截取之後，再作整理加工，成爲標準的書面語。而且我們只能這樣做，人工語音是行不通的。

標準音只可能以地點方言的語音爲基礎。現在大致上贊成以北京音作爲標準音，這就是看到了共

同語音的發展基礎和現在文字的語音根據有很密切的關係這一點；贊成以北京音爲基礎，這就是看到了兩者的不尽相同這一點。

現在我想談的，是關於書面標準音的基礎的一些具體問題。

## 一、以“北京西城話”爲標準的問題

有人這樣說：“事實上，現在北京西城一帶的語言，不僅是我國若干方言集中融合後的勝利者……已經把他叫做‘北京官話’；實際上就是我國封建社會時代的全民共同語。現代全民族的共同語也會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現在全國性的集會發言和廣播用語、文學、歌曲等，都以他做標準”<sup>①</sup>。

這段話是很有問題的。

首先，這段話不符合實際情況。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了解到“北京西城話”就是“我國封建社會時代的全民共同語”的說法。可能作者所說的“共同語”是指的“標準語”，可是好像也沒有人說過以“北京西城話”作爲標準語的話。相反地，倒有一些老年人說，過去北京某些人是崇尚東城話的。過去的那些人認爲城南（即長安街以南）的話“不純”，西城的話太“貧”（即不大方）；城裏又輕視西郊（藍靛廠一帶）的話，認爲那是“破旗人”的話。這些當然都是偏見，大概這種偏見只有被時代淘汰了的某些人才會有。儘管可能另外有些人說過“西城話”是標準語，那也只是某些有偏見的人的武斷，是不符合事實的。誰都知道，廣播和歌曲裏是沒有什麼土話的；至於文學作品，據一位了解北京話的作家研究，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影響比較大的小說只有一部《兒女英雄傳》是用北京西城話寫的（《紅樓夢》就不是用北京西城話寫的）；現代的比較著名的文學作品也沒有典型“北京西城話”的創作。統觀現在的文學作品，所謂“北京西城話”的痕跡是少得幾乎找不到的。所以，作者那些話只能看作主觀的臆測。

從語法方面來說，北京西城話似乎沒有什麼特殊

<sup>①</sup> 見1950年9月3日《大公報》張銳光的《斯大林論語言學對於中國語文問題的啓示》。

的地方。

从詞彙方面來說，北京西城話大致說來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作者單指出以“北京西城一帶的話”爲標準，而不提“东城一帶”或“城南一帶”，儘管他在後面舉出的例子是“廣播、文學、歌曲等所通用的語言”。但我想作者實在的意思可能另有所指，指的是全國別的地方或北京其它地區所沒有而北京西城一帶所特有的詞兒。北京城內和附近四鄉的確有些不統一的詞兒，就是东城和西城之間也確有極其少數的詞兒是不同的<sup>①</sup>。在這些詞兒裏，北京西城話到底有什麼可取之點，也很難說。即使這些詞兒有的可能吸收到普通話裏去，也不能就此說是“以北京西城話”爲標準。因爲“吸收語彙”和“定爲標準語”總不能看成一件事情。

剩下的是語音。

我們選擇北京音作爲標準音是因爲它是北方語音的中心典型。華北和東北各地雖然都屬於北方話區，但各地之間的語音還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爲了建立標準以便於創製文字，所以拿北京音系作爲北方音的活的地點代表。

北京音系是北方音中的一種。拿北京市爲中心，直徑一百四十里左右的圓圈裏，絕大部分的語音（包括聲、韻、調類和調值）沒有多大差別，只在個別地方，調值的差別比較顯著（即北京人所說的“怯”），這圓圈就是北京音系的核心<sup>②</sup>。在這個核心裏，個別字音是有些差別的。聲母方面，如北京城裏的“擇（ze<sup>③</sup>，白話音 zhai）”“冊（ce，又音 chai）”“所（suo）”，在四鄉有些地區還保留着 zhe, che, shuo 的發音；韻母方面，如“豁（xuo）”“和弄”的“和（xuo）”在有些地區是 xe；聲調方面，某些古入聲字，北京從前讀作上聲而現在改入其它三聲的，如“職”“室”“國”等，某些地區還有一部分字保留着上聲。這些差別儘管存在，爲數很小，不足以破壞整個音系。除了這種差別之外，一個精通北京話的人，還可以聽出城內和城外的細小的語音分別，但這種分別並不是拼音文字所能表現的。

在城裏，东城音和西城音，更沒有音系方面的不同。個別字音上的不同，如“甬”讀作 beng，又讀作 bing 之類，在各城之間也有，但是不多。而且我們也不必因爲某些個別字音上的差異，而在原則上確定以哪一城的音作爲標準。因爲個別字音可以在逐字審音的時候分別選定。

大体上說來，現在的北京音已經是一種混雜音，可能是以內城爲主体包括四鄉音的混雜音<sup>④</sup>。至於純粹的西城音，據說在一些世居西城的家庭裏還保留着。我曾經向一些东城人和西城人詢問了一下關於各城音的

區別的問題。老年人大致還能肯定它們有區別，但青年人則大多數回答不出什麼來。甚至有些青年人還得我所提到的這種區別對他們是一件新聞。連北京人都感覺不出的區別，我想我們更不必去區別它們了。

當初國語運動“旨在正音”，尚且不以“北京西城音”爲標榜，在《國音常用字彙》的《本書的說明》裏，對字音的選擇標準是說得相當詳細、相當全面的，也沒有提到過“北京西城”的字樣。現在我們“旨在創製全國人民使用的拼音文字”，看中的應該是北京音的共通性的一面，而不是它的偏僻的一面。因此，是共通性小於北京普通音的方音（應該說是土音），我們就更不應該去考慮了。

因此，我們覺得“以北京西城話爲標準語”這句話是提得沒有必要的。

## 二、活的語言和土話

拼音文字應當以活的語言爲根據，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現在談的是關於以活的語言爲根據的一些具體問題。

北京方言裏有很多發音比較特殊的詞兒。例如“帶”是 chueichu(1-)或是 chueichuo(1-)<sup>⑤</sup>，“我們”是 mme(3-)，這些音可以叫做土音。有些土音詞可能是“快說的話”的產物，不過已經不一定在“話”裏表現，差不多已經是固定了的“詞兒”了。我們的拼音文字雖然拼寫活的語言，可是這種土音詞是不應該錄的。

另外還有些土音詞，已經收錄在《國音常用字彙》

① 有些日用器具的名稱也不完全一致。例如一種用梁桿做的平盤，在北京城內和四鄉至少就有下列這些名稱：鍋蓋、鍋淺兒、鍋拍兒、鍋篇兒、淺子（又指蔑盤）、篋盤兒、排打兒、蓋板兒、蓋簾兒、蓋點兒。這種現象很有趣，可能因爲這種器具各地人自造自用或就地買賣，所以名稱很歧。在城裏，也有不統一的詞兒，不過各城人彼此都能了解，如“水桶”和“水甕”。有些過去不統一的詞兒現在已經統一的，如“扁食”“煮餛飩”“餃子”三個名稱現在只用“餃子”。

② 這是個大概的說法。實在，北京以東說京音的地區比較小，以西比較大。而且京音分佈情形也比較複雜，東的順義說京音，但它附近有些鄉說“怯音”；西南的涿州說音，但在北京與涿州之間却有些地方說“怯音”。

③ 注音照拉丁化方案唸，下同。

④ 不說“混合音”而說“混雜音”，是因爲各地音系本質就是基本上一致的，現在只是個別不同的“詞音”傳進了北城，造成了一些歧音詞而已，如“駱駝”稱 luotuo 又稱 lotuo 之類。

⑤ 用“1、2、3、4”及“-”代表陰平、陽平、上、去、輕聲。



的，如讀 tui(1)的“太”，讀 xan(4)的“和”<sup>①</sup>之類，我們也最好不收錄。我們把“太”拼作 tai(4)，把“和”拼作 xe(2)，也不能看作不是以“活的”北京音為根據，而且 tai 和 xe 比 tui 和 xan 要普通得多。

至於對那些有白話和讀書兩種音的字，我們最好不要籠統地規定它們應該讀白話音或讀書音。實在來說，“白話音”和“讀書音”這兩個名稱有時已經不大適用了。例如“色彩”的“色”是 se(4)，“掉色”的“色”是 sai(3)；“爪牙”的“爪”是 zhao(3)，“爪子”的“爪”是 zua(3)；“恐嚇”的“嚇”是 xe(4)，“嚇唬”的“嚇”是 ha(4)，不論讀書或說話都是如此，我們在確定某些字的發音時，應該根據活的詞兒（或仿語）來確定。就說，某個字在某個詞兒（或仿語）上讀什麼音，就該定為什麼音。否則的話，拼出來的詞兒會不倫不類的。

當然具體問題並不這樣簡單。有些字音到底是白音還是土音是很难分的。對這種字音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另外，按照以活語音為根據的原則，對已經普遍用的其它方言裏的詞兒，也應該照活語音來拼。如“鹹巴冷”不應該拼成 xianbaleng；“軀岔”不應該拼成 angie（至於應該照上海話拼成 gaega，還是照長沙拼成 gangai，那再說）；“垃圾”則應該照北京音拼成 lagi，而不是 leqseq。對待北京本地的詞兒，如果用，也應該如此，“敢莫”應該是 guanme(2-)，不 ganmo(34)，“排子車”應該是 paizhe(3-1)，不 paizhe(2-1)。

總之，我們審定每個詞兒的讀音時，要注意避免對主義的偏向，也要注意避免脫離實際的偏向。絕主義就是沒有限制地採用偏僻的字音；脫離實際就根據主觀意圖定出口語裏所沒有的字音來（定形字另一個問題，下面談到）。拼音文字所拼寫的字音，除掉特殊情况外，應當是地點方言的活語音裏的比普遍的成分。

### 三、文字定形和語音的關係

以上所談的只是拼音文字的語音根據問題。現在談的是文字的定形問題。定形和定標準音本不是一件事情，但是在某些地方是有關係的，所以我們不妨把它談談。全面來談不是本文的任務，這裏只把形問題挑幾件和標準音有關係的約略談一下。

定形問題是建立文字體系問題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詞兒連寫的問題）。幾年以前我們提出了“結束符，建立文字”的口號，現在我們已經有條件來實現

這個口號了。

狹義的“定形”就是區別同音字。

同音字，照我個人的理解是聲、韻、調都相同的字（口語裏的詞），如“站”和“蘸”，“形式”和“形勢”之類。聲、韻相同而調不同的詞，如“天”和“田”，“直覺”和“知覺”之類，就是文盲也知道它們的發音不同，假如文字上不分出來的話，那種字最好叫做“同形字”。北京話的音節，區分了聲調之後一共有 1284 個<sup>②</sup>，我們統計同音字，應該根據拿這 1284 個音節拼出來的字來統計。

區分同音字的拼音式，最好也有語音的根據，不要毫無根據的製造拼音式。這樣，某些方言區的人在認字的時候才可以減少一些硬記字形的麻煩。

這樣做並不是在製造人工混合的語音，也不是在預造將來的標準音，只是為了區分同音字來製造定形字。儘管“西”拼成 xi，沒有尖音地區的人仍舊應當把它讀成 xi。入聲字也不一定照讀。因此，文字定形和以活語音為根據的原則並不違背。

在字的後面附上北方話裏的“兒”尾也是區分同音字的好辦法<sup>③</sup>。例如“話”和“畫”同音，後者就可以附上一個“兒”。在這裏，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兒化”，如“盤兒”“牌兒”都拼成 par；有人主張“附兒”，如“盤兒”拼成 panr，“牌兒”拼成 pair。照我個人的看法，“附兒”的辦法比較好。理由是這樣的：第一，可以區分一部分因為“兒化”而產生出的同音字，“盤兒”和“牌兒”就是個現成的例子；第二，其它地區不懂得“兒化”變音規律的人學起來比較容易；第三，北京人仍舊可以照“兒化”變音來讀，如 panr 仍舊可以讀成 par。所以“附兒”而不“兒化”也不違反以北京活語音為根據的原則。

以上談的是分化同音字的問題。

“定形”也可以包括實在的簡化拼法在內。拉丁化新文字的 mn(們)就是一個簡化拼法的例子。不過我這裏所說的“簡化”僅指略去一部分字的聲調而言。

（轉13頁）

① 仔細分析起來，xan(4)還兼有“搭配”的意思；tui(1)還僅有“過於”一個意思，不像 tai(4)的意思有時已經弱化成了“非常”。不過這種意思是不是能為外地人了解和接受，是個問題。

② 另有 47 個有詞無字的土話音節，如 shuen(2)、cei(4)之類，不計算在內。

③ 兒音是北方語音的音素。但為了使我們的拼音文字有更大的共通性，原則上可以說我們並不把兒拼寫出來，只在某些字上附“兒”，作為定形符號，所以我把它放在這一節裏來講。

# 什麼不是詞兒——大於詞兒的不是詞兒

林 漢 達

## 大於詞兒的語言結構不是詞兒

所說大於詞兒的語言結構是指短語、成語跟略語。

1. 短語不是詞兒。多音節的短語跟詞兒的區別是容易看出來的。例如：

你跟我(代名詞+連接詞+代名詞)

和平與民主(名詞+連接詞+名詞)

紅的花兒(形容詞+名詞)

從北京(介系詞+名詞)

到莫斯科(介系詞+名詞)

我想誰也不會把上面的五個短語連寫成五個詞兒的。可見多音節的短語比較明顯。如果我們說“多音節的短語不是詞兒”這麼一句話，我想反對的人不會太多。如果再來個限制，把這句話改成“多音節的帶介系詞或者帶連接詞的短語不是詞兒”，我想大家都會同意這一條的。可是雙音短語和名詞詞組(就是名詞短語)就不這麼簡單了，要劃分界限是比較困難的。我想試試說明詞兒和短語之間的界限，可是不能說有絕對的界限。

(1)形容詞跟名詞組成的短語。凡是真正用以修飾名詞的、名副其實的形容詞都是有獨立身份的詞兒，如果沒有特殊的原因，都應當跟它所修飾的、可以獨立運用的名詞分寫。例如“白的 馬”是兩個詞兒組成的一個短語，而不是三個音節合成的一個詞兒。那麼，跟“白的 馬”格式相同、意義相同的“白 馬”按理是兩個詞兒組成的一個短語，而不是兩個音節合成的一個詞兒。因為“白”這個形容詞可以放在某些別的名詞前面，仍舊保持着“白的”的意義，例如“白狗”“白布”等；“馬”這個名詞也可以用某些別的形容詞去修飾它，仍舊保持着“馬”的意義，例如：“黑馬”、“老馬”。

如果“白馬”不是專稱，而是等於“白的馬”，“白布”不是專稱，而是等於“白的布”，那麼，“白馬”、“白布”跟“白的馬”、“白的布”一樣是短語，而不是詞兒。這樣，我們不妨說：凡是形容詞跟名詞之間可以插入“的”字而意義不變的雙音結構都是短語。例如：

白馬=白的馬

黑狗=黑的狗

白布=白的布

紅紙=紅的紙

冷水=冷的水

熱茶=熱的茶

粗線=粗的線

大樹=大的樹

高山=高的山

小河=小的河

大風=大的風

大雨=大的雨

新書=新的書

舊鞋=舊的鞋

像這一類的短語(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獨運用的容詞加上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獨運用的名詞，中間以插入“的”字而意義不變)，一時很難大量地找到。從好幾本詞彙裏摘了一些，自己又拼湊了一些，可極大多數都不符合於上面所說的名詞短語的條件。因為如果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獨運用的形容詞加上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獨運用的名詞，中間一插入“的”字，失去了原意，那麼，這種雙音結構正符合於本文第一所說的複合詞的條件，應當歸入複合詞而不是短語。如果其中有一個音節不能單獨運用，那麼，這種雙音結構正符合於複音詞的條件，應當歸入複音詞而不是短語。

先說形容詞跟名詞組成的複合名詞吧。這種複合名詞是由兩個可以單獨運用的詞兒組成，連用着表一個概念，中間不能插入“的”字。例如“白”是個可單獨運用的形容詞，“糖”是個可以單獨運用的名詞，這兩個詞兒連用着的“白糖”是某一種糖的名稱而不“白的糖”的意思，因為“冰糖”也是白的，可不叫“糖”。所以“白糖”≠“白的糖”。

大門≠大的門

大葱≠大的葱

小腿≠小的腿

小米≠小的米

長城≠長的城

長蟲≠長的蟲

青菜≠青的菜

黑板≠黑的板

香水≠香的水

黃魚≠黃的魚

在雙音結構當中，至少有一個音節在現代漢語不能拆開來單獨運用的詞兒，應當歸入複音詞，因一被拆開，那個不能單獨運用的音節就站不住了。如“白金”不但不是“白的金”，而且其中“金”字在現代漢語裏是個詞素，不是詞兒，要作為單獨運用的詞兒就得說成“金子”或“黃金”。像這一類的詞兒再舉幾例子如下：

青春 大陸 單衣 單調 舊法 紅木 紅豆

紅棗 短波 假髮 公德 公民 公司 古跡

圓心 後母 平原 高原 內科 外科 中耳

外鄉 甘草 廣場 孤島 高潮 黑幕 恆心



這些都是我們在口語裏已經用慣了的複音詞。此還有帶文言性的雙音術語。文言單字在口語裏一般不單獨運用，因此，只能作為詞素跟別的詞素連為複音詞。例如：

本質	本性	複足	複眼	複葉	巨額	初版
優勢	要素	軟木	先天	後天	陽電	陰電
乾電	赤金	赤道	平角	寒帶	冷房	內臟
內閣	外殼	外僑	幼年	中年	古畫	公文

除了文言性的術語跟口語裏通用的複音詞以外，一種半文言的白話文中的詞兒不大容易處理。例如“舊衣”、“新襪”、“長凳”、“圓桌”等，說是術語吧，還沒有那麼專門；說是口語吧，口語裏又不大那麼。在口語裏“衣”、“襪”、“凳”、“桌”等單字是站立的，我們一般把它們說成“衣裳”（或“衣服”）、“襪子”（或者“襪兒”）、“桌子”。我認為這一類可能還有兩條出路：（1）有些詞兒因為實際的需要，性越來越大，就作為複音詞穩定下來；（2）有些因為不需要這麼精簡地說，常用性不大，就照口語成多音節的短語。這些詞兒和短語舉例如下：

詞兒	短語	詞兒	短語
舊衣	舊衣裳	長凳	長板凳兒
新襪	新襪子	小凳	小板凳兒
大石	大石頭	圓桌	圓桌兒
高樓	高樓房	方桌	方桌兒
香皂	香肥皂（香胰子）	長袖	長袖子
臭溝	臭水溝	短袖	短袖子
藍花	藍色的花兒	小袋	小口袋
綠葉	綠葉子	長期	長時期
短期	短時期	小指	小手指頭

（2）名詞跟名詞組成的短語不是詞兒。因為這一式的頭一個名詞一般都起着形容詞的作用，所以所說的形容詞跟名詞組成的各種格式的條件，在同樣可以應用。就是說：

（a）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獨運用的名詞，加上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獨運用的名詞，中間可以插“的”字而意義不變的語言結構一般歸入雙音的名短語。

（b）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獨運用的名詞，加上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獨運用的名詞，連用着表達一個概念，中間一插入“的”字就失去了原意的語言結構歸入雙音的複合名詞。

（c）兩個音節當中，至少有一個音節在現代漢語裏不能拆開來單獨作為詞兒用的語言結構歸入複合名詞。

我想用幾個例子試試說明上列三條。例如：“鐵

箱”（北京叫保險櫃）照這麼說是個複音名詞，因為“鐵箱”不但不等於是“鐵的箱”，而且“箱”字要作為單獨運用的詞兒必須說成“箱子”；“鐵路”算是複合名詞，因為“鐵路”不等於是“鐵的路”，上文已經說過了；“鐵桶”就可算是名詞短語，因為“鐵桶”就是“鐵的桶”。同樣，“衣架”算是複音名詞，因為“衣”跟“架”在現代漢語裏不是可以單獨運用的詞兒，“衣”必須說成“衣裳”或“衣服”，“架”必須說成“架子”。所以“衣服架子”是名詞短語，而“衣架”歸入複音名詞。“鉛筆”算是複合名詞，因為“鉛”跟“筆”都可以單獨運用，而在這兒連用着表達一個概念，“鉛筆”不等於是“鉛的筆”，因為有些鉛筆並不是鉛做的。“布鞋”照這麼說是個名詞短語，因為“布”跟“鞋”不但可以單獨運用，而且“布鞋”一定是“布做的鞋”（“皮的布鞋”，“緞子的布鞋”都不像話）。

其他雙音節的格式，像：前附加語跟動詞，動詞跟後附加語，動詞跟名詞等，我在《中國語文》1953年10月號《動詞的連寫問題》裏已經說過，這兒不重複了。

複音詞跟複合詞或結合詞是由詞素直接組成的，都連寫為一個詞兒；短語是由詞兒組成的，原則上應當按詞兒分寫。可是雙音的短語為了閱讀的方便起見，不妨用短橫連起來，雙音短語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有的常用性越來越大，可以發展為詞兒，那就可以連寫了。

2. 成語不是詞兒。成語的範圍很難說，到今天好像還沒有一條大家已經公認的成語的定義。因為成語當中用漢字寫下來的大多是四個字組成的，於是就有了所謂“四言成語”這個名稱。到底怎麼樣才是四言成語呢？就沒有一定的標準了。有些人把凡是可以用四個漢字寫下來的“現成話”都算是“四言成語”，其中有文言的，有口語的，有組成這個格式的詞兒可以單獨運用的，有現在不能單獨運用的，甚至有些人把四音節的複音詞或兩個雙音節詞兒合成的複合詞都算是四言成語。這是因為“四言成語”這一名稱中的“言”字的含義很籠統，正像“漢字”的“字”字很籠統一樣，它可能是一個詞兒，也可能是一個詞素。為了便於討論和研究，最好有個比較明確的界限，才不致東拉西扯，合不到一塊兒。我認為“詞兒”跟“語”最好不要混為一談。詞兒是由詞素（或音節）直接組成的（單音節的詞兒，音節就是詞兒）；“語”，是不是可以限於由詞兒組成的？如果“語”是詞兒組成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語”不是詞兒，它是大於詞兒的，它是由詞兒組成而不是由詞素直接組成的。這樣，我們就把“成語”的範圍大大地縮小了。凡是四個音節組成的複音詞和複合詞都歸入

詞兒的範疇裏，而不再含混地算是“四言成語”了。

這麼說來，成語像短語一樣，是由詞兒組成而不是由詞素直接組成的，可是成語跟短語在結構上是不同的。短語的結構比較自由、靈活，而成語的結構是相當嚴格、固定的。例如我們可以說“下雪”、“下雨”、“送炭”、“送煤”等，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可是“雪裏送炭”不能改為“雪裏送煤”，或“下雪送炭”，甚至改成“雪裏贈炭”都不成。這是說成語的結構是相當固定的。

成語既然是詞兒組成的（在現代漢語中不是詞兒組成的所謂“四言成語”將另題討論），那麼我們不妨先談談在現代漢語中詞兒能單獨運用的“四言成語”，這種成語就該照詞兒分寫。例如“腳踏實地”這麼一個成語，是由三個詞兒（“腳”、“踏”、“實地”）組成的，就該把這個成語寫成三個詞兒，而不是連寫成四個音節的一個詞兒。像這種由幾個可以單獨運用的詞兒組成的成語，並不是一個單詞，所以要按照各個詞兒原來的形式分寫。例如：

腳 踏 實 地	火 燒 眉 毛
鐵 樹 開 花	笨 鳥 先 飛
瞎 子 磨 刀	狗 拿 耗 子
貓 哭 老 鼠	心 地 光 明
喪 盡 天 良	打 破 記 錄
枉 費 心 機	火 上 加 油
雪 裏 送 炭	海 底 撈 針
肥 豬 拱 門	和 氣 生 財
順 手 牽 羊	廢 物 利 用
暗 箭 傷 人	回 頭 是 岸
一 口 咬 定	左 右 為 難
本 來 面 目	家 常 便 飯
清 平 世 界	天 下 太 平
樹 大 招 風	對 牛 彈 琴

這種成語，就組織來說，有的是短語（如“家常便飯”），有的是句子（如“狗拿耗子”），所以要照短語或句子的格式分寫。

除了上述短語式的和句子式的成語以外，還有一種“挑担式”（就是對對子似的）成語，數量很多。四個音節（可能是四個詞兒或者兩個詞兒）儘管有各種不同的排列，可是前兩個音節成爲一組，後兩個音節也成爲一組。前後兩組好像一根扁担挑着的分量相等、形式相同的兩端，所以叫做“挑担式”。我們似乎可以在兩組之間加個短橫（好像挑担子用的扁担），作爲半連寫。這一類的成語舉例如下：

牛 斤 八 兩	黑 天 白 日	青 梅 竹 馬	高 山 流 水
白 紙 黑 字	老 牛 破 車	狼 心 狗 肺	冤 家 對 頭
先 苦 後 甜	外 強 中 乾	頭 重 腳 輕	胆 大 心 細
馬 瘦 毛 長	花 紅 柳 綠	花 好 月 圓	水 漲 船 高
海 枯 石 爛	藕 斷 絲 連	風 吹 雨 打	刁 鑽 古 怪
沒 臉 沒 皮	成 羣 結 隊	稱 心 如 意	點 頭 哈 腰
殺 人 放 火	借 刀 殺 人	殺 豬 宰 羊	描 龍 畫 鳳

招兵買馬 治病救人 修橋鋪路 靠山吃山

3. 略語不是詞兒。略語在採用拼音文字的國家是指單詞或短語的省略形式，它的讀音一般是照字念而不照原來的單詞或短語念，例如“C. C. P.”是“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略語，中國因爲一向用的是漢字，又因爲漢字只有簡寫而不能有略寫，此，我們只有略語而沒有略字，例如“勞動模範”不略稱爲“l. m.”，我們就簡稱爲“勞模”。這“勞模”應看做是名詞短語的略語，而不是一個單詞。“土改”“土地改革”的略語，它自身並不是一個單詞。“人民表大會”有時候簡稱“人代”，可是“人代”不是詞兒。什麼要有這種區別呢？因爲詞兒是可以普遍運用的，而略語只能在一定的環境裏有限度地使用。如果把語都當做詞兒用，那一定會增加听话的人的負擔，而不一定全听得懂，就照漢字寫下來，有時候也會誤會。新華社幾次三番通告各地寫通訊要用全稱，這個道理。把略語作爲特別用法的符號而不收在詞彙裏（一般通用的略語可以收在詞彙的附錄裏，最常用略語可以發展成詞兒，例如“文工團”）。這對於漢語規範化和拼音文字的使用都有好處。如果我們同意把略語當作正式的詞兒，那麼，在拼音文字裏略語不要像詞兒那樣連寫，可是也不能分寫。到底用什麼符號予以區別，那是另一問題。我這兒暫且用短橫表示一下。

勞-模（勞動模範）  
土-改（土地改革）  
中-共（中國共產黨）  
掃-盲（掃除文盲）  
文-改（文字改革）  
全-總（全國總工會）  
少-先-隊（少年先鋒隊）  
人-大（人民代表大會；人民大學）  
短-訓-班（短期訓練班）  
初-小（初級小學）  
高-中（高級中學）  
馬-恩-列-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以上簡單地提出了我對於大於詞兒的語言結構的看法。我以爲短語、成語和略語是由詞兒組成而不是由詞素直接組成的，所以要照可以單獨運用的詞兒寫法分寫。短語、成語和略語都不是詞兒，正像單獨運用的詞素不是詞兒一樣；大於詞兒的語言結構不能連寫爲詞兒，也正像小於詞兒的語言結構不能寫爲詞兒一樣。其中關於“四言成語”的界限問題繼續研究。“四言成語”的組成部分在現代漢語裏單獨運用的很多，有的可以作爲組成複音詞的詞兒，不算是組成成語的詞兒，這些所謂四言成語就可分出來歸入複音詞或複合詞；有些四言成語恐怕作爲文言詞兒另行處理較好。這樣做，是否妥當，理，希望同志們多多指教。（1955年4月28日）



# 詞類大系—附論“詞組”和“詞類形态”

黎錦熙

[說明] (1) 這個“詞類大系表”的性質，是從“詞彙”研究發，結合着語法範疇的“詞類”，明確而具體地把它們的“統性”表示出來。(名叫‘大系’，只是‘較大的系統’的意思。)(2) 把“詞類”中所不必包含的分類法，即表中(ㄅ)(ㄆ)和(乙)等項目，跟“詞類”配合排列，爲的是好作漢語中基本詞彙”的研究(參看 M. C. 古勒庫娃《研究語言的基本詞的任務》，譯文見《新建設雜誌》1954年2月號；又 C. H. 熱戈夫《詞彙與基本詞彙問題》，譯文見《科學通報》3卷期)。(3) 同時就可讓語法上的“詞類”教學藉此結合實際，免得徒搞形式，並且和另外的“詞彙”教學取得聯繫。此，本表雖不是要在語法教學時提出來的，可也要向“詞類系統”中參進去的(《中國語法教材》的第五、六兩冊，總頁碼是615至1012，專講“詞類”，把《怎樣教學中國語法》課本裏所有例句的詞兒都收入，就是照着這種辦法排的。因此本表中不多舉例詞，以省篇幅，就把《語法教材》頁碼注上，以便需要例詞時可以參檢)。(4) 說到“詞彙”研究和教學，或者“方言”調查，“古語”整理等工作，本表才整個地適用，同時也就跟語法系統取得了聯繫。(5) 本表就1938年的原表(《見中國語法與詞類》)刪定的：因已有語法教材的頁碼，例詞大都刪去；添註“詞組”的各種關係(有附表)和“虛實字”的區別。又表中把九詞類(‘數詞’和‘詞’若獨立，則爲十一詞類)初見處劃了方框，以醒眉目。

名物系——**名詞**：實體詞之一。名詞在句子成分中有“七位”，即由七位決定它在“詞組”中對他詞的關係。

ㄅ) 人類

(甲) 天然關係和社會‘倫類’(620-622)

(乙) ‘姓字’特名(618)

(丙) ‘身體’及其功用(622；包括疾病)

ㄆ) 生活和文化

(甲) ‘飲食’、‘衣飾’、‘住所’和‘器用’(622-623)

(乙) 生產‘工具’和關係(623)

(丙) ‘道路’、‘運輸’和‘武器’(623)

(丁) 形象和‘學藝’(623-624)

(戊) ‘社會’組織(624)

ㄇ) 自然界

(甲) ‘天’空(624)，‘時間’(625-626)

(乙) ‘地’面(624-625)，‘方位’(626-627)

(丙) ‘地理’特名(618-619，包括種族、國名)

(丁) 現象和‘物質’(625)

(c) 生物界

(甲) ‘植物’(625)

(乙) ‘動物’(625)

(ㄏ) 一般‘無形(抽象)’名詞(628-630；若詞量很多，可結合(ㄆ)項的丁戊兩組，再依照“科學”分類)

貳、動靜系(‘動’指作爲；‘靜’指形性)

(一) **動詞**——述說詞之一。對組合的上名是“述說關係”。

(ㄅ) 事物處理——外動詞：對組合的下名(賓語)是“支配關係”。(688, 699, 706)

(ㄆ) 經驗過程——同上。(696)

(ㄇ) 自身行動——內動詞：若有下名(補足語)，是“成就關係”，或者對其下名(副性賓語)是“到着關係”。(708, 713, 712)

(c) 情意作用——內動或外動。(698, 716)

(ㄏ) 判定或存在——同動詞：同內動(如‘是’)對其下名(補)是“判定關係”；同外動(如‘有’)對其下名(賓)是“存在關係”。(71, 7720)

(二) **形容詞**——區別詞之一，對組合的下名是“修飾關係”(表示對下名的“限制”性)；又用爲述說詞之二(形述)，對上名也是“述說關係”。

(ㄅ) 表形狀(742)

(ㄆ) 表性質(743)

(ㄇ) **數詞**(747)

——照過去的“虛、實字眼”的說法，以上都是‘實字眼’(一般叫‘實詞’，但不等於‘實體詞’)；下一種是‘實字虛用’(也叫‘半虛字’)：

(三) 轉成的性態 **副詞**——副詞是區別詞之二，絕不跟“名詞”組合(所以基本上屬‘虛字眼’)，只跟“動”“形”及其本身組合，對所組合的詞也是“修飾關係”。但若要跟上一項的形名組合分別，上項可叫“限制關係”，這項可

叫“疏狀關係”。在副詞的作用上,前疏狀(前附於動形)和後疏狀(後附於動形)的比重不同,後疏狀有時強調動詞的效果,所以或叫‘補語’,對其上所組合的‘動、形’是“補充關係”。(787-796)

疊、虛助系(‘虛’即空虛,‘助’即幫助,過去都叫‘虛字眼’。)

#### (x) 代替

(一)稱謂——人稱 **代名詞** 是虛位,但屬**實體詞**之二。這是**虛字實用**(也叫**半實字**),以下凡代、形和名量都準此。(666)

#### (二)指示

- 一、指代(677,如‘這’‘那’‘其’)和指形(756),  
聯代(684,如‘者’=‘的’,‘所’)
- 二、地位副詞(774,併入‘方位’)
- 三、表樣式的性態副詞(779,如‘這麼’‘那樣’)

#### (三)疑問

- 一、疑代(683,如‘誰’‘什麼’‘那兒’)和疑形(760)
- 二、疑副(806,如‘怎麼’‘多麼’)

#### (x) 衡量(反映物情)

- (一)名物 **量詞** (642-662)如‘個’)
- (二)不定數詞(753,如‘些’)
- (三)數量副詞(796,如‘又’‘也’,‘更’‘最’‘很’  
‘太’,‘只’‘都’)
- (四)時態副詞(768,如‘已’‘才’‘正’‘就’‘漸’  
‘忽’)

#### (n) 輔佐(添附語意)

- (一)助動詞(724,如‘可’‘敢’‘當’‘必’,後附於  
動的如‘得’和用成‘詞尾’的‘了’‘着’等)

“謂”語(動,形)對“主”語(名,代)

外‘動’對“賓”語(名,代)

同‘動’(‘是’或‘不是’)對“補”足語(名,代)

[同外‘動’(‘有’或‘無’)對“賓”語(720)

內‘動’和‘形’述對“補”足語(圖中虛線所示)

附加語對中心詞

“形附”(‘形’容詞或散‘動’)對名,代

領位(名,代)對名,代(多介‘的’)

“副附”(‘副’詞或散‘動’)對動,形;

副位(名,代)對動詞;

前疏狀(多用‘介’詞,介在副位前)

後疏狀:關係內‘動’—‘副’性賓語(偶用‘介’)

‘形’或‘動’—副附(多介‘得’)

外‘動’—轉成的副詞

等立的“複成分”

(二)一般的性態副詞(775-786,如‘果’‘竟’  
‘正’‘簡直’‘特’‘倒’‘還’)

#### (n) 否定

(一)否定同動(719,‘非’=‘不是’;720,‘無’  
‘沒有’:這已結合同動,屬‘半實字’。)

(二)否定副詞(803,‘不’,‘未’=‘沒’,‘莫’=‘別’)

(x) 關係詞(組合詞句而表明其關係的工具)——  
種語法工具,只担任表明各種組合間的關係。  
有被組合的其他詞句才能表達所關係的內容。  
所以是‘虛字眼’。

(一) **介詞** ——虛用的動詞(815-)

(二) **連詞** ——廣用的副詞等和介詞(857-)

(x) 聲態詞(表示語氣和情緒的聲音態度)——  
聲音態度,不但沒有內容實義,也不担任  
關係,過去列為主要的‘虛字眼’(如文言‘也’  
‘矣’‘焉’‘乎’‘哉’);但‘歎詞’一類,其實是  
虛實的。

(一) **助詞** ——表語氣、語態於詞句的“末  
漢語特有的。(975)

(二) **歎詞** ——表情緒的“獨立的”呼聲  
(1005;但‘擬物象聲詞’併入貳類  
(三)。)

#### [附一]“詞組”總表——“短語”的主要類型

“詞組”(詞的組合簡稱“詞組”,即“短語”,但  
裏是把“句子”包括在內為一種),其間各種關係  
儘管離開句子結構來說,也是跟句子的“成分”完  
全一致的。總列一表如下:

(近來教學語法有採用“圖解法”來分析句子成分的,  
曾歸納為一個“句法圖解總公式”,現略修訂,已印在  
語法教材第六冊,頁1021,請對着看,更清楚些。)

述說關係

支配(廣義的)關係

判定關係

存在關係]

成現關係(‘成’就和表

修飾關係(總稱)

限制關係

領屬關係(統括其他關

疏狀關係

時、空、方式等關係

到着關係

程度關係

效果(補充)關係

聯合關係



在上表中，可以看出“短語”的主要類型來(表中字有着圈的)，就是：“主謂短語”(即“子句”的一種)、“動賓短語”(可把“動補”和“後疏狀”的第一種“動附”附入，前者因其量少，後者形式相同)、“向心短語”(即“主從短語”，應分為三：“形名”短語——‘形’指‘形附’，包括‘領位’名、代；‘副動’和‘副形’短語——‘指’副附，包括‘副位’名、代。‘後疏狀’的也可稱為“動副”和“形副”短語)、“聯合短語”等六種。漢語構詞法的“複合詞”，其結構也與此一致(詳另表)。

教學上，“詞組”必須以第一種為主幹(即“主謂”構，即“句子”的基本形式)，面對着“句法總公式”，當地割下來，供應需要，這就是“句中看短語”。則將使學習者感到煩雜瑣碎，不知所云。(但有的法書是企圖把“詞組”作為漢語的“廣義的形態”來鑑定“詞類”的，請看下篇。)

#### [附二]“詞形”總說——漢語“詞類”劃分的‘形’

“詞形”並不專指“詞類”的形態，但這裏所說只以“詞類”問題為範圍。

(1)像‘屈折語’似地連‘詞根’都有些隨着‘轉類’變化，在漢語也有其例(如‘樂’，名詞讀  $l\dot{e}$ ，內動讀  $l\dot{e}$ ，過去用作外動還該讀  $l\dot{e}$  的，這是改了拼音如‘好’，形容詞讀  $h\dot{a}$ ，動詞讀  $h\dot{a}$ ，這是改了音調。假如漢語是用的拼音文字，這種‘形態’是十分清楚的)；但漢語中這種“讀音”的內部形態變化主要與詞義關係，而且不多，表示“詞類”轉化的更少。至於‘重疊’形式，主要是關係‘構詞法’；‘重音’變等，主要是關係詞彙的“語音”規律：雖然也有些與語法範疇，可是漢語並非專靠這些“變形方法”表現“詞類”。)因此可以說，漢語是缺乏這種“最”的形態的——但也不能因為缺乏了這些，就說漢語無詞類”。

(2)像‘黏着語’似地在‘詞根’上添附些個‘頭、尾’表示詞類形態，這可算是“狹義的形態”，在漢語可發展中(如形尾‘的’、副尾‘地’，正在精確而廣運用，雖然是書面的，但這是祖國語言前途必然的路，不应当又主張照舊混同起來)；但漢語裏添附的‘詞素’，大都只有活的規律而不是死的規則是可能性的而不是絕對性的。因此可以說，漢語在的和發展中的這些“狹義的形態”，是應當使它規範化，但沒法完全據此來個別地鑑定“詞類”。可也不能完全否認這是漢語的一種詞類形態。(有主張以後寫作，把動詞都加上‘了’‘着’等尾，形

容詞都加上‘的’尾，副詞都加上‘地’尾，就可建立漢語主要的詞類形態。這是個好理想，書面上也有實踐的可能，但還沒法使口語相應。又關於‘詞尾’，就‘屈折語’說，‘詞尾’和‘接尾部’是有區別的：像俄語那種使詞根不能獨立的“詞尾”，漢語沒有；漢語的“了”“着”“的”“地”等只能算“接尾部”。因此，我們只須用一個名稱就行。另詳“漢語構詞法——多音詞表”，將來或可在本刊發表求教。特此附註。)

(3)於是大家都來研究漢語的“廣義的形態”了。這就正是指着“詞的組合”，要把“某些詞與詞之間有結合的能力，同時又排斥與另外一些詞結合”來作為“鑑定”詞類的標準。這又跟句子的“成分”是完全一致的。也總列一表如下：(仍請把《中國語法教材》頁1021“句法圖解總公式”擺出來，可是，由於偏重這個“詞組”鑑定法的又不喜歡“依句辨類”——其實，“辨”是辨別，依着句子的組織來“辨別”固有的詞類，正和依着“詞組”來“鑑定”詞類是同樣的意義；並不是說“依句‘分’類”，要依靠詞兒進入句子組織中才“區分”得它的詞類出來：“依句‘分’類”是不正確的；“依句辨類”是压根兒沒問題的，但因我从前又饒上了一句“離句無類”，就演成“漢語無詞類”的錯誤——現在也就避免句子組織在打岔兒，請把“總公式”中間的一雙“分開主謂的垂直線”取消，對看下表。)

名詞：1.前可加‘形’容詞等“形附”，不可加‘副’詞等“副附”。

2.前也可加領攝它的“名、代”(多介‘的’，在‘的’前，即在“領位”)。

3.後可加述說它的‘動’、‘形’(即“謂語”)，不可加受支配的‘名、代’(即“賓語”)，也不可加表判定的“名、代”(即“表語”；如有，是省略了“同動詞”)。

4.能為‘介詞’之所介(在‘介’後，一般即在“副位”)：——凡有“介”的，省‘介’而“位”都不動，即“關係”不動。請重視這句話，否則“名+( )”“( )+名”等進入結構(詞組)的鑑定法，可以把‘正’或‘負’的“反應”解釋得很不正確。

代名詞：同名詞。但前可加的“形附”很有限制；後有被領攝的名詞時，它本身就轉化為形容詞(‘人稱’一種不轉，但介詞‘的’也轉成形尾)。

動詞：1.前後都可加‘副’詞等“副附”，不可加‘形’容詞等“形附”(和‘名詞’恰相反)。

2.前可加被它述說的“名、代”(即“主語”，這就

產生“句子”的基本形式)，大部分後也可加某種關係的“名、代”（什麼關係可參看上“詞組表”）。——在結構上又可形成“缺乏狹義形態”而用如‘名’‘形’‘副’的三種“散動式”。請重視“總公式”中這種表現（並且，“散動”若再有所組合，就形成三種“短語”；無所組合的單個詞兒，一部分可‘轉類’，如‘抽名’），否則又可使“動+（ ）”“（ ）+動”等搞得一塌糊塗。在這裏請提個總則：句子的“成分”（即“詞位”，即屈折語中的“格”）和表現詞類“廣義形態”的“詞組”，是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

3. 除‘同動’‘助動’兩種外，可帶詞尾‘了’‘着’等（同動的‘有’，舊也可帶‘了’，今漸可帶‘着’）。

4. ‘助動’一種‘副’詞化。

形容詞：1. 前後都可加程度關係的‘副’詞等“副附”（副詞‘很’最突出；包括比較級），不可加‘形’容詞等“形附”（和‘動詞’同）。

2. 後可加被修飾的‘名、代’（這是主要的；但‘代’被修飾，很有限制）。

3. 前可與‘動詞’一樣地加被它述說的‘名、代’（這就是‘形述’用法；也取得了動詞第3項形態，但不轉類為動詞；又，在這用法下，只一小部分可以後加某種關係的‘名、代’，可參前“詞組表”）。——單個詞兒可‘轉類’，如‘抽名’和‘性態副詞’。

4. 可帶詞尾‘的’；‘的’可轉一切詞成“形附”。（“形述”一般不帶‘的’尾。）

副詞：1. 前可遞加“副詞”。

2. 前後都可加被它修飾的‘動’、‘形’，但它絕不修飾‘名’‘代’（否副‘不’、數副‘很’等最突出；如有例外，另有解釋）。

3. 大量由‘形、動’轉成（“性態副詞”最多）。

4. 可帶詞尾‘地’；‘地’可轉一切詞成“副附”。

介詞——以下純‘虛字眼’，一般是不拘形態的，但在漢語也可說明幾點鑑定法：

1. 無論前置、後置，所介的詞總是‘名、代’。（但引副介詞‘得’所介總“不”是‘名、代’。）

2. 本身多是動詞（動詞後所組合的‘名、代’如支配、到着等“關係”都存在），虛用作介，就只起“縮合”作用（“縮”着後邊所介的‘名、代’，把一切“關係”轉“合”於受介的‘動’詞

上去，所以應列為“關係詞”之一）。

連詞：可同時前後加上一切詞兒，表現“聯合”（聯合是廣義，猶云‘等立’，包括‘平列’、‘承接’、‘轉折’等關係（請參“總公式”的“附則”第三章）。但這裏只講詞兒；至於語句的聯合，還有‘主從’關係，都歸入句法組織裏去說）。

助詞：只加在詞兒、短語和句子的末尾。

歎詞：隨處獨立，無所組合。

在上表中，可以看出漢語“詞類”是具備着“廣義的形態”的，是可以從“詞的組合”上去“鑑定”（至少也能作“校對”）的，基本上也就跟句子組織的“六大成分”一致，並無矛盾衝突處。（請參“總公式”的“附則”第一章“詞類看定法”，就是這種“詞類”鑑定法，它離開了句子組織，可是利用了圖解上的五種線形，把漢語的詞類形態學“形象化”了。）

（4）說到句子組織的“六大成分”，這就可以證明它也可算是“詞類”的“最廣義的形態”。對於“詞類”形態的研究，我們並不主張就用這個“最廣義的形態”來做主要的分類標準，但是，“一個詞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結構關係”實已包括其中；“一個詞進入句子以後實現出來的結構關係”，並不會和“割下來”（在“圖解總公式”上取消“分開主謂”的垂直線）的各種各樣的“詞組”發生矛盾——小矛盾偶然有的，那多是受了‘變式句’和‘省略句’的影響。有的人又不顧想表達的完整性，不適當地把‘變’‘省’的（說漢語不識字的人心裏都知道是‘變’‘省’的）結構認為表現漢語特性的正式結構，因而在‘成分’與‘詞組’間製造了一些矛盾出來，至少是把‘成分’對於‘詞類’“能照顧的面”看“小”了。“廣義的形態”不是跟“狹義的形態”對立的，更不是跟“最廣義的形態”對立的，要是力避其同而專求其異，求得了一點兒“異”就死地誇大起來（這可叫做“避同誇異”），那就不免會專屈折語的意識基礎上出發，在屈折語跟漢語本質不同的點上糾纏不清，以致矛盾百出。——例如有人要個別的詞兒釘死所屬詞類而不讓轉化，他問“戰爭”個動詞是什麼時代成了‘名詞’的。我們答不出這個時代來，反問他：你怎麼知道它成了‘名詞’而不再作‘動詞’了？他說在許多作品和文件中沒有發現它‘謂語’用的例子，只作‘主語’‘賓語’或‘表語’用。就很顯然是“依靠詞兒進入句子組織中才分得它的類出來”，倒是“依句‘分’類”，爲着要做到“詞有類”，倒反合流於“詞無定類”，跟“漢語無詞類”走上這條路線了。須知：決定名、動、形三種實字眼的“類”，“基本詞義”就是必須通過的一條康莊大道，



“無定類”的詞兒（‘戰爭’從來是‘動詞’）。可也沒有“轉類”的詞兒（‘戰爭’現在轉定為‘名詞’，這樣說，也問者的看法也就並沒有錯）：屈折語的‘轉類’是“狹義形態”作表示的，所以根本可另算一個詞，但門又決不能在“翻譯是必要的”這句子裏，因為動詞“譯”做了句中‘主語’而沒有‘-tion’等形態的表現，說它還是‘動詞’作主語，而不讓它轉成‘名詞’；並現在它明明可加指形為“這種‘翻譯’”，又可加名領“詩的‘翻譯’”，這就明明取得了名詞“廣義形態”上特點。若說作‘主語’的還可以是帶賓語的“翻譯”或是重疊的“翻譯‘翻譯’”，所以‘翻譯’還是動的形態；殊不知這兩例乃是“動賓短語”和“動詞疊（已不是單純詞）”用來作‘主語’的，是組成的“名詞短語（簡稱名詞語）”而不是轉成的單個兒‘名詞’，詞兒的本身‘轉類’並無關係；在漢語，凡短語內的詞，並不需要像屈折語那樣也隨全句的詞位而變形，怎好併為一談？所以，‘定類’和‘轉類’或‘兼類’須掌握適合漢語的客觀規律。要是馬虎地片面地決一個詞的‘定類’，又從而主觀地“儘可能”地不讓‘轉類’，那就不僅攪亂了“詞類”和“句法成分”的本來一性，並且自行打破了“詞類”的“廣義形態”使它全垮台。——所以符合於漢語特性的詞類形態學，是“最‘廣義的形態’到“最‘狹義的形態’都应当照顧的，不应当从中力避其同而專求其異的，應當從不同的角度上來看清漢語“詞類”在詞彙、構詞法、詞組及句法中的“對立的統一性”，這就可以很正確地解問題，指導教學。假如脫離了語言實際，不了解漢語特性，只拘定一些屈折語的原則來搜求漢語的詞類，儘管解析得細如牛毛，總覺得有些不對馬嘴；更想單文隻義地找些個例証來自圓其偏至之說，不免搜索枯腸，而終於鑽入牛角。

但關於“詞類”形態的科學研究工作原是可以力求，反覆辯論的，是不怕“力避其同而專求其異”

（5頁）在我們的拼音文字裏，同形字最好儘可能，就是說，像“天”和“田”之類有聲調區別的字最好保留一些。過去我有過一種看法，認為一定要做到“同者莫不異名”，那種極端的看法當然是不對的。不另外一種極端的看法，認為同形字根本無須區分，不大妥當。一種正規的文字，應該比語言有更高的精確，至少語言所能分清的詞我們最好儘可能在文字中它們區分開來。這首先當然是為了謹慎，以防萬一誤解；其次是為了字形清楚，省得邊讀邊猜（否則逐字學會拼音文字的人也不見得能夠不猜）。至那些略掉聲調符號不致造成同形字的字，如“女”“能無線電”之類，聲調符號不妨儘可能地不要。不要

的；可是有兩點咱們得注意：第一是話要說得明白。“詞無定類”和“詞有定類”這兩句簡單的口號都是沒有把話說明白的，因而起了誤會，出了偏差。“詞無定類”應當是說：漢語的詞兒，從來缺乏“‘狹義形態’的一定的分類；但不可因為缺乏了像屈折語的“狹義形態”就極端地說“漢語無詞類”。“詞有定類”應當是說：漢語的詞兒，除基本“詞義”和若干“狹義形態”之外，更還具備“廣義形態”的一定的分類；但不可又反而模仿本有全副“狹義形態”的屈折語，把個別的詞兒也釘死所屬詞類而不讓轉化（因此就不免把那詞義未變而可用在兩類的詞，勉強分開，竟說是“詞彙”中的兩個詞兒）。總之漢語的詞類，確實是“詞義·語法範疇”的分類，這是可以首先肯定的。必須拿“明白的話”來進行研究、討論，才好把一致的、正確的簡單口號總結出來。

其次要注意的就是：研究過程不等於教學過程。面對着從出娘胎就學起而說慣了若干年漢語的學習語法者，最好不要把他們等同於不大会漢語的國際語言學者。若不注意此點，就可能誤用專門學者研究的过程作為教程，倒会把中等學校的學生當作幼兒園的孩子來教了。他們要求在原有的語言水平上提高，他們需要真能提高水平的語法工具；因此，劈頭就教句子的基本規律，在‘造句’中配講‘用詞’，‘拿‘句法’來控制‘詞類’”，這種教學程序是不是較適合於“缺乏狹義形態”的漢語特徵，也是可以考慮的，也許這樣教更便於把漢語的“詞類”教好。

現在正是要把語法中的“詞類”問題展開討論，求得結果，以便進行漢語‘規範化’教學的時候，我特將兩年來休養中從各方面吸收的好意見、好辯論，配合修訂在建設性的方案中的，提出這一部分有關詞類理論的發表，意在拿出一點搞得較簡明較完整的正面東西來備讀者批評；末了也提出幾點一般性的批評意見，統請指正！

聲調符號也就是這些字的定形。只要那些字能够恰如其份地代表那些詞兒，即使它們不把詞兒的發音完全表現出來也可以。有條件地簡化拼法我認為是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

總之，為了定形，我們可以適當地添上一些不能辨音的音素符號，也可以適當地省去一些能辨音的音素符號。文字並不絕對等於語音的記錄。前面我說的“文字不一定完全和語音一致”也指定形而言。

我們研究語音，旨在建立文字，不在正音。從建立文字的角度上來看，對語音標準的要求有時是可以放寬一點的。我這種看法未必正確，請大家研究。

# 关于汉语的词和汉语单音节说

鄭 林 曦

## 一、关于汉语的词

張建木先生1952年11月在《中國語文》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說漢語是單音節語。到1955年1月又在《中國語文》上發表一篇文章，仍然說漢語是單音節語。張先生在第二篇文章中聲明說：“直到今天，我的意見基本上還沒有改變。”並且說：“把漢語和其他語言比較起來，漢語的單音節性是很明顯的。我感覺我沒有理由接受意見相反的說法。”

在學術討論中，如果真正覺得真理是在自己一方面，那當然可以堅持下去，繼續展開討論。抱有不同看法的人，也要耐心地充分了解這種文章的論點和論據。真正把這裏面的道理弄清楚，我想是會把學術研究推進一步的。

抱着這樣的認識和心情，我仔細地閱讀了張先生的兩篇文章。首先使我感到興趣而願意進一步了解的是，張先生既然花費很大力氣從漢語的詞的音節多少來說明漢語的特性，那麼在張先生的心目中，詞是什麼？漢語的詞，又是什麼？

張先生在第一篇文章《從漢語的特性說到“語詞連書”》裏面說：“不過現在也沒有公認的、更理想的語言分類，漢語中大部分是以一個音節作一個意義單位，所以大体上說漢語是單音節語也是可以承認的。”這裏所說的“意義單位”，大概就是張先生心目中的詞吧？很多“一個音節”的“意義單位”，大概就是張先生心目中的漢語的詞吧？

爲了研究張先生所說的“意義單位”就是“詞”，我又把上述這篇文章向下讀去。“漢語中的‘詞’，十分之九以上都是‘兩義和合’的，都可以分爲‘二義以上’。縱然應用起來如何密切，縱然原來單字的意義變模糊了，但仍舊可以分成一個個的單音詞。”果然不錯，單音的“意義單位”就是“單音詞”。而只要是一個“意義單位”也就必然是一個“詞”了。在這種對於“詞”的含義的了解下，我們在第二篇文章《論漢語的特性和形態問題》中，可以看見張先生不僅把“宇宙”“橢圓”當成“兩個單音詞組合成的”，而且進一步想證明那些一向公認爲不可分析的雙聲疊韻的“聯綿詞”，“也有好多是兩

個單音詞組合成的”，“恍惚”“窈窕”可以拆碎變成“恍”“惚”“窈”“窕”四個單音詞。爲了加強他的這種論斷，張先生在對於“詞”的界說上又增加了一個條件。他說：“有些複音詞不但分開來每個字都有自己的意義，而也有單獨使用的”。這就是說，“詞”也是“單獨使用的意義單位”。張先生隨後又說：“在漢語中意義的最小位基本上就是單音詞，漢語的詞彙就是在這些單音上發展起來的”<sup>①</sup>。於是我們進一步了解到張先生的所謂詞就是“最小的單獨使用的意義單位”；而漢語的呢，老老實實說就是那最小的，可以單獨使用而有意義的單位——一個一個的，多到幾萬個的漢字。張先生大概是會否認這一點的，因爲他在緊接着上引的那一句話後面，就稱讚漢字說：“從大体上看來單字可以單獨使用，又可靈活地製造複合詞，從而大地豐富了漢語的詞彙。”

“最小的單獨使用的意義單位”，這不是英國斯威特先生(Henry Sweet, 1845—1912)給“詞”下的那老定義嗎？“a word may be defined as an ultimate independent sense-unit”<sup>②</sup>。

這條詞的定義是不是完全錯誤呢？還不能那樣說。它是根據若干種印歐語言的詞的事實概括得來的，不能說全無根據。然而它是不完全也不夠正確的，有很顯然的片面性；特別是無條件地搬運來套到漢語的詞的事實上，更容易搞出偏差和錯誤。

何以見得呢？首先，我們要問，什麼是“意義單位(sense-unit)”？詞是不是都是“意義單位”？意義如果指的是一定的語音的形式所表達的思想內容，那麼它是意識中的東西，不能用它的單位來作爲語言單位。我們大家都知道意識中的(心理學上的)單位概念，它的範圍並不老和語言中的詞的範圍相等。“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概念，但是在漢語中是個詞。用是否表示一個概念來辨別語言中哪一片段是一個詞，是不大靠得住的。如果所指的是你說我聽懂、我說你能聽懂的這一客觀現象的本身，而這裏

① 以上兩句引自《中國語文》1955年1月號25頁。

② Henry Sweet: *A New English Grammar* 第52節。



是語音和意義的統一體，也就是語言本身，那麼爲什麼不就叫“語言單位”呢？而且有些語言中的詞常常是在一定上下文的限制、幫助之下才能聽懂的。可靠“聽懂”的單位是句子，或至少是短語。在漢語中，有些同音詞常常是在听完一句話之後才能分辨出它的意義的。因此，“意義單位”這個名稱，雖然是通俗的，巧妙的，有時無妨用一用；可是恐怕很難說它是精確的。用不够精確的東西來界說什麼是詞，自然是會引混亂的。比如有人說“黑板”“鐵路”各是一個意義單位，因爲它們各只表示一種特定事物的概念；另有人說“黑”和“板”，“鐵”和“路”都是意義單位，因爲它們合起來表示一個特定事物的概念，但是分開來仍各有意義。這樣一來，定義之中還得有定義，首先規定什麼是一個“意義單位”，然後才能規定什麼是一個詞。咱們再進一步分析一下，語言中所有的詞，是不是都是“意義單位”呢？表示事物概念的實詞大概以說是。至於表明事物間的關係的、在實詞間起作用的虛詞，就很難硬說它有什麼具體的意義。表示感嘆、模仿聲音、呼喚應答的感嘆詞、擬聲詞，本身就無實在意義的語音的照實描寫，也不宜用意義單位來衡量。而如果因爲後兩類詞不表示具體意義就否認它們也是詞，那是不正確的。由此可見“意義單位”不能概括全部的詞。

其次，“最小的”（按照ultimate的原義說，是最後的，是分到不可再分的。不可再分當然是小的了，所以過多翻譯爲最小的）這種界說更是最容易出毛病。主張單音節說的先生們包括張建木先生在內，都正是分析漢語中努力追求這個“最小的”，才無往而不分；不僅本來可以分的要分，連不能分的也要勉強分；不僅現代語言中分了仍有意義的，他們要分，連分了只有古代語言中才能考據出意義的，他們也要分。漢文用漢字寫的，找起這個“最小的”“意義單位”來又最難。於是“在漢語中最小的基本單位就是單音節詞，”漢語也就是單音節語了。況且，斯威特的原意，主要是從造句法的範疇來分析的。因此他緊接着加了一條independent（獨立的）的限制，就是說必須是所分的特定時代的語言中能夠作爲句子的成分獨立運用東西，才算是詞。可是機械地而又片段地搬用這個定的人常常忽視這一點，把它擴大應用到構詞法上，硬將許多複音詞中的有意義的成分都分析出來，作爲最小的單位，因而斷定它們都是詞，是造句法上所要肯的詞。這就引起了混亂，詞的界限反而無法確定。於是在一池攪渾了的水中，他們就把所有“最小意義單位”都當作單音詞看待，而單音節性就被看

做漢語的一種特性。

其實拿“最小的”或“最後的”來界說構成語言的建築材料的單位——詞，本來是不够恰當的。很多語言的詞不宜於用“最小的”來形容它。例如英語的weighing-machine（台秤），連起來寫算是一個“最小的”意義單位，分開來算是兩個“最小的”意義單位。到底怎樣才是分到不可再分的“最小的”或“最後的”界限呢？很多場合取決於文字形式。可是用漢字寫的文章，一律不按詞兒分開寫，這就使漢語單音節說的人有把詞素當作詞的機會。不僅複合詞如此，連好些派生詞裏面分析出來的詞根，詞頭或詞尾也有一些同時還在作爲詞獨立運用着的。把英語的describeless（無法形容）分成三個“最小的”意義單位 de,scribe,less，每個都同時可以作爲詞獨立運用。那麼，是否因此就可以否定 describeless 是一個詞而只承認構成它的三個最小的意義單位是詞呢？顯然不能。可是張建木先生以及其他漢語單音節說主張者正是利用這種方法來把現代漢語的完整的詞拆成碎片兒，然後拿來証明漢語的單音節性的。

其實，和斯威特的定義相反，詞在語言中並不是最小的意義單位，而是一種不大不小的單位。把語句分析爲構成它的建築材料，我們可以看到能夠運用來表示一定意義的語音形式，比詞稍大的有詞組，比詞稍小的有詞素，詞並不是分至無可再分的最小的意義單位。無論一個詞裏的詞素在過去甚至偶而在現代是否還能獨立運用，都不能改變詞之爲詞這一級語言構成單位的性質。正好像生物體中的細胞，雖然分析開來可以得出細胞核和染色體，然而在生物學上細胞仍然是一種適當的生命單位。決不能因爲細胞仍可分析而不承認它是細胞。同樣地決不能因爲漢語的詞可以分析爲若干詞素而不承認它是一個詞。決定一種語言的性質，是從構成它的基本單位即詞的性質來看的，不应当從分割詞而得的詞素的性質去看。漢語的詞如果全是或者絕大多數是單音節的，漢語可以稱之爲單音節語。漢語的詞如果絕大多數是多音節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單音節的，就不能稱之爲單音節語。用分割詞而得的詞素是單音節的來証明漢語的單音節性，如果不是故意地詭辯，就是對於語言的各級單位的關係分辨不清。無論是哪一種，總而言之，不是真正的科學。科學上是不許可這樣混淆的。張建木先生說：“語言學家不會說過沒有複合詞的語言才叫單音節語。……有人以爲近代漢語複合詞增多，因此就失去了它的單音節性，在科學上是講不通的”<sup>⑤</sup>。這裏說的又是“語言

⑤ 《中國語文》1955年1月號，26頁。

學家”，又是“科學”，可是我們要問，這裡所謂“語言學家”是不是外國的資產階級的斯威特、高本漢之流？他們說的難道就是金科玉律不容懷疑的嗎？“科學”是不是那種不從中國語言的客觀事實出發而硬搬用過來的洋教條？張先生所說的“複合詞”，是不是把印歐語言中的複合詞的概念不恰當地硬套在漢語身上，凡是包含着兩個以上可以分開成為“最小的意義單位”的漢字的，都一律叫做複合詞？如果是這樣，那麼張先生所依據的那些資產階級的“語言學家”和他們的“科學”弄錯了。我們還是多用自己的勞力來研究自己的語言吧。

斯威特的詞的定義中比較可取的部分是“獨立運用”這一點。詞既然作為構成語言的建築材料的單位而存在，它的特色之一當然是可以作為一個不大不小的單位，在語法的支配下發生形態變化（廣義的），並在語句中獨立運用。在這種限制下，slowly 的 -ly 和 tripod 的 tri, pod 雖然都是“最小的意義單位”，但却不是詞，因為它不能作為一個單位，在語句中從這裏搬到那裏來獨立運用。而這當然是指的現代的語言說的，並不問它在古語中是否曾獨立運用過。在這條規定下，從漢語複音詞中分析出來的許多可以寫出單個漢字但不能單獨運用的詞素，當然都不能被認為是單音詞。在“人民”一詞中的“民”就不能算是一個單音詞，因為在現代漢語中它不單獨運用。這也就是說，一個語言單位是否能獨立運用，必須從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過去曾經獨立運用的詞今天不能獨立運用了就不再成其為詞。fire-drake 中的 drake 在《英華大詞典》中，就沒有作為“龍”解的一條，而且同義的 fire-dragon 也已經用起來了。因此，我們可以說，drake 在 fire-drake 中也就只起一個詞素的作用，不是一個現代的詞。

綜合上述幾點來看，斯威特給詞下的定義是有毛病的，運用來確定漢語的詞是什麼，出的毛病就更顯得嚴重。因為每個漢字乍看起來幾乎都可以符合這個定義的要求，因而被肯定為單音詞。結果就會弄成有多少漢字就有多少單音詞，而真正的漢語的詞倒不過是這些單音詞的複合物，隨時可以拆開。因而詞的形式永遠不會固定，詞的觀念也就永遠不會明確了。

那麼，漢語的詞到底是什麼呢？我不會下定義，但是認為可以概述如下：

- 1，漢語的詞是構成漢語的建築材料的單位。
- 2，作為漢語建築材料的單位，它可以在漢語語法支配下發生廣義的形態變化並獨立運用。
- 3，漢語的詞主要包括三類成分：（1）大多數是表示客觀事物概念的實體詞；（2）一部分是常常應用到

句子中連繫實詞的虛詞；（3）更小的一部分是表示情、模仿聲音、呼喚應答的感嘆、擬聲詞。

4，漢語的詞在漢語中是一種不大不小的單位，常常可以分析為較小的詞素，而這些詞素在古代詞在現代甚至也有可以分開來單用的；但是漢語的詞不因此就失去它的詞的性質，詞素並不因此取得詞的性質。

5，漢語的詞絕大部分是多音節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少數是單音節的。

## 二、漢語單音節說不合乎漢語詞彙的實際

上面已經批判了西方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給詞下的定義，並提出了對於漢語的詞的概括說明。這種說對不對，歡迎語言學界批評、討論。我們現在且根據這種對於詞的瞭解，來分析批判一下漢語單音節說。

就從上面引用過的張建木先生所舉的例子說吧。張先生幾乎毫不猶豫地把“宇宙”、“橢圓”當作單音詞組成的複合詞。這就是說“宇”和“宙”，“橢”和“圓”都是可以作為一個單位獨立運用的單音詞。我們拿它們來造造句子看：“中國的字共計將近一萬平方公里”；“天体的字是橢的”；“中國的可考的一共有五十萬年以上”。請問有人能懂麼？不能懂不能像詞一樣作為一個語言單位在現代語言中用，怎麼可以把它當作詞呢？如果說兩千年前的古書曾經作為詞用過，所以就永遠是詞。那麼 slowly 的 -ly 也曾有作詞用的時候，它是不是也還是詞？tripod（三腳架）裏的 tri（三），pod（足）也都還是麼？如果把詞這樣的解釋，恐怕連斯威特先生復活也不會同意吧？而且，就是在古語裏，“宙”字是否作為一個詞獨立運用過，也是頗可懷疑的。它在《說文》裏是和“宇”連用的，無論是作為“舟車所極覆”的“宇”講（見《說文》），或是作“棟梁”講（見《淮南子》“冥”注）。我們不能因為一些訓詁書籍拆字來解釋，據以斷定它一定是一個詞。

至於張先生說雙聲疊韻的聯綿詞“恍惚”“窈窕”以分拆成為“有自己的意義的”“單獨使用的”單音“恍”和“惚”、“窈”和“窕”，那可靠性就更可懷疑了。關於“恍惚”，張先生的證據是《老子》一書有過“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和“惚兮恍兮”的話。從這三條舉例就可以看到張先生既沒有認真研究古漢語，又並不重漢語的特點。在古漢語裏，“惟”是一個感嘆詞，分，可以用在句子的前面，也可以用在詞的前面。如《尚書》《召誥》：“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字，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考證，等於現代漢語的



”。這一類擬聲成分可以夾在詞裏面用，但並不破聯綿詞之爲一個詞。“恍兮惚兮”或者“惚兮恍兮”等說“恍啊惚啊”“惚啊恍啊”，墊上一個音不但不能損“恍惚”或“惚恍”作爲一個獨立運用的語言單位的性而且由於它們緊密聯用，正好證明像“恍惚”這類音詞無論如何墊音，顛倒，仍不失爲一個複音詞。語中的複音詞可以顛倒來用，這正是漢語的一個特在韻文中爲了押韻，尤其容易出現這種情況。例東西”總算是一個漢語單音節說者也承認的複音詞然而“玉東西”可以顛倒起來說成“玉西東”“東西”。④ 想用墊音或詞素顛倒的情況來證明複音詞“恍惚”之類是由兩個“單獨使用的”單音詞構成是徒勞無益的。“恍”字雖然也有作爲詞根使用時候，比如“恍然大悟”，可是那和“恍惚”的意義無是一個字的兩種意義。縱然張先生遍查古書能再出一些單獨使用的“恍”字和“惚”字來，那也不能証“恍惚”是由兩個單音詞合成的。因爲，這個詞除開作“恍惚”以外，還有寫作“恍忽”“荒忽”“慌忽”“恍以至於“仿佛”的。⑤

對於“窈窕”，也可以同樣看待。儘管寫 niaotiao 或 tiao，這個複音詞的兩個漢字可以各有含義，並曾分用於《詩經》以後的文献的其他詞句中，也不能證明《周南》“窈窕淑女”中的“窈窕”是由“窈”和“窕”兩個單音詞複合而成的。而且，退一步說，縱然張先生從《詩經》以前的金文、甲骨文中找到“窈”字“窕”字，不能證明“窈窕”不是一個詞而是兩個詞，或人們必能懂得“窈”和“窕”才能懂得“窈窕”。而應當承認早在《詩經》時代人們已經感到有使詞兒多音節化的必要了。不然單用一個“窈”或“窕”來形容就夠了，又何必把“聲近義通”的字湊在一起構成一個新詞來表新的概念呢？“窈窕”作爲漢語中的一個建築材料的，已經用了兩千多年了。不僅可以用來形容淑女，可以用來形容少年郎，形容山水和宮室。而單獨的“窈”或“窕”，即或有單獨運用的，也轉爲其他意義了。這種例証不僅不能證明漢語是單音節語，而且恰好說明漢語詞彙中多音節詞的增長早已開始了。張先生記得，主張漢語詞彙多音節化說的人們是本來就單音詞可以結合而成爲複音詞的。如果所有多音節都是從遠古一直就存留下來的，那還有什麼“多音節”可說呢？當然，也不能從這話裏引出反面的結論，說一切複音詞都是由單音詞結合而“化”來的。不合事實。較可信的說法應該是：漢語中古來本有着一定數量的多音節詞，不過到現代漢語中顯增多，它的比重大大超過單音詞，這才叫做多音

節化。這一點張建木先生大概也會承認的。因爲他只說“聯綿詞中有好多是可分的”，並沒敢說所有一切聯綿詞都是可分的。那用來寫這種不可分的多音節的聯綿詞的漢字，總得承認它們不是單音節詞吧？

根據上述對於詞的瞭解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把全部或大部的漢字都當成單音節詞，是非常錯誤的。比如“字”“宙”“恍”“惚”“橢”“窈”“窕”都不能被當作是單音節詞而收入現代漢語詞彙中。有單音節詞的資格的只有一個“圓”字。

按照這種觀點試來分析一下同音漢字，是很有趣味的。就拿 xu 這個音節來說吧。在《同音字典》①中，rx 這一音節下面共收了 57 個漢字。我們首先把它分作兩大類：(1)古語(包括若干方言)，(2)現代普通話。

先就現代普通話部分來看，共計漢字 36 個(其中有幾個字列了幾種不同的用法)。這 36 個漢字並不都是單音詞，它實質上包括以下 5 類成分：

① 單音詞 12 個：呼，糊(煑)，屨，唬(以上動詞)；湖，胡(姓)，壺，斛，核(xù)，戶，(以上名詞)；糊(形容詞)；忽(副詞)。

② 詞素 22 個，包括詞根或詞的部分音節 19 個：(恍)-惚，弧-(綫，形)，狐-(狸)，(老)-虎，葫-(蘆)，(棲)-糊，糊-(塗)，蚶-(蝶)，蘊-(術)，餬-(口)，鬚-(鬚，子)，(鶉)-鵠，囫-(圖)，懈-(樹，葉)，鶻-(鳥)或鶻-(鶻)，琥-(珀)，(珊)-瑚，庠-(斗)，(麵)-糊。

詞頭 2 個：胡-(蘿蔔，琴)，互(相，助)。

詞尾 1 個：(斷，在，含，巍巍)-乎。

③ 擬聲或記音字 2 個：呼(的一聲)，呼(延，拉爾)。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單音詞加上擬聲的“呼”共 13 個，只佔 36 個字的 36.1%，而不能獨立作爲詞運用的合起來却佔 63.9%。就是從字典上的漢字來看，單音詞也不佔優勢。

再就古語和方言來看，共計 25 個漢字，包括以下 3 類：

① 單音詞 13 個：乎，胡(以上語助詞，感嘆詞)；呼，忽，拊，怙，(以上動詞)；吻(形容詞)；穀，鶻，滬，拈(以上名詞)，欸(副詞)。

① 張相：《詩詞曲語彙釋》，750 頁。

② 請參看符定一《聯綿詞典》第四冊卯集 13 頁。

③ 一部中型的字典，共收 10503 個單字。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④ 《康熙字典》未收這個字，顯然是據北京方言新造的。其實“煑一大鍋白薯”的 xu，仍然是“糊”的意思，就是把白薯蒸爛如糊，似乎不必多造字。

② 詞素8個：漣-(沱河)，漣-(浴)(蘇州方言)，糊-(獮)，(跋)-扈，瑚-(璣)，醞-(酬)，沍-(寒)，楷-(木)。

③ 擬聲或記音字4個：(於)-戲，唵-(地，喇)，(邪)-許，(拉)-祐-(族)。

這裏面單音詞佔52%，其餘不能單獨作詞運用的仍佔到48%。對於現代漢語說，這些古語的單音詞，或者已經死了，例如祐(幸福)，吻(昏暗)，搨(挖掘)，欸(忽然)，怙(依恃)等；或者有了更通俗好懂的说法，例如“鵝”現在叫作天鵝，“穀”現在叫作縐紗，“呼”現在叫作喊。總而言之，不能算作現代漢語詞彙的單音詞。至於作為詞素用的部分是否會在現代話中應用，那要看整個複音詞是否還有被現代語接受的價值而定。比如“跋扈”，現代書面語有時還用，而“沍寒”却大約再沒有人說了。有些專名如“漣沱河”自然保存下來，但是，是否一定要寫這麼兩個字，却值得從漢字簡化觀點統盤加以考慮。兩類字中的擬聲記音部分當然最好都完全拼音化。

分析的結果告訴我們在唸  $\Gamma X$  的57個漢字中，只有13個是現代語言中活着的單音節詞，其中“糊”這個字還是按兩個詞計算。其餘大部分漢字在現代漢語中不能算它是詞，而只是詞素和擬聲、記音用的記號。把它們都一概糊里糊塗地稱之為“單音詞”，作為現代漢語的一個語言單位來看待，是極不科學的，不能容許的錯誤。想利用這些性質不同的書寫記號的大量

存在來證明漢語是單音節語，是會給漢語的研究文字改革運動造成巨大的損害的。道理很明顯：承認它們都是單音節詞，漢語的詞法研究的對象就混亂不堪。不僅詞類不好劃分，若干詞的形態變化也忽略掉，連語言中從哪裏到哪裏是一個詞都很難確定。這最後會引導到詞的不可知論，只好宣稱無法確定什麼是漢語的詞，因此也就無法寫定詞形，因而不會有拼音文字。如果把大部分漢字都當成單音節詞，同音詞就大大增多，如果更要來保持每個字的清楚面目，甚至在不會混同的複音詞中也要拼寫出特殊的樣子來，那就必然會走上新形聲字的道路，新造出幾千幾萬個“未老先衰的”半拼音文字。可是論採用多少個新偏旁部首，你總是賽不過漢字的。形聲文字中兜圈子的結果，最後必然會回到老路上認為文字還不如以不改為好。因為漢字究竟是一嚴肅的歷史存在，有千萬卷書可看，各種字典辭書可那憑空造出的千萬個新形聲字如何代替得了它？周先生曾經表示過，希望人家不要以單音節語作為由來反對文字改革或詞兒連寫。那怎麼能作得到呢？如果承認漢字都是詞或大部分是詞，當然要儘量實行詞兒連寫；如果堅決認為漢語是單音節語，當然從理論上斷言漢字是最適合於書寫漢語的，那還怎麼改革的必要？在理論上失足落後的，從來也不可能在實踐中站在正確進步方面的。脫離文字改革實踐的語理論，最後必然會有利於反對文字改革的實踐。

(接38頁)“希”寫做  $ki$ ,  $khi$ ,  $xi$ , 把“躋”、“妻”、“西”寫做  $tsi$ ,  $tshi$ ,  $si$ , 就有困難。因為它們出現在同樣的條件之下，根據北京話的讀音無法判斷那個字應該寫做  $ki$ , 那個字應該寫做  $tsi$ 。現代北京話同一個音位  $\mu$ , 被拆到《和  $P$  兩個音位裏去了，實際上的同音字“基”和“躋”，標音的形式不同了。這會引起實際標音的困難。所以照顧字源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予以注意。但是像“電盤”的“電”、“關門”的“關”，因為出現在雙唇音的前面，韻尾的  $n$  才變成了  $m$ ，同時北京話裏又沒有收  $m$  的字，這些字單念的時候都是收  $n$  的，音位標音就該寫做  $n$  尾。又如福州話的  $[ei]$  有一類跟  $[i]$  是同一音位，只出現在陰去、陽去、陰入等調類裏；另一類跟  $[ai]$  是同一音位，出現在陰平、陽平、上聲、陽入等調類裏；本地人也覺得“音” $[iŋ]$  跟“詠” $[eiŋ]$  (古音都是三等)，驚  $[eiŋ]$  跟“限” $[aiŋ]$  (古音都是二等) 只是聲調不同，那麼把  $[ei]$  分屬  $[i]$  跟  $[ai]$  兩個音位就沒有多大困難，只要掌握了聲調的條件，就能加以分辨。

爲了把音位標音的符號跟語音學的符號區別開

來，咱們把語音學符號放在方括號裏，如  $[t]$  = 不送氣的舌尖中塞音；把音位符號放在兩根斜線中，如  $/t/$  = 我們所同意這樣寫的某一語言中  $t$  的任何分子。比方英語的  $t$  音位就包括：(1) 輕微的舌尖中(尖齦)塞音  $[t']$  ( $ten$ ,  $table$  等重音節裏的  $t$ )，(2) 不送氣的  $[t]$  ( $stone$ ,  $letter$  等等後面或輕音節裏的  $t$ )，(3) 不爆發的  $[t']$  ( $Atkins$ ,  $apartment$  等另一音節或  $m$  前的  $t$ )，(4) 唇化的  $[t]$  ( $twice$  等  $w$  前的  $t$ )，(5) 稍稍顎化的  $[t]$  ( $tune$  等  $j$  前的  $t$ )，(6) 邊爆發的  $[t]$  ( $atlas$  等  $l$  前的  $t$ )，(7) 鼻化爆發的  $[t]$  ( $mutton$  等  $n$  前的  $t$ )，(8) 舌尖前(尖齒)的  $[t]$  ( $ait$  等  $\theta$  前的  $t$ )，(9) 舌尖後(捲舌)的  $[t]$  ( $ait$  等  $r$  前的  $t$ ) 等<sup>①</sup>。

① 例見瓊斯《音位學的性質和應用》，頁10；布洛欣勃爾(B. Bloch & G. L. Trager)《語言學分析綱要》42-43。



# 关于中國語拼音化問題

——一个日本的中國語学者的希望——

寶藤惠秀

## 1 第五次中國語学研究会

我是《中國語文》的熱心讀者，从創刊号起，我就讀着《中國語文》現在已經成為日本的中國語教師們必讀的刊物。

我作為一個讀者，願意把在日本研究中國語的實際情況一下，並且對於中國語拼音化的問題，提出我的意見。

1954年10月30、31兩天，在日本金澤舉行了中國語研究会（會長倉石武四郎）第五次大會。參加這個大會的師一百多人，學生代表五十人左右。

在這個大會上討論了關於在日本教授中國語的方法。在教授中國語的目的可以分成如下的三種類型：

- 1) 作為一般文化教養的；
- 2) 培養對中國貿易的人材；
- 3) 培養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者。

在大会上討論的中心題目是作為一般文化教養的中國學問題。

作為一般文化教養的中國語被稱為第二外國語，普通內，有兩節課，全部教學課程規定期限為兩年。像這類的時間裏，要學會講、聽、讀、寫，應當用什麼樣的方法來進行教學，是大會討論的中心問題。這次會上雖然沒有作出結論，但是參加這個討論會的年輕學生最踴躍，加強了我們教師的信心。

## 2 中國語在學習上的矛盾

這次大會上沒有得到明確的結論，這固然是因為不夠，但還有一些更主要的原因隱藏在一些問題處。

日本開始研究中國語是在明治初期，最初的目的了培養外交人材，其次是培養貿易人材、軍人和一般地說，從明治初期到日本投降為止，關於中國語的目的，是為了侵略中國。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研究和學習中國語目的改變了，它是為了學習新中國的文化。

以前，選中國語課的學生當中多數是些運動選他們大都是些不太用功的學生，或者是因為曾經在中國居住過，多少能說些中國話才選這門課。因在學習上也就沒有什麼熱情。可是，現在希望認識學習中國文化的學生們增多了。特別是最近的情況在學生當中有一面已經選定了第一外國語（例如英語），第二外國語（例如法語），而另一方面申請能加聽講中國語課的學生，愈來愈多了。

這樣，學生明明知道他學習中國語並不能得到學

分，只是因為喜歡學習而來學習的。總之，學習中國語的人的品質顯著地提高了。這些不把學分當成問題而來學習中國語的學生是為了能夠早些看懂關於新中國文化的書，來建設個好的日本國家的人們。對這些學生應當用什麼樣的教學方法來教他們才合適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中國語當然也是一種外國語，首先必須教發音。在日本所使用的標音文字，有Wade式的羅馬字，注音字母，拉丁化新文字三種，並不固定使用哪一種。最常使用的是注音字母，可是查中國語字典時如果不懂Wade式就不能查字典。而內容完備的教科書又是用新文字編寫的。因此，學習中國語文的人們，必須要記住兩種或三種的標音文字。在這一點上，學中國語和學德語、法語是有不相同的困難的。

其次還有一個大的矛盾，就是：日本人是認識漢字的，日本人看到中國的報紙、雜誌的時候，能看懂的詞很多。例如“文學”、“政治”等只要看到就懂，所不同的只是發音。“文學”用日本話來讀是“bungaku”，可是不知道中國話讀做什麼。看到“文學”這兩個漢字立刻就懂它的意思，它的中國的發音“wenxyo”是後來才學的。像這樣的學習方法，在俄羅斯人或美國人學習中國語的時候是不可能有的。

日本人認識漢字，對於學習中國語，也可以說是有利，也可以說是有害。西洋人學中國語是規規矩矩地從發音學起，可是日本人正因為認識漢字，往往要把中國語在腦子裏翻成漢字來理解它。例如中國語的“kiche”，日本人不是專從“kiche”這個音來理解它，而要在腦子裏不厭其煩地翻成“汽車”這兩個漢字。可是日本話的“汽車”並不是motor car的意思，而是“火車”，所以，腦子就發生混亂。即便不如此，當日日本人在腦子裏把發音翻成漢字的時候，講話的人接連地講下去，而聽的人就聽漏了，所以，聽的能力遲遲不能進步。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僅一周有兩節課，規定在兩年的期間內作為第二外國語的中國語課，要求把內容豐富的書（理論和文學方面的書）作為課本，教得發音正確，這就使得教師們感到着急。如果力求發音教得很正確，那麼內容的教學就得不到進展。相反地，如果要很快地教內容（因為用的是漢字，這樣做是可能的），那末，發音的教學就不夠完善了。發音達到甚麼程度就算可以？在甚麼時候開始教內容？這是個

問題。

我們看過美國的《Spoken Chinese》。這部書共有兩冊，用羅馬字寫成的。即或把這兩冊全部學完了，也不能夠看懂中國書的一行甚至一個字。

據最近由美國回來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說，在美國某大學教中國語，不重視發音，只記漢字來閱讀中國的文獻。

這樣看來，我們知道在美國關於中國語的教學方法分為兩種。一種是為了能說、能听的“Spoken Chinese”，另一種是如某大學的方法。

在日本，企圖在一方面用這個“Spoken Chinese”的方法，同時在另一方面又要用某大學的方法。可是，困難的是因為時間不夠，所以這兩種方法都不能徹底做到。

### 3 中國語有拼音化的必要

在美國有兩種學習中國語的方法。在日本的第二外國語裏頭，有中國語和德語、法語，而日本人學習中國語不能像學其他外國語那樣快地理解它的內容，多半原因是在於中國文字本身。

中國語和德語、法語不同，發音和文字分割開來，漢字裏形聲字的聲符，雖是表示聲音的，但同一個聲符，現在已是大有分歧，決不可靠。如果不是形聲字，那就連發音的門路也找不到，德語和法語在第一課裏的單詞就標了發音，這個拼音讀法的原理可以應用到其他的新的單詞上，可是中國語怎樣呢？如用漢字的教科書進行學習，因為沒有拼音，所以碰到新的單字的時候，它的發音就必須要逐字查字典。

現在，日本有用新文字編寫的教科書，這是把中國語當作外國語學習，進行訓練講和听，這是很好的方法。用新文字編寫的出版物也有一兩種，並且開始着手編纂詞典。這對進行教學中國語確實可以說是一種革命。但是，困難的是不能澈頭澈尾使用新文字，到一定的時候又必須換成漢字。因為在中國還沒有使用新文字，無論看的書或是報紙、雜誌，必須要看用漢字印的東西。

於是，我這麼想：中國文字如果能夠改成拼音文字，那麼，這些困難都會一掃而空。那時最初學到的單詞拼寫的發音原理可以應用到新的單詞上，用最初學到的文字就能夠看懂中國的各种文獻！這樣，我們教中國語的成績也一定不會比法語、德語的教授差！

因此，我衷心希望中國進行文字改革，成為拼音文字的國家。

### 4 關於中國語拼音化的一些參考意見

關於中國文字改革，中國的人們已經進行了半世

紀以上繼續不斷的研究，特別是從《中國語文》創刊後討論得更熱烈，將來一定能夠擬製出很好的方案。關於這一點是沒有外國人插嘴的餘地的，不過我願把我對於這件工作的感想提出來供作參考。

我們在進行作為外國語的中國語的教學時，使用過 Wade 式羅馬字，也正在使用注音字母，又使用新文字。Wade 式羅馬字現在不用談了。注音字母新文字各有它的優點，注音字母可以橫寫也可以直寫，很方便。新文字用很少的字母就可以拼寫出詞來，也很方便。比如“四十”，用 Wade 式要拼寫成 ssüshih 但新文字是拼為 ssh。

可是，注音字母和新文字也都有缺點，注音字母  $i + (i + en)$  要讀成 in,  $i + (i + eng)$  要讀成 ing，這是太強了。新文字“親愛”cin'ai 要不是加「'」就會誤為“cinai”，這是很麻煩的。

這還是小的缺點，還有更大的缺點，無論是注音字母或新文字都有。同是一個音節，拼寫起來長短等。注音字母是 1 字到 3 字（Y ~ ㄩㄣ），新文字是 1 字到 6 字（a ~ zhuang），這樣長短不齊。（日本的原因是因為是音節文字，一音節一個字）。

還有一個共同的缺點：介母和韻母使用同一字母。例如，注音字母  $ui = gao$  的  $i = i$ （介母）和  $ui = i$ （韻母），在發音上有強弱長短的本質上的區別，可是，仍然使用同一個字母。

如果是當作漢字的注音來使用的話，那還可以，可是當作獨立的文字，在詞兒連寫的時候就會生混亂。

“ui”是一個音節呢，還是  $ui + \text{韻母}$  兩個音節簡直無法辨別。

用同一長度（時間的）發音的音節最好是用眼睛看也是同一長度（空間的）。

在這裏我提出如下的希望：今後在製訂中國語新文字時，最好全是雙拼制。如《中國語文》17 期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秘書處發表的《各地寄來新文字方案整理報告》中，關於雙拼又分為兩種。

1) [聲母] + [介母和韻母相結合的]

2) [聲母和介母相結合的] + [韻母]

其中我以為第 2) 式比較好。在上舉的報告中曾舉進先生的是第 2) 式，日本的伊澤修二也擬相當於 2) 式的雙拼制。聲母（包含介母）55，韻母共 85 個。像這樣的方案是可以作為參考的。

更進一步，我希望能夠作到在韻母單用音節訂個零聲母（無聲母的符號），用這個來和韻母相拼，雙拼制作到澈底。這樣的時候，發音的長度和用眼睛看的文字的長度完全一致，這才合乎理想。

（那一譯，文兵校）



# 汉字拼音化与汉字简化

——1955年3月6日在陕西省教育所主办“简化汉字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高元白

文字是語言的符号，它可以把語言書面化了，戰勝時間空間，和各處的人們、後代的人們接觸起來，擴大語言作社會交際工具的作用。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而文字的產生却是很遲，大概社會現了階級的時候，才由圖畫演進而成。文字自然也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但是文字的發展又有它自己的規律，就是由“表形”(代表事物)而表意(代表概念)而表音(代表音)的前進道路。表形、表意是“衍形”的階段，表音就是“衍音”的階段了。表音又有“表音節”和“表音素”的區別，表音素的拼音文字是它發展的高級形式。在這發展的長途中，各民族文字前進的里程是不同的。比如在五千多年前，埃及的文字就有形符、意符、音符三種成分，巴比倫的文字也意符上加音符了，都和漢字的“形聲”一樣，是“衍形”、“衍音”過渡階段的文字。但是三千多年以前，埃及、巴比倫的文字已經演變為表音素的“非尼基字母”了，由“非尼基字母”又演化出“阿拉米亞字母”、“舍比安字母”、“希臘字母”。從此字的支派繁衍，形成各種衍音文字。如希臘字母孳生的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成為今日流行範圍最廣的字母，為許多民族語言的書面化而服務。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都走上衍音道路了，可是我國的漢字呢？直到今天還是活動在衍形、衍音的過渡階段，不能很正確地表現優秀的漢語。它的字數多，結構複雜，一字多音，同字異體，難認、難讀、難寫、難用，又難於利用現代機械和技術，如打字、印刷、電編目的進步，都受了限制。它給我們造成的損失和帶來痛苦是非常嚴重的。先進的文字已經走出了一條歷史道路，表現出文字發展的規律，決定了漢字不能規避拼音化的途徑。我們認識了這個客觀法則，還能等待它自然地演進到符合人民利益的要求，文化進步的要求，都推動着我們，要積極地進行文字改革，為實現漢字的拼音化而努力。所以毛主席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中國語文》創刊號第4頁)

我們知道語言只能有長期的點點滴滴的變化，不能在短時間內除舊佈新，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代表語言的文字不能改變。因為文字由圖畫發展而為語言的符号，原是由人們自覺的，約定成俗，共同使用。當人們的科學知識能掌握它的客觀法則的時候，就可以定新約，成新俗，進行文字改革。這種先例是很多的。即如曾借用漢字的朝鮮、越南都改用了拼音文字了；曾借用漢字的日本也自創了音節字母，不過他們用拼音文字的時候還夾用一部分漢字而已。至於原來是表音文字又進行字母改革的也很多：如蘇聯境內各突厥系語的文字改革，就是廢除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後又改為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文字改革也是先用拉丁字母，後又改為斯拉夫字母。說到我國的文字改革運動應當

溯源於明末清初進步的聲韻學家提出漢字拼音化的要求與理想。甲午中日戰爭後的“切音新字”運動，戊戌政變後的“官話字母”和“簡字”運動，五四運動後的“國語羅馬字”運動，大革命後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給我們創造了豐富的經驗。從拉丁化新文字開始，我國文字改革運動才成為人民革命的一環，因而波瀾更加壯闊。1949年全國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國文字改革運動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首先是文字改革的同志們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空前地團結起來了，並且展開了集體研究。1950年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學說發表以來，使我國文字改革運動有了正確的理論根據。1952年毛主席指示了創造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以來，更使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的方向具體化了。

毛主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下加以改革。”(《毛澤東選集》第一版680頁)這就是說文字改革運動有了確定的方向，還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才能行通。那麼這個“一定的條件”是什麼呢？我認為至少要包括這幾點：

- (1) 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
- (2) 民族共同語的基本形成；
- (3) 完美的拼音方案的製定；
- (4) 通過新舊文字並用的過渡階段，羣衆熟習了拼音制度；
- (5) 通過廣泛宣傳，文字改革成了羣衆的普遍要求。

拼音文字方案製定了，是否立刻就能實行文字改革呢？不能。它只能初步試行，還不能全面實施。要全面實施，必須通過一個過渡時期。當然，這個過渡時期不會太長。不過漢字既然還要使用一定的時期，就不能不克服它給我們帶來的浪費時間與精力的困難，所以要實行“漢字簡化”。由此可見，我國的文字改革運動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漢字簡化；第二階段是漢字拼音化。第一階段又是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最近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內中包括三個部分：第一是筆畫的簡化，選定了798個簡體字；第二是字數的簡化，廢除了400個異體字；第三是寫法簡化，規定了漢字手寫體的簡化偏旁。它的主要精神是使漢字筆畫簡單，字形統一。這次公佈的雖然是個“草案”，但是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標誌着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由研究階段進入實際行動的階段了，並且給我們帶來了漢字拼音化的消息。

筆畫趨於簡單，字形趨於統一，本來是漢字發展的規律。因為筆畫簡單了便於書寫，字形統一了便於交際，所以漢字由甲文、金文、古文、籀文、篆文、隸書、楷書、草書、行書以至簡體字，一貫地是由這個規律支配前進的。簡體字在魏晉之間楷書盛行時代就出現了，至今已有一千六七百年，可見我們的漢字簡化工作是有悠久的歷史基礎的。這些簡體字都是歷代的勞動人民創造的，雖然統治階級污蔑它是不登

大雅之堂的“俗字”，不合正統的“破体字”，不斷地阻撓它的流行，要維持他們所獨佔的繁体字的命運，但是抵擋不住這個潮流。在偉大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革命部隊中更大量地產生了新創的簡体字。《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公佈，就給簡体字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回想 1934 年上海文化界人士曾發起“手頭字”運動，推行三百多簡体字，只有少數刊物採用。1935 年國民黨反動政府受到人民的壓力，不得不推行簡体字，在錢玄同編選的《簡体字譜》中挑出三百多明令公佈了，但頑固派紛紛反對，為漢字請命！於是又收回了成命。可見漢字簡化只有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才能通過科學研究和政治力量普遍推行開來。當然，這次公佈的只是漢字簡化的一部分，今後還要繼續擴大這項工作。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公佈之後，有些熱望漢字拼音化的同志們對它不感興趣，認為漢字是要被扔掉的東西了，何必多此一舉。他們不了解我國文字改革運動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漢字簡化，正是為第二階段的漢字拼音化鋪平道路，太性急了就不是從實際出發。也有些人不願漢字走拼音化的道路，妄想實行簡化漢字，人民得到了相當的便利，就可以消弭拼音化運動。他們不了解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第一階段的過渡作用，它只能加速拼音化，不能拖延或阻止拼音化。也有些人反對簡化漢字，認為這些“破体”“俗字”，違背“六書古義”，不合“隸書書法”，暗暗惋惜着“斯文將喪！”這是不通古而好古，不明俗而惡俗，需要我們加強宣傳工作。目前我們應當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切實研究這個草案，多提建設性的意見，以便文字改革委員會集羣衆的智慧，加以修正補充，然後正式公佈，推行全國。這一個措施將為兒童識字教育，成人掃盲教育，語文教學，印刷出版，以及各種文化生活帶來很多便利。今後更應重視漢字書法的規範化，消滅分歧錯亂現象，提高它作為交際工具的作用。

我們實行漢字簡化，不要忘了漢字拼音化的工作。希望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早日製定，按方案中詞兒連寫的規則及定

型化的規定編纂新舊文字對照的漢語詞典，實行新舊文字並用。今後要把漢字當作拼音文字的“介紹者”，通過漢字的關係，使羣衆接觸拼音文字，從而熟習拼音制度，增進他們對拼音文字的要求。新舊文字並用我個人以為可以有以下幾種方式，對與不對，提出來供大家參考：第一是“橋樑”的方式，就是羣衆讀物用“新注音漢字”排印，每個漢字銅模的上部刻着新的拼音文字作注音（四拼制的字母雖比注音符號多一字母，但字母用細長形，並無困難。）按詞兒連寫規則排版，這樣每行上邊是拼音文字，下邊是方塊漢字，羣衆先是对照閱讀，日久自然捨難就易，拋棄漢字，而專用拼音文字了。第二是“蟬蛻”的方式。就是排印或寫文章的時候，夾用拼音文字，並逐漸增多。第一階段凡外國人名、地名都用拼音文字；第二階段凡語氣詞、感嘆詞，都用拼音文字；第三階段凡介詞、連詞、繫詞、副詞等都用拼音文字。經過這三個階段，就可以全部用拼音文字了。每一階段的間接進行情況決定（主要是報章和刊物），大概不能少於一年，不會多於三年，三個階段的時間也不一定相等。第三是“圍地”的方式。就是一部分書籍、刊物、報章用拼音文字排印，帶動讀者，擴大影響。第四是“先鋒”的方式。就是鼓動一部分羣衆帶頭使用拼音文字寫日記，寫信，寫一切文章，逐漸擴大它在人民生活中的活動範圍。除此以外，當然還有其他方式。各種方式可以同時並用，經過一個時期，就可過渡到完全使用拼音文字的時代了。這個過渡時期是一種革性的過程，不能與語言的長期點滴變化混同起來，而這個過渡時期的本身並不會很長，這個時期的工作做得愈好，過渡的時間也就愈短，這就是創造全面實施拼音文字的幾個條件。我們更要認識，新舊文字並用，就是以事實作宣傳，藉以增進羣衆對拼音文字的要求。如果我們能更多樣化地進行宣傳工作，就可以更擴大推行拼音文字的效果，這就是創造全面實施拼音文字的第五個條件。文字改革的條件具備了，文字改革運動就會得到勝利成功。

## 對漢字改革問題的幾點體會

王 均

關於拼音文字的優越性和漢字改革必須走拼音的道路這些問題，談的人已經很多，道理也說的很透徹，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我個人也一向同意這些意見。只是有幾個小問題，似乎還沒有完全解決；這次由於在廣西田野工作，跑了十幾個縣，我認為，至少在我自己是不成問題的了。

一個是文字的民族形式問題。我們一向認為，音素化的拼音文字是最科學、最靈活、最簡便的辦法，而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則是拼音字母幾千年來發展、演變，最後的結晶。但是有人說，要教一般初學文化的人民羣衆來分析音素是做不到的事情，頂多能

夠讓他們學會把一個音節拆成兩半兒——聲和韻。此外，聲調的掌握也是非常困難的；至於字母形式，無論拉丁字母也好，斯拉夫字母也好，都會被認為洋字母，不是咱們漢族的民族形式，而被人民羣衆排斥。事實證明：這些同志未必能代表廣大的人羣，人民並不如他們所設想的那麼“笨”、那麼頑固保守。

我們是在廣西僮族地區工作的，我們在各地找一些僮族人民，多半是小學畢業或初中的程度，用國音標來記錄他們的方言。在記音當中，順帶教他們這些符號，聲、韻、調，各告訴他們一些代表字。選



星期以後，我們記完音，他們也差不多能基本上學那些符号了：清濁送氣，長音短音，韻腹韻尾……致差不離：有的甚至能糾正我們的錯誤。聲調方，也是告訴他們一些例字，比方拼做 na 的，當“厚”的是第一調，當“田”講的是第二調，當“臉”講的是三調……看跟哪個字的高低升降一個樣；到後來他能告訴我們，某字是第幾調。所以漢字標調的問題也會成爲一個難題。要說他們這些發音人已有相當文水平吧，那在 1952 年來賓僮文教學試驗中已經做出計：文盲班教會聲韻調只需要 49 晚（約 98 小時），習三個月（180 小時）就可以寫歌、寫信、認課文（袁驊等：《1952 年僮族語文工作報告》，第 37—38 頁）。說明初學文化的人民羣衆照樣是有分析音素的能力，且不說學習文字還不是隨便拼，依然是要照定型拼法“記生字”的。

字母形式呢，我們在各縣開過一些座談會，蒐集一些意見。我們接觸的對象絕大多數是學過漢文，也有少數人不識字。許多人能用漢字寫僮歌，其有的字是我們不認識的僮族方塊字（參看章慶穩《廣僮族的方塊文字》，收在《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現狀》一書中）。幾乎沒有什麼人留戀他所學會的這一方塊字。學過英文的怕拉丁化拼音文字像英文那麼學，經過解釋以後，知道英文難寫是由於我們不懂個話，難的不是字母，他們也就沒有意見了。這說“民族形式”的實質在語言，只要拼的是僮語或漢語，拼出的文字就會是僮文或漢文的民族形式，這種想是不難接受的。死抱住漢字不放或以爲頂多能把音字母之類東西當作“民族形式”的只是一部分不學習新文字，又怕“反而變成了文盲”的識了方塊兒字的少數人罷了。

一個是方言問題。當然，我們的拼音文字將是全國一的。國內方言的分歧一時不容易消滅，要教一般民羣衆學習文字之前先得學會標準語，豈非不近情的要求？是的，要叫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農民學好一口的北京話，然後才許他學文字，確實不近情理的。可是困難似乎也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大。我們這一組人這次走過的主要是廣西省南部的族地區，那裏除僮語外一般地是說“白話”（粵語），是我們發現，會說“白話”的多半也會說普通話（桂話）。事實上普通話的勢力已經打入每一個說“白話”區域裏去了。拿廣西省來說，差不多每一個縣的縣政府或貿易公司等，都能找到說北方話的同志，縣的幹部也多數會說普通話，有的領導同志就是用方話在幹部羣衆大會上做報告的。其他非普通話區的省市，據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也都是如此。北方到南方工作，各地代表到首都開會，人民解放軍復員還鄉，各地參軍子弟在解放軍的“大學”裏的陶，城鄉之間，各縣各省之間的物資交流和互相參觀

學習，全國各地廣播站的普遍設置和電影隊的巡迴放映……隨着解放後全國政治經濟的空前統一集中，人民的空前團結、交通的空前發展、新工業基地的建立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地方主義的封建藩籬拆毀了，各地的方言也正在日益彼此接近，統一的民族共通語正在逐步形成，作爲統一的民族共通語底基礎的北京話的勢力，已經滲透到全國每一個角落！目前舊的漢字還正在普及文化的教育過程當中爲各地人民學習着，在將來不同的方言區學習統一的拼音文字當中，舊的漢字依然可以起一定的橋樑作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各方言語音上的差異，是有對應規律可尋的，要變，是一套套地變的，不是亂七八糟沒有條理地變的；而學習文字究竟是學習文字，將要有正字正音字典，字的拼法也還是要記的，不過能懂普通話，“記生字”也就不會有多大的困難，比起記漢字學漢字（我是指的方塊兒舊漢字），不知道要容易到多少倍！而現在，能懂普通話，已經不是一件難事了；事實上，多數的農民也正在逐步地懂得它了，更不用說工人、戰士、教師學生等其他的人了。有了統一的拼音文字，對於幫助全國人民學習標準語，加速民族共通語的建立和鞏固，其作用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此外有一個詞兒連寫的問題，這將由課本、詞典來解決，搞創作、寫書、寫文章的人寫對了，學的人就可以摹倣。只要能有一致的規範，也是不難學習掌握的。

這幾個問題解決了，我們對漢字改革的前途就可以非常樂觀而不會有任何疑慮了。

二月號勘誤表

頁	欄	行	誤	正
35	左	19	肚子疼—魚肚(1—√)	肚子疼—魚肚(√—√)
36	右	倒10	在韻尾後頭	在入聲韻尾後頭
37	左	12	(代替原文的)[ɿ]	(代替原文的)[ɿ]
37	左	倒15	сретный	светлый
37	左	倒 3	[urəmɲo:]	[urəmɲə:]
37	左	倒 2	[oləmɲo:]	[oləmɲo:]
37	右	6	[khtɿ:ɣ]	[khta:ɣ]
37	右	倒12	,k 丟	,kh 丟
38	左	倒 8	[tɕɿ](知)[tao](道)	[tɕɿ](知)[taǒ](道)
38	左	倒 7	[ʋ]	[ʋ]
38	右	13	[m:]	[mi:ɿ]
38	右	18	ε'ιδωλολ άτ'ρης	ειδωλολάτρης
39	右	倒 2	加上一個[w]	加上一個[w]

# 我对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的几点体会

藏族 鍾秀生

我們的祖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兄弟民族的社会發展是很不一致的，所以各民族的語文發展也很不一致。除漢族以外，各少數民族中有的原來就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有自己的語言而沒有自己的文字，尚待創造。由於在歷史上各民族長期地遭受着民族压迫，經濟与文化的發展水平一般地比較低，很多兄弟民族缺少文字与文献，缺乏用本族語言來授課的学校等等。這種情况嚴重地阻礙了各民族的發展，並使他們的語言中缺少或根本沒有表現科学、技術、哲学、政治及經濟等概念的詞彙。解放以後，人民当家作主了，政治生活中最常見的“人民”、“民主”、“社会”、“憲法”、“公民”、“選舉权”、“投票”這樣的詞兒都才在許多民族語言裏開始創造，或借用漢語。又如有些少數民族雖有自己的文字，但由於廣大勞動人民在歷史上長期地得不到讀書識字的机会，讀書成爲一小撮上層分子和統治階級的專利权，語言——尤其是文字——中夾雜着他們的方言、習慣語和同行語，以煩瑣哲学的風格和誇大的言辭眩耀於口头和紙上，遂使文学的語言遠離了人民。这一切情况，嚴重地阻礙了各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思想的交流、政策法令的傳達。列寧和斯大林屢次地教導我們，苏联各族人民只有用本族語言才可以參加社会主义的建設，才可以接受並發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才可以建設自己民族的、苏維埃的國家生存。苏联的昨天就是我們的今天。問題很明顯地擺在面前，我們少數民族語文工作者在國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時期裏，主要的任務是按照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語言發展的歷史的道路，用各民族現存語言的主要因素的發展与改善的方法，和社会本身的發展及民族的發展同時進行，以求得各民族語言中的新質量、新因素的逐漸積累和丰富，創造高度發展的社会主义工業、農業和具有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內容的文化。無疑地，爲要達到這樣的目的，語文工作者在今後的民族工作中，应当爲實現國家的總路綫而尽最大的努力。

我們的國家循着總路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時候，我們語文工作者的最重要的任務可能有下列幾項：

(一)調查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必需有專職的人員，

長期地深入研究一種語言或文字，而且应当研究得湛深刻。許多年來我們語言學者們在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上做了不少的工作，雖然也有了一些收穫，但我們毫無滿足於這一點成績的理由。在調查研究少數民族語文時，語言學工作者們在某一個地區花上幾個或至多一二年的時光，記記音，寫寫千把個單詞單後，再翻翻外國人寫的有關該語言的書籍或文章，大寫文章介紹某民族的語言(或文字)。表面上看來的頭頭是道，如果把他們搞的東西仔細研究起來，問題一定就不会少了。事實上這位語言學工作者自己像樣點的該民族語言也許還說不上口，這種情况在國是常見的。本來學習一種語文是不容易的，調查研究一種語文事實上就是學習一種語文，所不同的是進去學的人是一個語言學家，他們會用語言學的方法。他們的方法是科学的，但科学的方法用得不深入，用得不恰當，是不会得到什麼的。例如李方桂先生了一篇《藏文前綴音對於声母的影响》<sup>①</sup>（我不知道對藏文用過多少工夫），一開頭就把三個字头和五個綴子音看作同樣的東西，而且他還不知道前綴陽音母“b”後面可綴的字基字母有十六個之多，僅這一點就够了（還有許多錯誤，這裏不去談它了）。但是解放後我們還在1953年6月號的《新華月報》（又見《科學報》1953年4月號）上看到某位語言學家替他這篇文捧了場，認爲是近幾十年中重要的論文之一。有一位名的藏文專家，在他學習六年多藏文後，譯了一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五，1930），看了他的序文後，可以知道他已翻查了他能翻到的所有字典，問遍了他所能到的人，可是他還可笑地把ga-pho譯作“牡鹿”（171頁），還在書尾巴作了一個可笑的註（178頁）。把“mskyed-a-ma”（44頁）譯作連漢文裏也莫明其妙的“宋娘”（176頁）等等，這樣的錯誤在該書中是舉不勝舉的。這兩位是大家心目中的權威學者，可是連最淺

<sup>①</sup> 文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分，135—157頁。本例見該書135頁。該文是用英文寫的，題目是《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最通俗的东西，只要搞通藏文的人就应当知道的東西，他們却不清楚。然而他們的作品長期的欺騙了許多人，被欺騙的包括了學者專家，中國人和外國人。

目前我們對全國各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尚未普遍和深入，對整個語言情況尚未能夠清楚地了解，已經得到的資料的研究還有許多問題；因此，我建議今後在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上應當分分工，應當反對“樣樣懂，門門瘟”的膚淺的不踏實的作風。我們也希望不要在瑣碎的個別的語音及其變化和一些簡單的用字造句上打圈子，像瞎子摸象似的。我們希望的是先把每一個民族的語言的歷史發展和現在通行語言的全部情況了解清楚，掌握住它的語音、語法及基本詞彙，找出它們的正確的發展前途，並想办法利用先進民族和本民族的語彙去充實其文學語言、科學與政治術語，使各民族的語文隨社會的發展而全面地發展與豐富起來。我想，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的調查研究，就不會脫離現實了。

(二) 應當替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創造正確可用的文字。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有的民族有為人民大眾日常生活中所應用的文字，有的雖有文字，但僅供宗教上的應用，而不是人民羣衆所能懂得和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去的，有的民族則根本沒有自己的文字。除了有文字而能夠適合於日常應用者外，必須替他們創造合用的新文字。1954年5月20日，政務院舉行的政務會議上，羅常培委員作過關於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問題的報告。其中提到的沒有文字的各少數民族的語言的七種情況是符合實際的，這是由於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的原故。因此，報告提出了一個創訂少數民族語言的文字的基本原則，即：“對於有自己的語言而沒有文字或沒有通用文字的民族，根據他們的自願選擇，應在經過一定的調查研究之後，幫助他們逐步制定一種拼音文字，或幫助他們選擇一種現有的通用的文字。在制訂或選定一種文字推行之前，各該少數民族得依原有習慣沿用漢文或其他民族的文字”<sup>①</sup>。此外，我們應當着重指出，我們一定要向蘇聯學習。十月革命成功後，蘇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根據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創造了許多新的文字和改革了許多舊的文字，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實在值得我們去學習。這樣就會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少犯許多錯誤。

在新的少數民族文字方案的創製工作上，我們的語言學專家們已盡了一些力量。可是有一點必須指出，我們的語言學專家們可能存在着這樣兩方面的偏見，是否正確，尚希討論研究：

過去馬爾和高本漢（瑞典人）等人以為漢語是“單音節”語，同樣，許多漢藏語系的語言也被許多資產階級學者看作是“單音節”語，語音方面也跟漢語一樣，認為“聲調是區別意義的因素”。從這個立論出發，把每一個詞中的每一音組看作獨立的音節，定出幾個標誌聲調高低的調號，放在每一個音節的後面。甚至把語言與音樂混淆起來，用五線譜表示聲調高低，企圖說明自己的主張。現在我們看看蘇聯漢學家康拉德和中國的瞿秋白同志對所謂“單音節”和“聲調”的看法怎樣。

康拉德在他的《論漢語》一文裏說：“單音節性不應該成為漢語詞彙的必要標誌，依照詞的音節數目來把詞彙分成不同的類型是毫無根據的。聲調也只是隨意選擇的標誌<sup>②</sup>。”我個人認為他的話是有道理的。康拉德在這篇文章裏以很長的篇幅——幾乎佔全文四分之一——敘述了他的意見，這些意見給予強調單音節和聲調的人以有力的駁斥。瞿秋白對聲調問題認為“我們主張聲調的拼法是不需要的，現代普通語的聲調尤其沒有表示的必要，因為它本身就很模糊<sup>③</sup>。”他認為用五線譜表示聲調，只是學院裏研究音韻學的工夫，不能寫到文字裏給幾萬萬人用。聲調是漢語的產物，單音節的說法也開始於漢語，學院式的語言學家們因而認為與漢語有親屬關係的漢藏語系裏的其他語言也不能不有它，因此也就移植過來了。我認為這些文章不但對漢語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對今後漢藏語系的其他語言的研究也有極大的啟示。

另一方面，在同一語言中不顧實際情況地強調方言差別，分出幾個或好幾個方言，根據這些方言來製訂一些記音符號（不是國際音標而是類似拼音文字的東西），於是同一個民族的語言中又為不同的方言創製了兩三套不同的記音符號，把這些符號教給學生或用以記音。例如藏語分為拉薩和安多兩種方言的符號（也許還會搞出其他方言的符號），苗語分為黔東、黔西和湘西方言，並個別地新製了記音符號等等。我是不懂苗語的，但以我們的藏語來說，拉薩人和安多人是能夠互相談話的，他們用這兩個方言達到了交流思想的目的。必須指出，藏文（包括字形與讀音）在所有的藏族區域基本上是一致的、統一的。這樣強調方音而把一

① 見1954年6月5日《人民日報》。

② 康拉德：《論漢語》（彭楚南譯），中華書局，1954年12月第二版，第36—37頁。

③ 見《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12月北京第一版，671頁。並請參看該書670—672頁的《聲調問題》。

種語言分開來，恐怕是沒有益處的。事實上，拉薩方言和安多方言並不比漢語的北京話和湖南話相差得多。一個民族語言是會有許多方言的，我們的語言前途應當是向統一的和一致的上去發展，以求得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大家知道，德國的方言是很多的，但德國文字却是統一的。人們沒有在教學或研究德語時另外再替德語搞什麼幾乎相當於另一種文字似的記音符号。

強調聲調、過分強調方言差別、強調單音節、過分強調用字造句中的細節，這種鑽牛角尖的情況，在近幾十年的中國語言學界不為不嚴重了，現在又把這種風氣帶到少數民族語文研究工作中來，這種以形式主義的方法和態度來對待語文工作的情况，是我國少數民族語文發展前途的絆腳石。

另外，西南少數民族中有一些過去帝國主義國家的傳教士創製的文字，那些文字有的已深入羣衆而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少的工具了，但我們還有責任去分析研究它。如果它是好的、合用的、有發展前途的，就必須保留和豐富它，利用它來為社會主義的文化服務。有缺點和錯誤的，應當修正或予以適當處理。

(三)要嚴肅而認真地去創造新的詞來充實各少數民族的詞彙。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商業和運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和科學的不斷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來充實它的詞彙，並改進自己的文法構造<sup>①</sup>。”全國解放以來，我們少數民族在短短的幾年中，生活面貌大大地改變了，而且正在加速度地改變着。由於政治制度的改變，“人民政府”、“自治區”、“民主”、“公民”……等新的詞語及其概念吸收到各民族語言中去，這些前所未有的詞在工作幹部和羣衆間起着保證思想交流的重要作用。在很多少數民族地區，我們已經、正在或將要建立大小不同的工業、農業、牧業等生產機構；公路、鐵路和水、陸、空交通運輸事業正日漸向從來沒有這些東西的地區進展。由於生產已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百貨公司和合作社遍佈全國，而且日益增多起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正在不斷地改善着。由於各地的學校教育工作的逐漸發展，文化生活逐漸豐富起來。各民族的各式各樣的代表、參觀團、學生等來內地參觀和學習的機會比從前增加多了。這一切促使各民族的語言迫切地需要新的詞和語來充實自己的詞彙，從而保證用自己的語言來作為真正的交流思想的有力工具。這種需要已經開始了，隨着總路線的實施，其迫切的程度是會與日俱增的，許多人都看到了和感覺到了這一點。事實上，廣大羣衆和語文工作者及其他工作部門的工作人員，尤其是翻譯工作者，幾

乎每天都要造一些新詞兒來充實自己的詞彙。根據我自己從事翻譯的實際經驗，感覺到新詞嚴重地不足是現階段少數民族語言發展上的首要問題。因此，在語文工作中，新詞的正確創造，成為少數民族語文工作者的頭等重要任務。

我認為我們在創造新詞的時候，應當注意到：

(1)每一個新創造的詞應當是能夠把它所反映的對象的一般的和本質的屬性正確地表現出來，並應能夠在人們思想上建立對某一對象的正確概念。

(2)語言的詞彙所據以發展的所有法則必須都是客觀的法則，也就是說，詞義的構成應當是全部社會生產的發展所確定的客觀法則過程，而不是任何人能夠任意製造的。例如有人曾把“集體農莊”譯成藏文時譯作 shing-tsal-bu-geig-tu-bsdus-pa (即小塊土地拼起來的意思)<sup>②</sup>，這是譯者忽視（或者真的不知道）客觀法則而造成的顯著錯誤。

(3)吸收進來的外來語和新造的詞，應當使它變成民族語言的有機部分，以達到真正豐富該民族語言的目的，而不破壞該語言在長期中形成的規則。

(4)有一些原有的詞的意思，應當根據概念的發展而獲得新的涵義。

(5)新的詞應當在實際工作中一點一滴地去積累，而且造一兩次不定就能行得通，一個詞往往需要不斷地經受考驗和修改，才能定下來。如果拿一本其他先進民族的新詞典主觀地去硬譯，不管用在句子裏時妥當不妥當，那一定不會成功，但仍有些人硬要這樣幹，是很不對的。

(四)應當深入研究語法構造。我們看到一些從漢文譯為藏文的書，譯者在翻譯時，每句漢文裏有什麼字，就硬頂上去一個意義相同的藏文，湊成了整段整篇的文章，結果使藏文很好的人也看不懂。聽說用其他民族語文翻譯的書籍也有類似的現象。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即譯者沒有很好地研究語法，致使譯文成了不容易了解的東西；這樣就大大地降低了譯文為傳播思想的工具的效用。更危險的是，由於不能掌握語法而產生政治上的錯誤，例如藏文版《人民畫報》曾經把“控訴惡霸王松濤”譯作“向惡霸王松濤告狀”<sup>③</sup>。有些書報上，把解放軍譯作 bkyings-bkrol-dmag 而成為“被解放的軍隊”的意思，這是多麼可怕的錯誤啊！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8頁。

② 見《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文件》一書裏的《政治報告》的譯文中，民族出版社藏文譯本，7頁第1行第1版，第1次印刷。

③ 見《人民畫報》藏文版1951年7月號第47頁第8行的說明。



我們对各少數民族語法研究是沒有基礎的，所以當組織力量，深入研究，把民族語言的詞的變化和詞造句的基本共同之點綜合起來，組成可靠的語法則，語法定律，打下良好的語法基礎。這也是當前重要的任務。

(五)必須改進語文的教材和教學方法。掃除文盲提高文化是我國各民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要問題之一。爲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建立用民族語文的正規的學校制度，使羣衆能够迅速地握自己的文字工具，我們必須找出切實可行的教學法和編寫科學的語文教材，並加以實驗和改進。如效果良好，应当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推廣。想，我國少數民族中所有通用文字，大多是拼音文，拼音文字从羣衆學習和運用的簡便上來說，比漢的方塊字優越得多，因爲它不需要什麼“拐棍”的幫，而且不像方塊字那樣難寫、難認、難記、難用。並不是說少數民族文字的教材編寫和教學方法就沒問題。

提高文字的教學效果和使教學方法和教材的現代是發展少數民族正規教育工作和掃除文盲工作必不可少的條件。要使教學方法和教材現代化，首先應去研究語言的語音、語法、詞彙等；一定要把語音掌握得很正確，語法規律務使切實可靠，詞彙也尽可能選擇一下常用的基本詞彙。有了這些起碼的“本錢”後去着手編教材，研究教學方法，才是比較踏實的法。在編教材時，結合各該民族人民的社會實際生的內容是很重要的，翻譯或抄襲其他民族的課本的

取巧辦法是極其愚笨的。所以課本的編者必須是對某一民族的生活習慣和社會情況十分熟悉，有相當的民族政策的水平而對教育科學有一定的研究，更必須對民族文字有素養的人去擔任。具備這樣條件的人恐怕是不會多的，但我們培養這樣的人材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培養這樣的人材才能擔任這樣的工作。

有的少數民族由於具有較長的歷史，文化發展比較早，歷史文獻比較多，文字也比較古老，離開口語比較遠些。爲了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文字的口語化是非常必要的。文字的口語化並不等於語言的革命，也不是什麼“爆發”，也不是濫用方言俗語就算口語化；這樣只能引起文字上的混亂。應該使文字接近或成爲民族共通語，就是說使文字得到更廣大的用途。事實上，口語化就是文字的新的發展方向，使他變成更好的爲羣衆服務的工具，絕不是要馬上消滅原有的語文。

如果有一個民族的文字已經遠遠地脫離了口語，而不想辦法使它從新口語化，那麼這一個民族的新的文化發展就等於受到了某種程度的限制。因此，對本民族的利益來說，文字的口語化应当由該民族自己起來主動地去做。

教材的編寫和教學方法是一門科學，文字的口語化也需要用科學的方法去處理，並應要求不斷地改進和完善起來，固守着老一套而不求進步是不對的。

上述幾個問題，是我認爲我們祖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少數民族語文工作者非做好不可的任務，當然，少數民族語文工作中還有其他許多別的工作可以做，這裏不必一一列舉了。

## 語言的形態學分類法 (語言學名詞選譯)

力 山 譯

語言的形態學分類法 (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ов) 按照詞的結構原則，不管它們的親屬關係而把世界語言分類的方法。按照這一原則，世界的語言分爲詞根語、膠着語、多式綜合語和屈折語 (兩種類型：印歐的和閃族的)。在詞根語 (漢語類型的) 裏往往缺乏詞形變化的附加成分，它們的詞不變格，也不變位，只有小品詞具有輔助詞和構詞附加成分的功能。詞序在這些語言裏具有重大的意義。在膠着語裏，詞由個別附加成分或者詞根的附屬部分組成，而以非常明顯的形態學結構而著稱。每一附加成分往往有一個意義，雖然也會遇到具有兩個或多個意義的情況。屈折語的特徵是詞幹跟附加成分的密切聯系，這個最明顯地表現在所謂接合 (флексия, 詞幹和附加成分的連接) 裏，請比較，比方，俄語 друг [朋友]，復數 друзья, долг [債務]——должный [應當的] 等等。在屈折語裏，有時也會遇到所謂內部屈折，表現爲詞幹元音的變化，比方，英語 foot [腳]，復數 feet，阿拉伯語 كاتل [他殺死了]，كُتِل [他被殺死了]。屈折語又分爲綜合語和分析語。在綜合語裏，廣泛利用附加成分來表達詞跟詞之間的各種關係。分析語的特徵是利用各種輔助詞，使用前置結構代替格位，使用動詞的描述形式，使用副詞表示比較級。

多式綜合語的特徵是它有代表詞的一個複雜的整體——也是句子：動詞具有主詞和賓詞，具有修飾詞和狀態詞。形態學分類法的基本缺點是它的不精確性，因爲詞根語、屈折語和膠着語各類型的個別特點可以在各種語言裏碰到；可是作爲一般的公式，說明語言中個別特徵的優勝，它仍舊沒有失去它的意義。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28卷)

# 鎮寧民族中學解決語言隔閡 提高教學效果的經驗

任以均

全國各兄弟民族，在黨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隨着政治經濟上的變革，文化教育上也有了空前的發展。黨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是對某些地區有獨立語言而無文字的民族，一方面積極幫助他們創造文字(已正在草擬方案)，另一方面按自願原則，採用漢族語文進行教學；這種措施在爭取時間發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文化上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採用漢族語文進行教學，目前由於民族師資的缺乏，大部份課程不得不由漢族教師擔任，這自然會由於彼此間語言的隔閡而影響教學效果。爲了及時解決這一問題，貴州省教育廳曾於1953年9月間指定我校研究“通過語文教學及課外練習來解決教學中的語言隔閡問題”，以期取得經驗後，進一步適當地來解決這一問題。一年以來，我校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已初步摸到了一個方向。現在就把我校在摸索過程中所獲得的一些經驗來談一談。

## 一 從學習民族語言着手

民族中學的學生原來大半是不能很好地掌握漢語的，民族中學的漢語教師必須懂得民族語言及其語言規律，然後才能在教學上用兩相比較的方式，說明兩種語言規律的異同，以啓發民族學生的悟性，使之懂得快，記得牢。我校教師是在下述兩種情況下學習民族語言，並初步摸索到語言規律的：

(1) 我校從1950年創辦以來，一向提倡和尊重民族語言，少數民族同學不管在學習中活動中都是使用本民族的語言，因此教師們耳濡意會，日子久了，也就學會了一些生活上、學習上經常使用的語言。

(2) 由於我校民族團結工作日益開展，師生關係一向正常，所以教師們喜歡在課餘飯後經常跟學生們談話，從無數類似的語句結構中分析歸納出共同點，即語法規律。

現在，我校部分教師已能聽懂幾乎全部民族語言，而且也能說一些<sup>①</sup>，這是長期學習的結果。這個成果之取得，主要是由於我校能夠密切結合各項工作，相互推動，使師生之間在感情上日益融洽和深厚，從而

使教師們更安心於民族教育工作，如有的教師表示：“只要組織上不調我，我願在此教一輩子。”這是摸索民族教育特點的一個重要條件。

## 二 重視詞彙教學的工作

少數民族之所以不懂漢語漢文，一方面是由於他們沒有掌握漢語語法；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他們佔有的漢語語詞比較貧乏，同時對於這些已經佔有的語詞意義了解得還不深刻，因此，在閱讀上就發生困難，在寫作上就是用辭不當或者辭不達意。可見詞彙教學是很重要的。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裏科學地指出詞彙是構成語言的“建築材料”。校少數民族同學，主要是佈依族，他們過去長期遭三大敵人的壓迫，僻居山野，生活簡陋，作爲語言“建築材料”的詞彙是比較貧乏的。解放後，由於客環境的變化，實際生活的改善，他們的語言已經開始極大的變化，產生了許多新詞，如dou na(地主)、pan na(土改——即分田)等等<sup>②</sup>。也吸收了不少的語詞彙，如領袖、民主、建設、光榮、參軍、勝利、和等等。但終以解放後時間尚短，新詞的產生，不能趕客觀需要，因此，他們在寫作時，往往覺得有不能把想全部表達出來的苦惱，有時隨便使用，造成辭不達、錯誤混亂等偏向。如：“老師愛護同學”說成“老師戴同學”，又如：“na-tonj zau je-pai la-mo leŋ-tin”句佈依族的話，原意是相當美麗生動的，意爲：我們田壩看去像白霧一樣廣大無邊。可是在作文裏譯成語時變成“我們的田壩看去一片漆黑”，這完全是由用詞不當所造成的錯誤。“la-mo-leŋ-tin”原意是白一樣看不到邊，他以爲漆黑夜晚也是看不到邊的，此就把“la-mo-leŋ-tin”譯成一片漆黑。這種錯誤應

① 我校絕大多數是佈依族同學，所以教師學習的佈依族語言，文中所舉教學上的事例也以佈依族同學對象。

② 文中佈依族語言均用拼音字母記音(我國通用的音字母因不能全部記出佈依族語言，故不用)，以鎮寧屬之佈依族語音爲準，與其他區域的佈依族語音有相當差別。



於教師在詞彙教學上不够細緻。

我校語文教師掌握了學生對詞彙積蓄不够與胡亂用等情況，對症下藥，首先防止學生的急躁情緒，明教一個，懂一個；懂一個，用一個；學一個，多一個；比貪多誤得，學而不能用或胡亂運用要好。在教學上採取以形象化的語言，或具體事物來解釋詞義，密切結合課文的方法來進行詞彙教學。如課文中“豐饒”“絢爛”“蕭索”等抽象的詞，在佈依族同學的話中是很少出現的。如以詞釋詞，他們不但領會不了，反地會增加他們更多的疑問。所以我校語文教師是合實際情況，用前述方法來解釋的。如講“豐饒”一詞，就拿學生所熟悉的事物，先用口頭敘述，輔之以表情手勢描繪出一個“豐饒”的景象來，再向學生提出：如我們看見這一景象時用什麼詞來表達思想呢？在此，就將“豐饒”一詞寫在黑板上，這是第一步；再結課原文句，上下文的具體內容加以解釋，原則是：詞不離句，句不離文，這樣可避免孤立地解釋詞義偏向，這是第二步；最後向學生提出漢語規律，說“豐饒”一詞的詞性，指出它是用來區別事物的情況，一般是加在名詞上面的，而佈依族語言規律，形容詞安放在實體詞後面的。這種區別要加以說明，如：“豐饒的大地”，佈依族同學說成：“地大豐饒的”。

同時在詞彙教學上必須結合學生接受水平，注意量與鞏固問題。要使學生學得大量詞彙，必須每次習，每次加工，把新的建立在舊的鞏固的基礎上才日益增多地積累一些詞和語。所以對佈依族同學的詞彙教學，必須和實踐(使用)結合起來。我校語文教師除了對新詞經常給予造句練習外，在作文時教師是細心注意着同學的表情，只要見到某一同學眉头皺，估計他對用詞遲疑不決或感到找詞困難時，教師立即走到他面前給他解決疑難，這就是指導實踐，好鞏固工作。

### 三 注意直觀性教學原則

在民族中學的教學上，除了和一般中學一樣，需全面貫徹五個教學原則外，其中特別要重視直觀性教學原則。

我校各科教學上如何貫徹直觀性原則問題，因敘述起來相當冗長，可以從略。至於語文課方面，除了前已經說過的以外，如講授抽象詞語時，需要就學生所熟悉的事物，先用口頭敘述，輔之以表情手勢描繪出一個所要說明的景象來進行解釋；又如講語法時，需提出民族語言規律來對比，然後以顏色粉筆區別出不同的地方等等。此外，對於課文內容的講述，需要

語言形象化，有時還須進一步用民族語言來敘述，對於民族學生比較生疏的名詞，尤須注意直觀，需要繪圖說明的就繪圖說明，不能繪圖的要提出民族學生所熟知的稱呼。如我校教師講到“粟”一詞，民族學生幾乎普遍搞不清楚究竟是什麼，繪圖說明，既嫌瑣碎，又不容易畫好。結果提出“粟”就是“Yo fun”，才豁然大悟。從以上這些細小的事例中，說明教師在教學上注意直觀是可以減少彼此間的語言隔膜的。

### 四 掌握佈依族的語言規律進行教學

佈依族的語言規律是不同於漢族的，其最突出的是詞序的不同，比如：“美麗的紅花”這一主從短語，佈依族同學卻說成：qo-io din fo-net thou。(花紅美麗的)，按漢語語法來說：“美麗的”叫加詞，“紅花”叫端詞，加詞必須放在端詞之前，可是他們恰恰相反。不僅如此，凡是限制或修飾名詞的詞，不管原是形容詞，或者原是名詞，一概放在名詞後面。如漢語的棉衣、草鞋、絲線、冷水等，他們說成：pu-fe(衣棉)，ye-niu(鞋草)，mai dei(線絲)，rianjaek(水冷)。除了形容詞外，副語、補語在句中的順序也和漢語不同。如：“他的練習做得很快”，他們說成“練習 ti ku nian t'ou(練習他做快很)”。又如：“我寫完了文章”，他們說成“kou ku 文章 liau fa liau(我做文章完了)”。由於語句結構上的不同，因此他們在作文時也出現了許多跟漢語詞序不合的語句，如：“用葫蘆嘴歪裝茶。”即：“用歪嘴葫蘆裝茶”。

此外，又由於他們沒有語尾詞，如漢語名詞的“子”“兒”等，都放在名詞之前，並且名詞前面又有冠詞，如係動物，大部分在詞首加上“tu”，如：tu-wen(人)，tu-mou(豬)，tu-kai(雞)，tu-ma(狗)。凡係日用器具都加上“de”，如：de-tson(桌)，de-tan(凳)，de-tui(盤)，de-tsun(杯)。因此佈依族同學對於哪些名詞的詞尾要用“子”，哪些名詞的詞尾要用“兒”，或者兩者都不用，他們弄不清楚。在寫作時往往把詞尾“子”“兒”混用，錯誤百出。有時還加上一個冠詞，如“爸爸在家看杜(tu之譯音)牛”。

我校掌握了上述情況以後，就在語文教學時提出分析雙方語句結構上的異同，幫助佈依族學生弄清漢語規律。同時在教師講解課文方面，也得到很大便利，懂得快，效果大。如講“敞口船”這個詞，教師先在黑板上畫出一隻敞口船，使學生先有敞口船的觀念，然後就這詞作細緻的分析，說明這詞是“敞口”和“船”這兩個詞組合成的；“敞口”在這裏是形容詞，是用來區別這個“船”不是其他的船，而是“敞口船”。敞口

是附加在名詞“船”的上面的。再就“敞口”加以分析，“敞”是用來區別“口”是敞的不是其它形象的。“敞口船”這個例子說明漢語規律：形容詞是附加在名詞上面的。然後指出“歪嘴葫蘆”，佈依族同學說成“葫蘆嘴歪”，這是由於他們語言規律是把“歪嘴”這形容語放在葫蘆一詞下面，又把“歪”這形容詞放在“嘴”這名詞下面。經過這樣講解，不但加深了課文的領會程度，而且糾正了寫作上的混亂偏向。

## 五 講授時語言速度要特別放慢

佈依族同學初學漢文是相當困難的，因為語言規律不同，必須在腦子裏經過一道翻譯工作才能領會。

根據他們反映：“遇到老師講解長的句子，或尚未分鞏固的詞語時，須要經過語法上的對比和重溫記憶，否則，不易領會”。這是語言不同所造成的教學上的障礙，因此除了教師的語言要深入淺出，並利用他們已有的概念來幫助其形成新概念外，講解重點教材時，還要把語言速度特別放慢，甚至重複，以便每句話都能使他們在腦子裏有迴旋的餘地。如果教師說話像放機關槍，那末學生腦子裏留下的只是一縷煙，其效果之低是可以想像的。

以上是我校一年來在教學上摸出來的點滴體會，是否正確，還不敢下斷語，目的是在拋磚引玉，請大家研究指正。

# 我們需要一個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

周 有 光

不論明天的拼音文字採用新造的字母還是採用國際通用的字母，我們總是需要一個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作為國際間文化和商業往來中譯寫漢語的應用。這個需要是很迫切的，希望能夠早日制訂公布。

我們的國際往來將日益頻繁。跟中歐東歐用拉丁字母的人民民主國家的往來中，跟亞洲用拉丁字母作為國際文字工具的國家的往來中，跟歐美其他用拉丁字母的國家的往來中，我們每天都要用到拉丁字母的漢語譯寫。我們的人名、地名以及各種事物的名稱，都必須譯寫成拉丁字母才能被他們接受。可是，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新華社還在應用古老的威妥瑪方案（例如“新華”寫成 Hsinhua），我們竟還沒有一個自己的譯寫方案。

事實上我們並不是沒有，而是已經有了兩個，即國語羅馬字（1926 擬訂，1930 公布）和拉丁化中國字（1931 擬訂）。這兩個方案都比威妥瑪方案好。可是有人偏偏一個也不中意，寧願鍾愛洋人擬訂的缺點很多的古老方案。

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中國字都是中國專家們集體研究的成果。假如今天認為這還不夠好，更要提高一步，那麼，就只有把二者之長集中起來，昇華成一個更完善的方案。

羅拉兩式，共同之處多而不同之處少。它們應用拉丁字母，都不造字，不加符。在 21 個聲母中，有 13 個拼法相同，另 2 個一半相同。在 36 個韻母中，有 23 個拼法相同，另 5 個一半相同。只要把那少數不同之處共同起來，截長補短，推陳出新，不難得到一個更完善的方案。這樣一個綜合二者之長的方案，在情感上也容易被最大多數的文字工作者所接受。

關於“羅”“拉”兩式的統一修訂，此地試提如下幾點不成熟的意見。

（1）韻母  $\bar{m}$  的省掉，雖然簡單，並不方便。應當有一個  $\bar{m}$ ，而在應用上盡量簡省。拉丁字母中，最適合表示的是  $y$ ，這就是羅式的辦法。有  $y$  表  $\bar{m}$ ，“文字”（wenzy）和“蚊子”（wenz）等詞兒就容易區分開來。羅式同時用  $y$  表輔音  $i$ ，用字很經濟。用  $y$  表輔音  $i$ ，還可以解放  $j$  作為表  $\bar{u}$  之用，減少一個雙拼  $zh$ 。這樣一來，韻母  $\bar{u}$  就只有用雙拼  $iu$  了。單元音用雙拼當然不是好辦法。不過減少一個雙拼  $zh$ ，增加一個雙拼  $iu$ ，也還合算。

（2） $\bar{u}$ 、 $\bar{e}$ 、 $\bar{r}$  的寫法拉式比較好。 $g$ 、 $k$ 、 $x$  比  $j$ 、 $ch$ 、 $sh$  用字少，也符合語音變化的原則。用  $x$  表  $\bar{r}$ ，可以方便  $ch$ 、 $sh$  在某些場合省加  $y(\bar{m})$ 。 $z$ 、 $c$  比  $tz$ 、 $ts$  簡單。 $r$  同時表聲母  $\bar{r}$  和韻母  $\bar{r}$ ，並無混淆可能，因為音節  $\bar{r}$  寫成  $ry$ 。

（3）關於聲調問題，可以在必須區分的同音異調詞兒的某一音節上拼寫表明，其他一概從簡。標調方法，與其加符，不如拼寫，因為對於連寫、排印、電報、各種技術應用和機械應用，都比較方便。聲調拼寫法可以簡化如下：陰平不標，陽平加  $x$ ，去聲加  $h$ ，上聲重疊主要元音字母。音節  $\bar{r}$  寫  $ry$ ，不分調。 $\bar{r}$  可分  $r$ 、 $rx$ 、 $er$ 、 $rh$ 。 $\bar{u}$  可分  $j$ 、 $jx$ 、 $iy$ 、 $jh$ ， $\bar{e}$ 、 $\bar{r}$  類推。 $\bar{e}$  可分  $e$ 、 $ex$ 、 $ey$ 、 $eyh$ ， $\bar{r}$ 、 $\bar{u}$  類推。

一個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誕生，將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喜訊。



# 苏联打字排铸机介绍

陳 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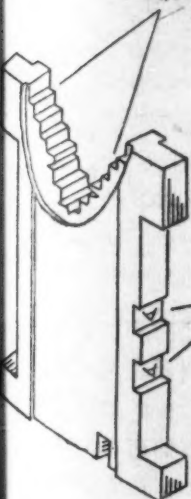
現代國際間印刷用的排字机械，最通用的有兩種。現在蘇聯製的這兩種排字机械作一個簡括的介紹：

Linotype(Линотип)，一般音譯做“萊諾排鑄機”，或意譯“整行排鑄機”，因為它鑄出來的鉛字是一行一片的。

萊諾排鑄機最主要的附件是銅模、隔空和楔形隔空：

銅模是用黃銅製成的一塊塊形式很精緻的金屬片(圖1)。

還模齒牙



凹形字模

(圖 1)

銅片的一邊有兩道凹槽，槽裏有兩個凹狀的字母、數字或標點符號。這兩個字符的大小一樣，但體材不相同，鉛液注在上面，冷卻後即可直接用來印刷。

隨着字母形狀的寬狹不一，銅模也有厚有薄。

銅模上端有個三角形的缺口。缺口裏有7對左右對稱的齒牙。各個字符的齒牙，位置都不同，它是銅模滑行的槽軌，原理與一般鑰匙的齒牙作用相同。

隔空，形狀與銅模大致相同，只不過沒有刻着字符的那凹槽。它的用途是用來間隔字符同字符、詞兒同詞兒之以及填補版面上需要留空的位置。即：凡是字行中插進的地方，在鑄出的鉛版上是凹進去的，印刷時着不到。

楔形隔空，是一種楔形的薄片，用來插進部分詞兒同詞兒間，使得詞間的距離勻稱地放寬，直到排好的銅模不太太緊地擠滿全行的長度為止。

除了這些主要的附件外，萊諾排鑄機由下述主要部件：

機器的左上方裝置着分層的銅模箱。箱裏通常儲放着6、8點、10點、12點<sup>①</sup>等4種字形大小不同的銅模和隔最高容量為1800個，但實際上儲放1200個左右已經足銅模一個接着一個由上而下地站成整齊的縱隊。箱內有溝道。

銅模箱之下是一個類似一般打字機的鍵盤。鍵盤上排列0個鍵子，分排6行，每行各15個。每個鍵子都標誌着、數字或符號。左面的鍵子安排着小寫字母，右面的鍵子排着大寫字母，中間部分安排着數字、標點符號和各種隔空的符號。

每個鍵子都同銅模箱裏操縱銅模的機械連接着，排字員用手指輕輕按動一下鍵子，活門打開了，銅模就立即從箱裏滑下來，經過自動傳送裝置，被送到機器左方的排

字盤裏。

在這時候，如果需用某一特殊字母或符號，排字員可以從備用字匣中取出那個銅模，放進字行裏去；或者，發覺排錯了，可以把錯了的銅模取出，另換一個。在排字盤裏，銅模的取放都很便利，像手工排字那樣。

銅模排滿一行後，按動一下位在鍵盤右下方的一個鍵子，全行的銅模就迅速地被送到鑄字匣的位置去。排字員繼續排下一行，幾乎用不着停歇。

全行的銅模到達鑄字匣，機器本身自動地利用楔形隔空進行一系列的擠行，整行工作，使得各個銅模都排列得非常整齊、緊密。機器的左邊整個是鑄字裝置。裝着4個鑄字匣，鑄字匣的後面是熔鉛爐。

經過擠行、整行工序後的全行銅模，被送到鑄字匣的前面。那時候熔鉛爐裏的鉛液受壓力的作用通過噴嘴灌入鑄字匣，鉛液灌滿了鑄字匣和銅模上所有空隙。銅模隨即離開鑄字匣。

鑄成的鉛片先後經過幾把刨刀的刨削，成為一片片光亮、平滑的合乎規格的鉛版，依次被送到接字盤，順序排列着。這些一行一片的鉛版捆紮起來，就可以拿到印刷機上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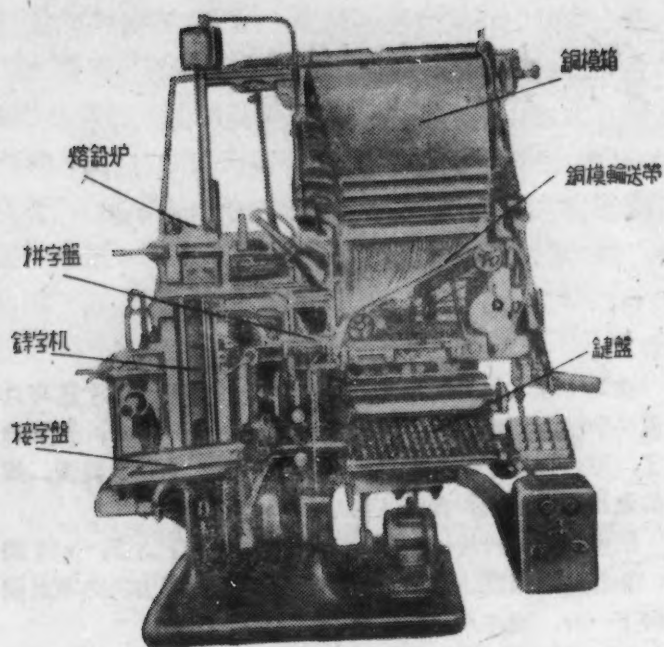
全行的銅模和隔空離開鑄字匣之後，被升降裝置送上銅模箱的頂端，沿着還模桿一個個地向右走，回到各自的位置去。

上面說過，銅模上端三角缺口的地方，有7對齒牙，齒牙的位置是各個字符不相同的；還模桿上也刻着許多帶缺口的齒道。銅模的齒牙咬着還模桿上的齒道向右走，到達齒道上缺口的地方，就失去了控制，跌進銅模箱裏去。銅模沿着自己特定的槽軌，由上而下地滑行下去，一個接着一個排成一系列縱隊，再準備排字員的使用。這種還模裝置十分精巧、有趣，各個銅模都迅速而準確地回到自己的崗位，既不會走錯了門，也不會爭先恐後，像是一隊訓練有素的軍隊似的。

這種排鑄機只要一個人管理，除打字動作外，全部運轉過程都是自動化的。排字動作所費力氣比一般打字機打字還小得多，每一擊(stroke)只要用手指輕輕按一下鍵子即行，毫不吃力。

蘇聯H—4型萊諾排鑄機，在結構上比資本主義國家製造的同類機器有80處改進的地方，主要的約有10處，如：資本主義國家製造的只有3個鑄字匣，只能鑄3種不同大小的字，H—4型機則有4個鑄字匣，能鑄4種不同大小的字；電氣化的熔鉛爐的送料裝置是自動的，鉛、鋅、錫合金用去若干自動熔化若干，不過多也不過少；鑄字匣旁裝置着吹風

<sup>①</sup> “點”是“point”的義譯，也有音譯做“磅”或“標”的。它是國際通用的計算鉛字大小的單位，1 point 相當於 $\frac{1}{72}$ 吋。



(圖2)

器，使得排字員不致染受職業病(中鉛毒)，等等。由此可見，蘇聯的科學技術是最先進的；蘇維埃國家是關懷勞動人民的健康的。

不久以前，蘇聯又創製成功一種 H—5 型的萊諾排鑄機，它比 H—4 型又躍進了一大步。它的還模裝置有兩條還模桿，可以同時從兩個鋼模箱揀出不同字體的鋼模，用過了鋼模又能自動地各自回到鋼模箱裏特定位置去。這種排鑄機的字体比 H—4 型機多一倍，更適宜於排鑄版式比較複雜的文稿。

使用萊諾排鑄機的機械排字同手工排字比較，兩種操作的優劣是十分明顯的：

[1] 排字員完全可以像一般打字員那樣坐着工作，不損害工人的健康。

[2] 機械排字，一般熟練的排字員每分鐘能排鑄出普通書籍 6—7 行，比手工排字快 4 倍。

[3] 排鑄出來的鉛版是一行一片的，拼版速度快，特別是不像活字版那樣容易散亂。

[4] 鉛版是一行一片的，直接用於印刷，不像活字版那樣容易發生“跳字”<sup>②</sup>危險，引起事故。

[5] 萊諾排鑄機上鑄字匣的寬狹可以隨意調節，鑄成的鉛版可厚可薄，字行同字行之間就用不着像活字版那樣加上鉛條。節約鉛條設備。

[6] 手工排字要儲備大量鉛字，以及建設安放大量字架的廠房；機械排字需用的鉛料和廠房都小得多。

萊諾排鑄機早於 1883 年就發明了的，蘇聯在本世紀 30 年代，排字技術才開始走上機械化的道路；衛國戰爭結束以後，排字技術機械化有了飛速的發展，近年來連小型印刷廠也開始用現代化排字機器裝備起來了。現在蘇聯每年出版的約 10 億冊書籍和約 8000 種報紙、1500 種雜誌的印版，大多數都是用這種萊諾排鑄機生產出來的。

另一種打字排鑄機的原名叫 Monotype (Монотип)，一般音譯做“蒙諾排鑄機”，或意譯做“單字排鑄機”，因為它鑄出來的鉛字，像活字版那樣，是一個字符一個的。

蒙諾排鑄機由打孔機和鑄字機兩架機器組成。兩者是獨

立的。打孔機的作用是要在一卷紙帶上打出許多小孔；機則按照紙帶上的符號(小孔)自動完成鑄字工序。

打孔機的形狀很像一副普通外文打字機(圖2)。鑄字機排列着 286 個鍵子。每個鍵字上面標記着不同的字符，有小寫的俄文楷體字母、斜體字母、黑體字母，以及拉丁字母、標點符號、學術符號和操縱機械的其他符號。鑄字機正中部分安置 1 個有 31 個小孔的半圓形匣子，裏面有 31 個打孔用的鋼針。緊貼着這個匣子，裝着 1 卷自動捲動的 110 公厘(m/m)的紙帶。

排字員按動鍵盤上的鍵子，通過聯動桿的作用，紙帶被鋼針打成一個一個的小孔。紙帶立即向前移動一格。紙帶的兩面邊緣，本來已經有一串密密的小孔，這是紙帶捲動的軌道，兩面邊緣之間就是一行字(圖3)。



(圖3)

時校出來，在改版中改正。

打字時發覺打錯了，只要手指不離開那按錯了鍵子，再用另一隻手指按動需要的鍵子，打出正確的小孔，就可以用薄紙把那打錯了的小孔貼住。如果發生的錯誤較嚴重，無法在紙帶上改正，可以按一下取消字行的專用鍵子，在紙帶上打一個特殊符號(也是小孔)；然後把存在着錯誤的全行重打一遍。這樣，鑄字的時候，那錯誤的字行就會完全被鉛補滿，改版時把全行的空鉛取出就行。

在每個詞兒之間，需要按動一下標記着空鉛的鍵子，紙帶上打一個代表空鉛位置的小孔。因為在未排滿一行前，很難確定一行中各個詞兒之間需要用多大寬度的空鉛，所以在打字時暫時一律加上一個寬度相同的空鉛，留待排一行後看剩下的空位有多大再行調整。

為着使排成的字行很勻稱地擠滿一行，機上裝有自動計算鉛字寬度的儀器。斯拉夫字母或拉丁字母鉛字不像漢字那樣每個鉛字寬度都一致，所以計算字符寬度的工作很簡單。

計算鉛字寬度的儀器通過聯動裝置同字鍵聯系着。它有一個標記着刻度和數字的小圓筒，還有指針指示着數字。按動一下鍵子，即打孔針在紙帶上打上一個小孔，計算儀器即跟着動作起來，把所用字符或空鉛的寬度相加；同時指針也沿着刻度尺移動，指出按預定的字行長度還剩多少位置。

每當一行快要打滿，還剩下一定寬度的時候，機器發出鈴聲信號告訴排字員；並且迅速地動作起來，計算一行各個詞兒之間所需空鉛的差額。排字員根據指針指示的差額數字，按動調整空鉛的專用鍵子，把各個詞兒之間的寬度最後確定下來。

② “跳字”，活字版在印刷機上不斷地被篩動，個別字可能跳出版面上；如果煞車不及，經過滾筒擠壓，印刷機就要被損壞。



俄文排字有這樣一項技術規則：行末最後那個詞兒如果下，可用連符（-）分開，適當地把一部分音節轉到下行，但這種轉行不得連續到4行以上，即行末的“-”號不得超過四個。這種計算鉛字寬度的儀器不但可以減少轉行象，還可以使字行的行腳整齊劃一和同一行中各個詞間的空位完全一致，勻稱美觀。它對於排字員工作很有益，同時也提高了出版物的印製質量，便利讀者閱讀。打好了的紙帶，小孔的排列是不規則的。小孔在紙帶上置因字符不同而不同，一定的位置和一定的排列方式代一定的字符。

打字工序結束後，把紙帶移放到鑄字機上。鑄字機上也帶有31個小孔的半圓形匣子。機器開動起來，紙帶帶着這個盒子慢慢前進。紙帶上某個小孔對準了匣子上同置的小孔，被壓縮着的空氣從小孔衝出來，推動機械裝動銅模框和鑄字匣動作起來，鑄出那個需要的鉛字。繼續前進，鉛字就一個一個地被連續鑄出來。

機器上的送字裝置會按照紙帶上的特定符號，把鉛字排預定的字行長度，並且做好擠行和結行工作。每排鑄好，推字版把全行鉛字推送到鑄字機外面的接字盤，同其行併在一起。

鑄字的程序，不是從行首鑄起，而以從行末鑄起的；即，機上鑄出來的鉛字，是先從一行的最後那個字符或空鉛，倒過來逐個字符（空鉛）鑄出來的。例如，МОНОТИЯ 這個鑄字的順序是 Я→И→Т…М。因此，紙帶在移放到鑄字前，不必先經過倒捲的手續。

蒙諾排鑄機的鑄字機還可以利用來鑄造空鉛、鉛條等各種材料和特殊的字符。

蒙諾排鑄機鑄出來的是鉛版，一行一片，排版工作很便

利，直接用來印刷，也不會發生“跳字”事故；但在排鑄好的版子上改動的話，就要全行排鑄過。所以，它比較適宜於用來排鑄行度固定、版面簡單的印版。

蒙諾排鑄機鑄出來的是個體的鉛字，同一般活字版一樣，排版和印刷的效率比不上萊諾排鑄機的產品；可是改版工作很便利。所以，它比較適宜於排鑄行度不齊、版面複雜的印版。

這兩種排字機器的不同特點決定了它們不同的用途：萊諾排鑄機被廣泛用於報紙和一般書籍、雜誌的印刷；蒙諾排鑄機則用於排印版面複雜——公式、表格等較多的專門性的書籍、雜誌。

我國漢字的字數太多，一個字就是一個符號，比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多幾百、幾千倍，無論利用萊諾排鑄機或蒙諾排鑄機的原理設計排字機器，都要碰到極大的困難。漢字打字排鑄機就算能創製成功，目前漢字打字的最快紀錄不過時速約3,500字，打字排鑄除打字之外還要有一個鑄字的过程，按理還要慢些，而目前手工排字的時速也達到約3,500字，那末，機械排字是否能比手工排字速率高，是一個待証的疑問。

如果把方塊漢字改革成拼音文字，情況就大大改變。假定未來的新文字採用的是四拼音素制，每1—4擊打出1個字（音節）來，平均每個音節3擊；以英文打字最高紀錄時速42,900擊計算，每小時可打14,300字，則比目前漢字打字最高紀錄時速約3,500字快4倍。根據蘇聯經驗，機械排字比手工排字也快4倍，也就是說，我們只要實現文字拼音化，就立刻具備迅速大到蘇聯水平的可能。

因此，要使我國的排字技術脫離手工業生產的狀態，走上大規模生產的機械化的道路，唯一的捷徑是實現文字拼音化。

## 我主張字母國際化

秋 穎

近來我在報紙和雜誌上看到許多同志都參加了文字改革論，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作為一個文字改革擁護者，也願意參加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討論，提出我的不太的意見。

漢字的改革，必然要走拼音化的道路，這是肯定的了。的拼音文字究竟採取什麼樣的字母，這還是目前大家正研究的問題。有的主張將來的拼音文字應該有義符；有的主張拼音化；有的主張自己再創造一套“民族形式”的字母；有的主張採用拉丁化字母。這些不同的主張都是各有解和理由的。但究竟哪個才是切實可行的意見呢？這還得研究的。我是不贊成拼音文字加義符的，理由別的同說過了，這裏就不再重複。有些人主張創造一套“民族”的字母，認為只有這樣才會不致損害我們民族的自尊。我認為這樣做是沒有必要的。我們要問：許多歐洲國家丁斯拉夫字母或拉丁字母，難道他們就都沒有民族自尊嗎？顯然不是這樣的，他們不單是有民族自尊心，而且烈的民族自尊心。有沒有民族自尊心並不表現在字母形。如果說我們需要“民族形式”的字母的話，那只能是一學的、合乎廣大羣衆的要求，同時也便於國際友人學習種字母，而不能片面地曲解為非得自己創造一套離奇古外民族不易懂的字母才算“民族形式”。隨着和平力量的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我們同別的民族接觸將日見頻繁，

日見廣泛，因此我們的字母應該是和國際上大多數國家所採取的字母一致的。那麼我們將來新文字到底應該採取什麼字母呢？我認為應該採取拉丁字母，因為它是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通用的字母。有些人反對拉丁字母，硬說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不能勝任代替漢字的這一工作，否認它的科學性，我認為這種看法是主觀的，不是從實際出發的。

我們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文字改革不僅是關係我們這一代人的利益的問題，而且也是關係着我們後代子孫的利益的一件大事，所以我們在考慮字母的時候，就不應該主觀去想像，應該從掃除我們大量文盲的前提下出發，應該以我們國家和人類歷史發展情況出發。我們知道：我國是世界上的大國，是遠東及世界和平的強大支柱，是關係人類幸福和進步的強國。這樣的一個大國，不能不引起世界各族人民的關懷和注意。可以斷言，要學中國語文的人必將隨着我們國家的日益發展和強大而逐漸增多。因此，我們的文字改革就不能不考慮到這點。

當然，拉丁字母也不是一點缺陷沒有。比如有的字母在寫法上還不夠科學（j, i），字母還不夠用等等，不過這些問題是能夠解決的。比如關於拉丁字母的zh, ch, sh, rh, ng 過長的問題，奔流同志在《中國語文》1954年12月號提議用Ф, Ч, Ш, Р, Н 去代替它們。這個意見我認為是很寶貴的。如果我們對其他的字母（如j, i, x等）能給以耐心的研究，拉丁字母的缺點會得到圓滿解決的，從而變成我們自己民族的寶貴財產，成為我們社會的交際工具。關於拉丁字母有大楷、小楷，大草、小草的四種字形，以及它們在字形上差別太大的問題，也可以相應地加以改進。

## 音位和音位學 (下)

## — 語音學常識之十四 —

田 恭

## 三 對資產階級學者音位理論的批判

西歐資產階級語言學家從俄國學者博頓、克魯舍夫斯基、謝爾巴等人那裏接受了音位學的理論以後，曾經有許多人提出種種關於音位的解釋。但是因為他們的觀點是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所以常常片面誇大了音位在某一方面的性質和作用，甚至整個歪曲了事實，否定了它的存在。

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流派就是功能觀點的音位學說。我們曾經說過，分辨詞義的功能是音位觀念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可是它只能是一方面。假如把音位觀念的這一方面誇大了，成為唯一的東西，那就錯了。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索緒爾和特魯別茨科依 (H. C. Трубецкой)。

索緒爾說：“語言只需要有區別，絕不需要(像一般所想像的)在每一個聲音裏老是有同樣的性質。我甚至可以把法語的 r 讀成德語 Bach, doch 等詞裏的 ch；但是在德語裏我就不能用 ch 代 r，因為在德語裏有這兩個應該區別的因素。……”<sup>①</sup>他又說，“一個詞裏重要的不是聲音本身，而是可以使這個詞跟所有別的詞相區別的一些聲音差異”<sup>②</sup>，他認為語言的聲音單位，音位，應該當做“一些區辨的因素，它們的性質是在於彼此不相混淆”<sup>③</sup>。關於音位的這樣一種否定的和相對的定義自然就引導他得到這樣一個信念：音位“絕不是什麼聲音上的東西，而是一些非具體的東西；這些東西不是由自己的物質內容形成的，而只是由那些區別(differences)形成的，這些區別使它在聽覺上的表現跟別的東西不同”<sup>④</sup>。索緒爾派還把音位跟語音割裂開來，他們把語音看做生理聽覺上的因素，音位當做心理的單位；語音是個人言語(parole)方面的事，音位是社會語言(langue)方面的事(大家知道，把“社會的語言”跟“個人的言語”對立起來就是不正確的)；他們認為語音跟意義無關，音位是意義的負荷者；語音是語流的一部分，音位是符號系統的一分子……。可是事實上咱們不能隨便用一個跟某語言中某個音位不相對立的任何一個聲音來替代這個為大家

所使用的聲音(比方把法語的 rare 念成 [xa:x])，不能在這個語言裏創造一些它所沒有的聲音。同時一個語言中同一音位的若干變體的變化，也不是任意的變化，而是有規律的變化，是憑藉發音部位的條件在一定的環境下用一定的方式朝一定的方向變化的。這就完全擊破了索緒爾學派把音位脫離語音材料的心謬說。

“布拉格學派”特魯別茨科依的理論同樣地站不腳。特魯別茨科依說音位是“語言中用替代的法子把一個詞跟另一個詞區別開的最小的分子”<sup>⑤</sup>。因“一個語言裏的音位就是許多區分的符號(differentiating signs)，這些區分的符號只能用每一種語言標的功能來說明它”<sup>⑥</sup>。特魯別茨科依堅決地主張語音只研究聲音的聽感和器官方面的現象，而音位學只研究聲音的功能方面的現象。他甚至於這樣斷然地把位學和語音學分割開來，他說：“語音學是屬於自然學之類的，它專管人類口語的聲音；跟語音學相反音位學是研究音位或人類語言的聲音方面的觀念的，因此構成了語言學的一個部門”<sup>⑦</sup>。他說：“音位學的研究，在一個語言裏怎樣的聲音區別是跟辨義有關這些區分因素(或特徵)是怎樣互相對待並且是按什麼規則配合在詞(或句)裏的”<sup>⑧</sup>。按他的意思，音位學任務只是研究聲音的區別，而聲音的區別基本上對立，一個語言就是靠這種音位的對立來分辨意義的。因此，按特魯別茨科依的說法，聲音的屬性有個範疇：重要的(有關的)和不重要的(無關的)特徵

① 《普通語言學教程》俄譯本，頁 118。

② 同上，頁 117。

③ 同上，頁 199。

④ 同上，頁 117。

⑤ 《音位學綱要》，1939，頁 34。

⑥ 同上，頁 41。

⑦ Zur allgemeinen Theorie der phonologischen Vokalsysteme, 《布拉格語言學報》，1929，第一期，頁 (按西歐語言學家有人把語音學和語言學分開，也是不當的。)

⑧ 《音位學原則》，頁 14。



位學者只消注意重要的特徵，即聲音的對立，其他應該不管，因為那是語音學的事情<sup>①</sup>。

美國的布羅姆菲爾德(L. Bloomfield)也屬於這派。他在《語言科學的一組假定》裏對於音位是這樣的：

15. 假定4. 不同的“形位”(morphemes)在聲音特徵(vocal features)上說，可以相似或部分相似。

例如 book 和 table 裏的 [b]；stay 和 west 裏的 [st]；-er (動作者) 和 -er (比較)。

這個假設的含義是說各該意義不同。

16. 定義。聲音特徵上最小的雷同叫做音位，或區別音。

例如英語的 [b, s, t]，英語的重讀，漢語的四聲<sup>②</sup>。

後來，他又以音位為“顯示意義區別的聲音的最小位<sup>③</sup>”。他說，“一個語言的音位不是聲音，而僅僅是話的人在實際言語中能發能懂的聲音的特徵”<sup>④</sup>。

把音位說成僅僅是一些有辨義作用的“聲音的特徵”，忽視它的物質材料，這就使功能派的音位學者跌了唯心論的泥坑裏去。必須認識，音位就是有社會能的語音，語音和它的功能(或者說它的“特徵”)是不可分離的統一中存在着的。恩格斯說：“單純的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有質的物”<sup>⑤</sup>。把語音的特徵具有特徵的語音本身割裂開來，是這一派的根本誤。

另一派是從心理的觀點來解釋音位。前面我們已說過，博頓·德·古爾特內的音位觀念是帶有心理的成分的，他甚至把音位學叫做“心理語音學”。但是來博頓在他的著作《斯拉夫語言的“比較語法”的幾部門》裏已經擺脫了心理學的成分，把詞形變化法和音變化的問題和音位理論緊密地聯繫起來了<sup>⑥</sup>。可關於音位的心理解釋却被美國的薩皮爾(E. Sapir)以發揮。

1921年薩皮爾提出它的所謂“內在系統”(inner system)說。他說：“在一個純粹客觀的音系之後有一個內在的或想像的系統。雖然作為一個系統來說，它也沒有不為說這個話的人所覺識，然而作為一個類型(pattern)或者作為一個心理上的機構(psychological mechanism)來說，這却比那純客觀的音系容易覺識得<sup>⑦</sup>”。後來他在《語言裏的聲音類型》<sup>⑧</sup>一文裏稱音為“想像的聲音”(ideal sounds)。他說，“想像的音”是根據人們對於客觀聲音之間的重大的關係(significant relations)的直覺而建立起來的，對於一本地說話人，這比那些客觀聲音本身還更‘真實’。聯想和類型(association and pattern)的複雜就暗含在最簡單的輔音或元音的吐音之中”。他說

一個音位裏主要的分子是“類型中的真點”，一個音位的附屬分子是“有條件的變音”。“由於一個音對於其他一切音的語音關係的一般感覺，可以直覺地在這樣一個系統中發現一個音的‘地位’（這裏是作為一個類型的真點而說的聲音，不僅是一個條件變音）”。“語音系統的每一分子，不但在發音上各有區別，各有其音象(acoustic image)，而且——這是問題的決定點——彼此之間有一個心理上的距離”。

很有一些人附和薩皮爾的這種說法。比方本尼(Tytus Benni)在一篇題目叫《音位的演進》的論文裏就說音位“是指在心靈上相當於語言裏一個具體聲音，也可以說是語音的心象”。另外本尼又在一篇叫《音位觀念的新發展》的文章裏給音位下了一個定義，說“一個音位是一個聲音觀念，也就是一個想像中的聲音”。他並且加以解釋說：“具體的音(physiophon)不足用來區別通常的同音詞，只有心理的音(psychophon)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語音是語言的外殼，是語言的物質材料，脫離了具體的語音來講什麼語言的結構成分是不可想像的。可是這裏，薩皮爾、本尼之流却正是拿什麼“想像的聲音”啦，“心理上的距離”啦，以及“心象”或是“聲音觀念”什麼的來跟客觀的“具體聲音”對立起來，並且用它們替代了具體的語音來解釋一些語言現象的。“想像的聲音”能“比那些客觀聲音本身還更‘真實’些”！這就是他們的論調。

還有一派是從實質的觀點來看音位的。這一派以英國的瓊斯為代表。此外如瓦爾德(I.C. Ward)、諾耳阿姆費爾德(Noël-Armfield)等人都屬此派。瓊斯曾把他對於音位的看法修改過四次之多。按照他1950年出版的《音位的性質和應用》一書裏的解釋，一個音位是“一個語言裏性質相關的一族聲音，其中沒有一個分子在一個詞裏出現在跟另一個分子相同的語音環境之下”。他把一個音位裏那個最普通的，或者可以孤立應用的，或者介乎極端分子之間的音素稱為主要

① 《音位學綱要》，頁32—35。參看津德爾等《論音位學說的歷史》，頁74。

② 美國《語言》雜誌，1926，第二期，頁156。

③ 《語言》，英國版，1935，頁79。

④ 同上，頁80。

⑤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三聯，1950版，頁262。

⑥ 參看伯恩斯坦《反對語音中的唯心主義》，頁555。

⑦ 《語言》，1921，頁57。

⑧ 載《語言》雜誌，1925年，卷1，頁37—51。他還另有一篇文章叫《音位的心理現實性》，載《心理學雜誌》，1933，1—4月，發揮同樣的理論。

的分子，而稱其餘的那些同音位的音素為附屬的分子。他並且說明：所謂“同樣的語音環境”是指在同樣高低、長短、輕重的同一聲音的前後，而“一個語言”則不包括不同風格的說話的聲音，“在一個詞裏”是爲了避免詞羣或句子裏出現的複雜情況。“相關的聲音”可能是聽覺上的相似，也可能是器官上的相關<sup>①</sup>。

此外，瓊斯還主張音位的分別只限於音素的音質，也就是說只限於輔音和元音；至於音調的分別，比方北京話“巴、拔、把、罷”的分別，他管它叫“調位”(tonemes)；音長的分別，比方英語的 beat [bi:d] (珠兒)、bean [bi:n] (豆)、beat [bi:t] (打) 跟 bid [bid] (招待)、bin [bin] (貯藏箱)、bit [bit] (少量) 的分別，他管它叫“時位”(chronemes)。他說在用文字寫下一種語言的時候，可以用字母代表音位，用附加符號代表調位和時位，自然也可以用重疊字母的辦法來代表長音位。

因爲瓊斯關於“音位”的觀點是從謝爾巴那裏獲得的<sup>②</sup>，所以瓊斯和謝爾巴一樣地注意音位的聲音實質和在不同環境之下的發音位置的變化。可是瓊斯對於音位的解釋是片面的，因爲他很忽視音位在區別詞義方面的功能。他說音位有辨義的功能只是前述關於音位的解釋的“必然結果”。不同音位的相當的聲音的替代有辨詞作用，同音位的不同分子沒有辨詞作用，是因爲同音位的兩個分子決不出現在同樣的聲音環境之下，因此音位的辨詞作用不是音位“定義”的一部分<sup>③</sup>。如果不是爲了辨別詞義，爲什麼有些性質相關的聲音可以歸做“一族”，而另一些在聽感上或發音器官上同樣“性質相關”的聲音只是因爲它們能夠出現在同樣的聲音環境之下就不能歸做“一族”了呢？瓊斯的音位理論顯然是忽略了語言作爲社會交際工具的這一主要功能。

再一派乾脆認爲音位在實質上和心理上都不存在，而僅僅是一種“虛構的單位”。比方美國的脫瓦德爾(W. F. Twaddell)，在他的《論音位的定義》一篇文章裏<sup>④</sup>，就主張音位只是一種抽象而又虛構的單位。他說這樣解釋的音位可認爲一種發現的或實用主義的虛構(a heuristic or pragmatic fiction)，只是爲了描寫語言成分的音韻關係的便利，才定出這樣的術語來的。這些語言成分，他認爲就是最小的自由形式，而這些自由形式的本身也是一種抽象<sup>⑤</sup>。

現代資產階級語言學界最流行的一個學派——結構主義語言學“權威”葉爾姆斯列夫(L. Hjelmslev)和所謂“丹麥學派”也有這樣的觀點。他在他的文章《語言的結構分析法》<sup>⑥</sup>裏就說，音位本身沒有內容，但能構

成有內容的單位(詞)。他並且提議稱音位爲 taxeme。葉爾姆斯列夫跟卡爾納普反動的符號邏輯實證主義學有密切的聯系。他曾引用卡爾納普的話說，“任何學的理论，應該永遠是一些關係之間的公式，這對於這些關係的本體的知識和描寫是排斥的。”正和緒爾的論調一樣：“要認識語言的聲音單位，沒有認識這些單位的正面的性質”<sup>⑦</sup>。所以無怪乎他把音位和音位當做一些彼此不相干的獨立的現象，使音位成一種和實際研究脫節的抽象的“虛構的”東西了。身沒有內容的東西”却“能構成有內容的單位”，這種虛的理论當然是絕對站不住腳的。

資產階級的語言學者是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的，他們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形而上學的方法是片面地對待現實的諸現象，把現象中的個別部分抽取出來，把它們片面誇大，變爲與現實隔絕的絕對的東西。他甚至於用反科學的神秘主義的“觀念”、“心象”之類辭語，掩蓋了現象的本質，來蓄意歪曲事實。科學的理論不能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得到闡發。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才是真正科學的方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體現着一般的東西跟具體的東西的統一。近蘇聯曾經展開過一次關於音位理論的討論，從1949年下半年起，到1953年年底爲止，在《蘇聯科學院通訊(文學與語言部)》上連續發表了十二篇論文，參加討論的有十六位語言學家，批判了音位學中的唯心觀點。大家認爲，把音位學跟語音學割裂開來的企圖是錯誤的，是徒然的。音位學理論，跟語言學中的其他部分一樣，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動搖的基礎上，斯大林論語言的學說的指導下，才能得到正確的發

#### 四 音位學的應用

音位學是語音學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同樣在語言學的研究上(語音學是它的一個部門)也有很重要的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意義。咱們的文字改革工作，要漢語擬訂一套拼音文字的方案，發展少數民族的語言，要爲一個有自己的語言而沒有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要爲一個已有歷史較長的拼音文字的民族改革或改訂他們已有的文字方案和拼音法則，使之符合於活的

① 看《音位的性質和應用》，頁7—10。

② 同上，序言第6頁。

③ 同上，頁14。又《音位的定義》(載《語音學》1929, 10—12月，頁43)。

④ 美國語言學會語言專刊第16號，1935年3月。

⑤ 上引文，頁36。

⑥ 《語言學研究集刊》一卷二期，1947。

⑦ 《普通語言學教程》第二版，頁164，俄譯本，頁111。



……，首先咱們必須很好地研究這個語言的音位系統。要對一些親屬語言或方言的發展演變進行科學的比較研究，也必須首先研究這些語言在各個歷史的音位系統，進行比較，和從音位學的觀點來研究這些方言的語音對應規律。此外，在語言教學中，特別是本族語言的教學中，在正字法的研究中，音位的意義都是很顯然的。

現在我們談一談歸納音位的方法：

(一)要歸納一個語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統，首先必須實地記錄音素。要有相當數目的常用詞，嚴格記在記音的時候越細越好。無論是發音部位上稍稍移動，發音方法上細微的差別，或是長短、輕重、高低、升降乃至任何附帶的作用如圓脣、送氣、顎化、化等，都得細細觀察。在記音的初期不要存着“可能這些現象是一個音位的變體”的觀念，因為自己語言裏這些聲音是一個音位，未必在這新調查的語言裏這些現象也是可以忽略的。只有大量嚴格記音的材料能使我們給這個語言找出一個歸納音位的正確而簡單的辦法。首先是注意每一個詞，然後才是連續語言的片段。這樣記下的音素及其語音環境，便是咱們歸納音位的原料。

應該注意，每個人多少受了自己從小學會的母語影響，對於自己語言裏原來有的語音區別有敏感，對於自己語言裏原來沒有的語音區別就會感覺遲鈍或者發生錯誤。所以必需多多聽辨和多多模倣，用比較和替代來發現它的語音特點，並進一步探索這些特點在構成音位上的作用。本地人對於自己語言能區辨意義的音位區別，往往都有正確的感覺。咱調查時往往要依靠發音人的判別，但最後還得靠咱自己的分析和歸納。

調查語言時，如果咱們模倣得不對或不够好，發音人往往首先感覺到，會加以批評和糾正，咱們必需心聽取，耐心學習。但也有時語音上的細微差別，發音人可能忽略，咱們可不能大意，輕輕放過。最好將已得的材料，找出語音近似的語詞來，排列在一起請發音人念了，自己再比較其異同。或者自己試將其中的一個音來替代另一個音，念給發音人聽，看能不能辨別它們的不同。這樣和發音人一同來說來，既可以區別音位，又能發現許多同音字（同聲同調）。為了便於排比整理，最好把這些材料寫在卡片上。

(二)把這些記錄材料排列起來。相近的音素要盡找它們對比的分別，看在語音環境上和意義上有沒有對立的現象。把所有以同一音素開始的形式聚集在

一起，可以看出它們出現的條件。再把其他一切地位的音素按同樣的辦法，排列，比較，觀察它們的對立，變化及其與前後環境的關係。把在各種形式的音節各級重音、音調中的單元音，複合元音，在話語各部分元音前、後、中間的單、複輔音等等，都排列成表。對於漢藏語系的語言，咱們可以給它做一個聲韻調配合的音節全表。這樣就可以看出各種形式的音素出現的地位，以及它們在那一環境下的變化。注意它們辨別詞義的作用。比方北京話“辦”跟“盼”、“擋”跟“躺”、“該”跟“開”……是對立的，所以送氣跟不送氣是區別音位的條件之一；僮語（龍州話）ba:tɿ是“瘡”，batɿ是“悶”，fa:iɿ是“漿”，faiɿ是“火”，音的長短就必須加以區別；漢語“媽”、“麻”、“馬”、“罵”，必須注意調的區別<sup>①</sup>；俄語 му'ка（麵粉）——'мука（痛苦），必須注意重音的區別，這時就可以把各部位必須區別的對立特徵列成一個表。

(三)找出同音位裏有條件的變音。在對立的情形找出以後，現在就要把那些不對立的相近的聲音出現的條件弄清楚，把它們歸在一塊兒。換句話說，要把同一音位的各個變體有條件的變化規律找出來，把這種變化做一個科學的描寫。比方英語的 p—p'，t—t'，k—k' 不對立，只構成三個音位；廣州話做聲母的後強輔音 p-、t-、k- 和做韻尾的前強輔音 -p、-t、-k 也只構成三個音位；北京話“談”[thanɿ]、“團”[thuanɿ]、“田”[thienɿ]的元音[a]跟[ɛ]也可歸做一個音位等。條件變音只消說明一下它們變化的條件就行了，不用另一套字母。這樣就可以歸併許多嚴式記音的符號，得出一套寬式音位記音的符號來。對於自由變音，咱們也只消給它一個較常見的符號，把它們歸做一個音位。

(四)檢查整個的音位系統。現在咱們就可以把一個語言所有的音位按語音性質排列出來，做成一個音位表，檢查有無漏掉的音位。這時應該注意音位表的空格。如：

① 對於漢藏語系的語言的聲調，可以找些類似的音節，比較它們不同的調型，再看是不是哪些調型和哪些聲母有一定的聯系。這樣咱們可以作調型的分類，並且可以聯系到它的歷史演變。對於別的語言，咱們還可以注意到音量、重音、音節跟音節在語詞中的接合等，也可以注意語調的變化。不過這項工作不能單靠單詞的排比，而得細心觀察會話、詩歌、故事裏出現的具體現象，加以分析和歸納。這項工作在短時期內也許不容易作到令人滿意的地步，必需深入研究，逐步發現規律。

p	ph	b	.....
t	th	d	.....
k	kh		.....
ts	tsh	dz	.....

上表只有 **k** 行缺一個濁音 **g**，就要檢查材料中有無遺漏，或有沒有記錯的音。因為一般地說，各個語言的音位系統有整齊對稱的要求。但是語言的事實得尊重，決不可人為地強求整齊。如廣西僮語、雲南西雙板納僚語都是有 **b, d** 而無 **g** 的，北京話舌面中輔音沒有鼻音 **[ɲ]**，濁擦音只有捲舌音有個 **[ʒ]**。

在歸納音位的時候，固然一般有求系統簡單、音位總數減少的趨勢，但也應該注意辨識詞義、區別詞義的清晰明確，應該尊重本地人對於音類的見解，同時應該適當地顧及字源。過去國語羅馬字派歸納北京音系，因為 **ㄐ、ㄑ、ㄒ** 這一組音跟 **ㄓ、ㄔ、ㄕ、ㄖ、ㄗ、ㄛ、ㄝ、ㄟ** 三組音都不對立（**ㄐ、ㄑ、ㄒ** 祇出現在 **ㄌ** 或 **ㄌ** 的前面，而後面三組音決不出現在 **ㄌ** 或 **ㄌ** 的前面），所以用表示 **ㄓ、ㄔ、ㄕ** 的羅馬字拼音符號 **j, ch, sh** 來拼 **ㄐ、ㄑ、ㄒ**（後面有 **i** 的就是 **ㄐ、ㄑ、ㄒ**）。從音位的對立方面來看這樣做是可以的，可是從字源和本地人對於音類的見解來看，是不合適的。因為現在北京以 **ㄓ、ㄔ、ㄕ** 做聲母的字都是唐宋時代所謂“三十六字母”知、照兩組聲母的字，而現在北京以 **ㄐ、ㄑ、ㄒ** 做聲母的字却是精、見兩組聲母裏的字；而本地人的感覺，他們認為“格、基、古、居”**[kə, tɕi, ku, tɕy]** 或“呵、嘻、呼、虛”**[xə, ɕi, xu, ɕy]** 是雙聲，（一個證明是北京有一種秘密語，它把一個字的聲母和韻母撇開，成為“（聲+ai）+（k+韻）”兩個音節，於是“北”**[pei]** > **pai-kei**，“米”**[mi]** > **mai-tɕi**，**[k]** 遇了 **[i]** 就自然變成了 **[tɕ]**）。所以為了省併音位的數目，把 **ㄐ、ㄑ、ㄒ** 跟 **ㄓ、ㄔ、ㄕ** 六個音併成三個音位是不合適的。又如從前最初公布注音字母的時候，“**ㄐ、ㄑ、ㄒ、ㄓ、ㄔ、ㄕ、ㄖ、ㄗ**”其中舌根部位的鼻音 **ㄐ** 和舌面中部位的鼻音 **ㄑ**，一方面是想照顧方言，一方面是想整齊對稱，也是不合適的，因為北京音系裏就沒有這兩個聲母。

（五）選擇代表音位的符號。語音學的記音符號是要求每一個符號有一個確定的音值，越細越準越好。但是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根據語言的社會功能，咱們只需要這個語言的每個音位有一個符號來代表。同一音位的變體的語音差異，或者是已經由它的環境條件暗示出來了，或者是一種自由變音，等等，總之，沒有辨詞作用，就可以不管。每一個語言有它自己的音位系統，這套音位符號只消能够便利而明確地表示

本語言在某一時代的音位事實就算合乎咱們的要求。

音位標音實際差不多就等於一個語言的綴字法。它以“一個音位用一種符號”的原則為基礎<sup>①</sup>。利用能少數的字母適當、經濟而有效地表示語言中有辨詞作用的一切事實。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配合整個的語音系統：如某一語言中有舌尖音 **ts, tsh, s, z**……而無舌尖後音 **tsʰ, tshʰ, ʃ, ʒ**……可是一個自由變音 **ʒ**，自然用 **z** 做代表字母。

（2）選擇比較普通常見的字母：一般都有選用現成拉丁字母的傾向，比方有一個語言只有 **[a], [o], [ɔ]** 三個元音，往往就用 **a, o, ɔ** 三個符號；有 **[R]** 無 **[r]** 也用 **r** 來做標音符號。或許一個音位有幾個變體，也選普通常見的字母來標音位，如 **[a], [A], [ɑ]** 三個音素一個音位，就選 **a**；又如日本語 **[ɕ], [ɕʰ], [ɕʷ], [ɕʷʰ]** 等音素一個音位，就選較普通的字母 **r** 或 **l**。假如得用語音符號，那比較普通常用的，如 **η** 比 **N** 好，**ɔ** 比 **o** 好，**ɔ** 比 **ɪ** 好，假如它們不相對立的話。

（3）符號求其簡單、易寫、易印、易識，儘量避免“臉麻子”的附加符號：如英語 **p, t, k** 跟 **pʰ, tʰ, kʰ** 不對立，就用 **p, t, k**，不必用 **pʰ, tʰ, kʰ** 或 **ph, th, kh**。北平的“歲”儘管實際讀音是 **[sɛi]** 或 **[sɛiʰ]**，就不如標做 **sei**。音字母的 **ㄗ、ㄘ、ㄙ、ㄛ、ㄝ、ㄟ**，標做“**p, t, k, ph, th, kh**”“**b, d, g, p, t, k**”就比標做“**b, d, g, pʰ, tʰ, kʰ**”好得多，但是類化的 **h, ɲ, ʃ, ʒ, ɕ** 等就不如 **bʰ, pʰ, tʰ, dʰ, sʰ** 等附加號便利。

（4）避免跟別的音位的標音方法發生衝突，要求“知位、見位得音”，注意符號與讀音互指的可能；同時在相當的範圍內照顧字源、形態和民族的心理習慣：對一個語言的正字法來說，最好是詞有定形，察而易識。例語 **αγρ** 不寫做 **αγκ, πρῦδ** 不寫做 **πρῦτ**。一個詞因為語法化而引起拼法上的變化有時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可能範圍保持詞的各種語法形態跟詞根的確定關係，對於人們的辨詞是有便利的。因此，假如只消記住若干基本規律（比方詞末的濁輔音總是清化的），就能掌握那些合法則的變化，最好相當地照顧詞源。此外，有的詞在連讀中會發生變化（如英語的強式弱式，法語的“聯誼”等），為了詞的定形不妨以一個詞正式單念的讀音為準。音位標音的時候也考慮這樣的原則。不過記音究竟不是造字，音位標音法對質準確度的要求雖不如語音學的嚴式記音那麼嚴格，假設符號與讀音互指的可能（讀音知位，見位得音）跟照顧字原則相衝突的話，還是不能過於執著於詞源。比方說，北平的 **ㄐ、ㄑ、ㄒ**，假如要按字源把“基”、“欺”、（轉 18 頁）

① 這裏所謂“一個音位用一種符號”是說同一音位不用不同的符號來表示，但是一個聲音在必要時是允許兩三個字母的結合形式來表示的，如用 **pf, ts, tʃ** 等表示擦音，**ph, th, kh** 等表示送氣音，**hm, hn** 等表示清鼻音，**tl, bl** 表示塞邊音等。



# 北京語言學界茶話會 座談漢語規範化問題

由本社發起組織的北京語言學界茶話會，於1955年4月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會議室舉行了第二次集會。出席者：丁聲樹、王還、呂叔湘、汪金丁（傅強代）、杜松濤、林燾、林漢達、岑麒祥、俞敏、高名凱、胡明揚、仲華、章懋、陸志章、陳剛、曹伯韓、莊棟、許紹早、康、張志公、彭楚南、傅懋勛、葉聖陶、鄭冀、鄭之東、社工作人員等共二十餘人。

這次集會座談的中心是“現代漢語規範化問題中的標準問題”。集會開始，本社羣體社長首先就日前中國文字改革中急待解決的標準音問題，說明了現代漢語規範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為拼音文字問題和語言規範化問題二者是可分的。這個問題雖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可是目前客觀語文工作者必須集中全力進行解決這個問題。呂叔湘先生說：“藉今天機會報告大家，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內將召開一個討論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學術會議。因為前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我們急切需要一種規範化音；這個問題裏包括語音、語法、詞彙等問題，而首要語音問題。大家在這方面一定能交換一下意見，共同尋求解決的途徑。”

茶話會於是圍繞着(1)以北京音為基礎的問題、(2)拼寫方言問題、(3)正字法問題、(4)尖團音問題，湧現了發言。下面摘錄一些主要發言內容：

羣體社長說：“最近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拼音方案委員會開了三次會，在討論到什麼是北京音的時候，大家一致認為把它理解為北京的土話，而是指北京普通話的語音，也不是所謂‘老國音’，大家認為‘老國音’是不合用的，用‘新國音’。這其間自然還有讀音和語音的分歧，如同有ㄅ和ㄆ兩讀，‘波’有ㄅ和ㄆ兩讀，類似這樣情形所依歸，須要調整。我認為標準音不能採用北京的首先應儘可能取消兒化音，即使要用兒化，也須有個

俞敏先生說：“不用北京土音是可以考慮的，只看所謂是作如何了解。久住北京的人同受過教育的人發音上是無上的分歧的，像把‘三’說成[ʅan]，要是把這些現象為北京土音，這跟我的了解相合。至於兒化就不是土音問題，是語法問題，能分別詞性、詞義，同時帶有一種作用，所以我覺得兒化音不能了解為土音。至於讀音的分歧，我看不成什麼大問題，總是口語的音影響讀音早晚要受類化。在教學上，該用讀音時唸語音可以，該用語音時就不能用讀音。這個現象可望隨着漢語消除而消滅。”

周達夫先生說：“所謂‘新國音’指的是‘現代北京音’，我們可以說所謂北京音系就是北京話的音位系統。至

於兒化問題，我看與語言風格有關，嚴肅的說話中比較少用兒化，小說戲劇就用得較多；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大問題。我贊同用北京話，理由就是因為它已經用開了，廣播、話劇、電影上都在用它。不過，我認為今天提出“標準音”這個題目不大妥當，應該說是如何確定以北京話為基礎。”

林漢達先生說：“北京話的兒化音不如說是兒化詞，在標準語中能不能分別處理是可以研究的。至於尖團音的分合，我認為如果有必要採用尖音也只能作為書面上分化同音字的一種辦法，而不是‘調整’北京音系。”

在討論中，大家對以北京音為基礎的提法是同意的，而對這句話的了解却有不同，如俞敏先生認為既承認北京音作基礎，便不能說要有所增減；而林漢達先生認為可以在若干音節上有所增減。

張壽康先生對此發言說：“標準語是一個系統，是一種規範。包括豐富的詞彙和發展了的用詞造句的語法規範和正音法的規範。我們所談的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問題，我的了解是，不能單指北京音，應該還有北京話（首都話）的語法、詞彙。提到標準音，我覺得必先有一個能說這種標準音的物質環境，才算有了可靠基礎。這樣一個物質環境是保證標準音不流於空談的可靠基礎。也就是說，以活語言作基礎，才有發展可能。因此，標準音決不是各地方音生拉硬湊起來的規範。我以為北京音已發展成普通流行的語音，在語音方面的規範化工作上，必須正音，取消又讀，統一讀音，尤其在廣播、話劇、語文教學等方面規定一種加工後的讀音完全有必要。但是在北京音的基礎上加工時必須服從北京話的發展規律，重視它的輕重音和它對外來成分的可接受性，不能隨便加進外來成分。我認為這是規範化工作中應該注意的地方。”

陳剛先生說：“讀書音和白話音不必強求一致，可以根據活的語詞來分別確定。早年所建立的讀音標準也是經過研究選擇的，並不就是北京人口頭上的全部語音；現在因為情況不同，可以在原來讀音標準的基礎上加以整理和加工。標準音的整理是為了使它規範化；書面拼音的加工是為了區分同音字。各地聲調的調類，除入聲外，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們並不強求統一調值。學習調類沒有多大困難，在這方面應避免誇大。字面上是可以把調類標誌出來的。”

胡明揚先生認為拼音文字要照顧方言的問題，實際並不存在，只在詞的拼寫上在有助於區別同音詞時照顧一下方言也就夠了。並且說：“讀音跟語音的區別可以適當地處理。在北京話的基礎上加工，吸收其他方言的語音應該是詞彙問題；北京話的音位系統不能變動。至於尖團音在語音上和拼寫法上都不必分。”許紹早先生對這一點，認為讀音和語音還是要重視它們之間的區別的，因為這是音韻系統上的問題。並且同意尖團音可以不必分。俞敏先生對尖團音問題也

有同樣看法，他認為尖團音問題實際並不如想像那麼困難。他根據實際統計，指出尖音不成問題，必要時只在區別同音詞上分一下。

高名凱先生對於以北京音作基礎的看法，認為北京土音確有些是北京普通話裏通用的。他認為就目前情況說，與其叫北京話，不如叫“首都話”比較妥當。至於照顧方言問題，他說：“我們所謂照顧方言，不一定是把方言的發音法搬到北京話裏來，而是承認方言的存在。但在詞的拼寫上應當相當地考慮到方音的情況，在語音的規範化上依照方音的比較找出它的歷史規律。”

傅懋勳先生認為問題關鍵在於是否能肯定完全根據北京話音位製定拼音文字。他說：“我覺得拼音文字必須根據北京音位系統造字母，再據字母系統構成音節系統，這樣就不必分尖團音，可以不破壞字母系統。至於北京話的兒化，因為是久已穩定的成分，已成為語言的特色，我認為應當保留。聲調是漢語共同的本質的東西，是一個特徵，不能不加重視。有人表示不要四聲，僅在必要時考慮採用，既然連這種本質的東西都可以不表示出來，那末，那本來不存在的尖團音有什麼理由要表示出來呢？事實上，尖團音問題遠不如

聲調問題重要。所以我認為利用聲調和輕重音足可充分出豐富的詞彙，即使拼寫後學習時有一些困難，也是有的。”

對於聲調問題，陸志韋先生認為十分重要。他說：果不要聲調，可以斷言拼音化決不會成功，我覺得在這題上，大家意見已經很接近，現在不必討論。用尖團音區別同音詞的問題，我們固然不應忽視，可是我們要注意話、了解話，不是一個一個詞，更不是一個一個單音，着听、分開着了解的。話裏的詞有的特別加重，有的特長，有的聲調上特別升降，幫助我們辨別同音詞。詞組之間有特別的停頓，因而所謂同音詞是不能孤立地使用把話寫在紙上，情形可大不相同了，話裏的有些標記失去我們不能憑孤立的詞來肯定尖團音是否必需的正字標記。別同音詞的問題還得仔細研究。現在還不能肯定尖團音在正音法上會起多少作用，也不宜乎肯定決不用它。”

茶話會進行至此，大家的意見集中在聲調問題上，後，韋懋社長總結了大家的發言後，認為這次會上能交換意見，把問題逐步明確，對文字改革工作是有貢獻的。調問題將在下次茶話會上繼續座談。

## 關於詞類的討論

1954年6月28日到30日，在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的擴大的公開會議上舉行了關於各種類型的語言的詞類的討論。出席討論會的，除了莫斯科的語言學家以外，還有國內各語言研究所，其他城市的高等學校的代表一百多人。

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語言學博士博爾科夫斯基（В. И. Борковский）致開幕詞，強調指出廣泛討論詞類問題的重要性的及時性。規範化語法和描寫語法的編纂者對這一問題相聯繫的理論性和實踐性的諸問題的闡明尤其感到興趣。

博爾科夫斯基說，在關於詞類研究的全部問題上，還沒有共同的一致的觀點。尤其是下列問題：區分詞類的原則和跟它有關的在某種語言中詞類的數目；充當區別詞類的基礎的共同重要標誌，是否可能確定；根據詞在句子中的句法功能來區別詞類是否正確；在詞類方面是否允許考慮過渡現象和確立某語言的新的詞類。

語言學博士波斯皮洛夫（Н. С. Поспелов）宣讀了他的報告，題目是《詞類是語言結構的問題》。他的報告的出發點是這樣一個論題：詞區分為詞類的基礎在於作為語言基本單位的詞的性質本身。他認為，在語言的一般結構中，詞是語言中的基本的、在完整性和規律性上是唯一真實地被複製的單位。詞類不是只有由語義加以區別的詞的語義類別，也不是只按構形法劃分出來的詞的語法的類，而是詞的基本的詞彙·語法的種類（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разряды слов），在這些分類裏實現了把最概括的詞彙意義改造為對象、行為（作為過程，狀態，品質、數量、狀況的標誌，概括的指示等等）的抽象化了的語法意義。詞類的語法形狀表現在詞的詞形變化的一定性質上（或者相當於這個的不變化性的變化）和它們

跟其他種類的詞的結合性的一定“限制”上，以及構詞法定的形態學類型上。

波斯皮洛夫總結了上邊說的以後，承認劃分詞類的標準是由具體內容抽象出來的詞彙·語法意義，詞在變化的語法變化的性質，和某類的詞跟其他詞彙·語法種類的語法結合性的特點，後者了解為跟某詞彙·語法種類的詞的構成對該詞的可能性本身，由於表徵出每種語言的詞系的詞彙·語法的特殊性，波斯皮洛夫認為詞類體系的具分問題在所有的語族中不能同樣地解決。

語言學博士沙皮羅（А. В. Шапиро）的報告談的是俄語的詞類問題。報告人說，俄語中詞的分類問題成為斯語法學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已經有一百年左右。首該確定語言的每一主要部分（形態學和句法）的對象和界应用到俄語上面，形態學的“恢復權利”本身又意味著必須面地闡明俄語的詞的結構特點是什麼。沙皮羅敘述了福爾士納托夫運用得最澈底的、М. Н. 彼得遜有自己的詞類分類的形態學原則後，進而批判地分析了 А. А. 馬托夫、А. М. 皮施科夫斯基和 Л. В. 謝爾巴的詞類。在沙皮羅看來，這些觀念的主要缺點在於，在確定一個於某類的時候，注意到的不只是詞的形態學的，而且也法的標誌。

報告人也研討了 В. В. 維諾格拉多夫的現代俄語的分類法。沙皮羅說，這一分類法建立在俄語的詞的語的全面考慮上，最充分地反映出存在於現代語言中的詞的廣泛語法歸類的相互關係的一般情況。維諾格拉多夫的書載的詞類分類，把詞分為具有“形式體系”的詞和沒有這“系”的詞，這種分類容易跟福爾士納托夫提出的把詞區“有形式的”和“無形式的”的分法接近。根據沙皮羅的



這樣的詞類區分才最客觀地反映俄語以及其他許多語言的結構特點。根據沙皮羅的定義，詞類是詞的種類，這些被看做是這些詞所表現的最概括的詞彙·語法意義的担屬於詞類的詞的形態結構在發生學上和功能上联系着的範疇性的詞彙意義和它們在句子中的主要句法作用。學形式是被捍衛了的句法形式。在形態學中沒有任何在詞彙中所沒有或以前沒有的東西<sup>①</sup>。可是詞彙意義關係在它們裏面得到反映的所有那些結構因素在俄語中作為它的形態學標誌而那樣牢固地鞏固下來，以致在多數情況下它們自己直接表現為一定的詞類的標誌。沙皮羅說，詞的詞彙·形態學結構以它的附加成分、語音和重音的多樣性的體系，那樣深入到詞按詞類而分化的中，以致在俄語裏碰到一些情況，在詞裏缺乏這些形式在任何程度上也不致於動搖整個俄語的語法體系，從在的最古老的時候乃至現在，它仍舊是明顯地表現出來結構的語言。因此，沙皮羅認為在確定一個詞歸入某類所應該根據的標誌中，加上這樣的標誌就決不是正確。比方，這些詞在句子中執行一定的句法功能——這樣的對於詞類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尤其是，運用到俄語，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談到新詞類的形成，那就是新的一批詞擁有自己的特殊的形態學特點，能夠跟已有的詞類並列為一個語法的種類。根據沙皮羅的意見，學者承認俄語裏存在着特殊的一種詞類——所謂狀態範疇，巧是沒有區別開詞的形態結構標誌和它的句法特性的結果。

語言學博士斯鐵布林卡勉斯基(М. И. Стеблин-камен-的報告《論區分傳統的詞類所根據的基礎》)的主要內容用這種思想，就是說，現有的詞按詞類的分配不能認為科學分類法的結果<sup>②</sup>。

語言學碩士謝伏爾天(Э. В. Севортян)宣讀了他的報告，是《論突厥諸語言中的詞類問題》。報告人強調指出，突厥語言中詞類問題的研討有相當困難，主要是在一種語言範圍內以及在突厥語全部語族的範圍內，靜詞詞類的形態學的不平衡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給所有的突厥語以一般的詞類公式的話，那麼研討出詞類的一般原理並區別一些標準還是可能的。

報告人令人信服地指出，靜詞詞類構詞法形式構成突厥語中詞類的最重要的特徵。謝伏爾天指出，在突厥學者區分的最慣用的標準曾經是、現在還是意義的標準，指的不是語法的而是詞彙的意義，接着它強調說，突厥語言中詞類的語義解釋不包括整個詞類，也不反映它的對於詞類的研究，重要的是詞的語法意義，只是多虧對象的名稱、品質的名稱、行為的名稱才統一為一。謝伏爾天說，不能完全拒絕意義的標準，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它仍舊是決定性的，比方，在分析表示物質、動詞的性質時，就是說，像在 асфальтшоссе[柏油馬路]、[阿拜然語]類型的組合中的時候。對於詞類的評述，所標準都重要——形態學的，語義的(詞的一般語法意義的)。報告人指出，區分詞類的標準，個別來看是不分詞類的。每一詞類應該有它的主要標誌的成員，其對它們來說是補充的。報告人結束說，正確地區分詞類的重要條件是照顧歷史主義原則和考慮所研究的語言

的民族特殊些。

語言學博士巴斯卡科夫(Н. А. Баскаков)宣讀了它的報告，題目是《突厥諸語言中的詞類和詞的形態學結構(以卡拉爾帕克語的材料說明)》。巴斯卡科夫聯系詞的分析，一方面從詞彙和語法意義的觀點，另一方面從詞的物質結構的研究，它的結構成員和功能的確定，提出突厥諸語言中詞類區分和詞類組成的問題的解決辦法。詞類問題只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加以解決：精確地區分出詞的結構成分，研究詞在構詞法和詞形變化的過程中產生的一切詞彙·語法的和功能·語法的範疇。突厥諸語言中詞的形態學分析表明，在上下文中作為詞組要素或者句子要素而出現的詞的結構中，首先分出詞形變化的附加成分，它們跟詞的物質意義關係最少，並且是最概括和抽象的。這些附加成分反映詞在詞組中或者句子中的關係；第二，在接近於詞根的詞形變化附加成分的後面，跟着的是功能、語法的構詞法的附加成分，它們構成詞的第二基礎；第三，形成為詞的第一基礎的、詞彙·語法的構詞附加成分，位於更接近於詞根，直接跟詞根銜接的地方。詞的第一基礎形成詞類——詞的特殊的詞彙·語法種類，它們彼此之間有物質的和語法的區別。

語言學博士貝爾塔蓋也夫(Т. А. Бертагаев)報告的題目是《詞類區分的問題(用蒙古諸語言的材料說明)》。根據報告人的意見，區分詞類的主要標準應該是語法的和詞彙的。語法的標準包括形態學的和句法的標誌。貝爾塔蓋也夫詳細地談到了主導的標準——形態學的標準，他把它了解為跟詞的概括的變化有關聯的一切規則和範疇。句法的標準則了解為形成造句規則並且對句子成分有關係的那些變化。貝爾塔蓋也夫說到詞彙·語義的標準時，指的是詞中最一般的、抽象的意義，這意義按對象性、標誌、行為等等把詞歸成類。報告人強調指出，區分詞類的最好方法是所有標誌的交義的、綜合的、同時的使用。貝爾塔蓋也夫根據這個指出了靜詞的詞類。比方，具有物象意義，具有自己的詞形變化形式和構詞形式的詞，和規定其他靜詞(副詞除外)而担負句子任何要素的功能的物主小品詞，我們建議稱為名詞。報告人指出，在蒙古學中，完全沒有考慮到蒙古語言中語法範疇發展的方向和趨勢以及及物範疇的作用。

語言學碩士蘇尼克(О. П. Суник)宣讀他的報告，題目是《在詞類的一般理論的啓示下論通古斯·滿洲諸語言的詞類》，他指出在科學的語法學中必須確立詞類區分的統一的一般的原則。同時在具體的分析中可能在這些或那些語言的詞類體系中以及同一語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發現相當的分歧。蘇尼克指出，詞類的概念的基礎是詞的概括·語法的意義；它構成每一詞類和從語言中一切被區別開的詞類的實質。任何語言所固有的、詞彙的劃分和物質意義上完全不同的詞合併為少數幾個的概括的類(在它們的語法意義和形式的類似和差別的基礎上)是科學的和教學用的詞類區分的真正前提。

這樣一來，蘇尼克建議把詞類看作是語法的範疇。報告人因此特別談到科學語法學的一般問題——比方，語法抽象問題，語法的範疇問題，語法意義和它們的表現形式問題。

①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俄語», 莫斯科—列寧格勒, 1947, 20 頁。

② 請看他的論文《論語法意義的主要標誌》(《列寧格勒大學通報》, 1954 年第六期)。

報告中頗大部分是討論通古斯·滿洲諸語言的詞類的主要特徵問題的。

語言學博士勒特琴(В. И. Лыткин)的報告專門評述芬蘭·烏戈爾諸語言的詞類。報告人特別強調指出一種情況，就是某種語言的詞類區分只能在從語言的實際存在的體系的基礎上進行。詞類由語言的(而不僅是語義的)一定的標誌表徵出來，而且在不同的語言裏是不同的。

勒特琴的報告的主要內容是芬蘭·烏戈爾諸語言的詞類體系的評述——主要是用科米語和烏德穆爾梯語的材料。

在討論中，除了主要的報告人以外，還有十二人參加，他們是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許多其他城市的語言學家。辯論的主要問題是詞類的性質問題以及跟它有關係的在個別語言中區分詞類的標準問題。

語言學碩士沙拉澤尼澤(Т. С. Шаразенидзе)表示不同意把詞類了解為詞彙·語法的範疇，因為如果這樣了解詞類，研究詞就發生不同原則的混合——從詞彙學、形態學和句法的觀點來研究。如果詞的語義學分類法是包羅萬象的，對於一切語言都同樣適用的，那麼它們的語法分類就給予可能去說明個別具體語言的詞的結構，並確定各種各樣的語言中的結構中的特徵和一般特點。沙拉澤尼澤認為，詞類不應該考慮為詞彙·語法的，而應該是純粹語法的，並且是形態學的而不是句法的範疇。

語言學博士加爾基娜·費多路克(Е. М. Галкина-Федорук)在她的發言中也指出，形態學標準是劃分詞類的最重要的標準，並且強調指出，詞類的形態學標誌既然是反映現實的語言工具，它就是人類思維抽象工作的成果。同時，詞的句法功能在許多場合下也充當區分詞類的工具。

教育學碩士斯皮爾琴(А. Г. Спиркин)在他的發言中說到，詞類是純粹語法的，而不是詞彙·語法的範疇。

札列茨基教授(А. И. Зарецкий)承認詞在語言的結構中的作用是區分詞類的主要標準，把這作用了解為詞的雙重功能——使其他詞服從於自己和自己服從於其他的詞。

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日爾門斯基(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專門談到形態學和句法在詞類的語法形狀中的作用問題。他認為，應該運用歷史·發生學的態度去看詞類，他承認了詞對句子的第一性的意見是不正確的。詞類——這是句子的形態學化了的要素(морфологизованные члены)。可是不應該由此得出結論說，在比方拉丁語和俄語這樣的形態學化了的語言裏，詞類應該在句法上來規定。日爾門斯基認為，詞類可以確定為詞彙·語法的詞的種類。語言學碩士阿弗洛林(В. А. Аврорин)在他的發言中也支持這一觀點。根據他的意見，在區分詞類時應該考慮詞的形態學的和句法的標誌。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謝列布連尼科夫(Б. 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在他的發言裏指出純粹用形態學的原則來區分詞類是不完備的。

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巴爾胡達洛夫(С. Г. Бархударов)引述關於“詞類”概念的實質和詞類區分問題的討論的一些總結後，指出，在各報告和發言中提出的對詞類的兩種不同觀點——詞彙·語法的範疇和語法本身的範疇——實質上不是嚴格地論證過的，因為每個發言的人在“詞彙的範疇”，“語法的範疇”的概念中包含什麼內容，以及如何了解一般的語法(尤其是，語法包括不包括構詞法)，還是不清楚。巴爾胡達洛夫說，如果把語法範疇了解為反映關係的範疇，那麼，就根本不能承認詞類是語法範疇：那只是名稱的範疇，因為它們只指物象、品質等等。與其說它們可以認為是純粹的語法範疇，不如說是詞彙·語法範疇。作為詞類的詞的必要標誌應該是它們具有外部的、物質的標記。巴爾胡達洛夫指出，大部分發言者都傾向於，不承認詞在句子中的功能為區分詞類的主要標準。同時，顯然的，在表徵出詞類的若干標誌之中，必須包括它們跟其他詞的結合能力——關於這點，波斯

皮洛夫在他的報告中令人信服地說到了。

討論中的辯論對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詞類是不種類型的語言的一般範疇。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巴爾胡達洛夫表示支持蘇尼克的理論，就是說，詞類是各種類型的語言所固有的範疇之一，並且兼有不同的語言所共同的特點為某種具體語言所特有的特點。

語言學碩士古赫曼(М. М. Гухман)也指出，詞類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的實質本身聯系着的那樣的範疇，到一定程度為止它是一切語言的一般範疇，各不相同地同結構的語言中實現。另一方面，在語言學碩士阿弗洛林語言學碩士司洛米亞特尼科夫(Н. А. Сыромятников)皮羅教授的發言中，特別強調必須把詞類問題跟具體語言結構特點聯系起來的思想。

在許多發言中接觸到有關個別詞類的解釋的問題。方，語言學碩士阿弗洛林指出，在區分詞類時不應該劃分過大的項目：他認為，詳細的分類更好地反映每一的結構特點。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日爾門斯基批評這種觀點，就是說，在突厥諸語言裏形容詞和動詞不能作為的詞類劃分出來。日爾門斯基又發表意見，認為代詞獨立的(полувнаменательные)詞類。講師伏弗措克(В. В. Вовчок)認為，把代詞劃分為特殊的詞類，如像在傳統法中那樣，是不正確的，因為歸在代詞一類的詞按它們的標記來說是不一樣的。從代詞在語言結構中所起的作用(札列茨基所提出的原則)的觀點看，代詞不構成一種的詞類。這一原則應用到感歎詞和擬聲詞的分析中，就這些詞類所特有的“語法的不活動性”，就是說，跟其他合困難。加爾基娜·費多路克表示惋惜說，輔助詞類的到現在還沒有充分的研究。她認為，關於輔助詞類，不它們不執行稱呼的功能，雖然一些學者堅持這樣觀點，說，輔助詞類不講出現象，而反映各種關係。

加爾基娜·費多路克反對沙皮羅的報告中的一項原表示贊成在俄語裏把狀態範疇(категория состояния)特殊的詞類區分出來的合理性。日爾門斯基在他的發言取相反的立場。他說，從歷史·發生學的觀點看，沒有理由來區分出這一詞類。通常在語義功能的基礎上劃入範疇的詞，在形態學方面是非常雜的詞類，這些詞發生詞化(вербализация)的過程。米爾托夫教授(А. В. Милотов)完全同意日爾門斯基的這一思想。

許多發言中也接觸到詞類中的過渡現象問題。比方列茨基提出這種“臨界”現象的三種範疇：具有各種詞類誌的詞(比方動詞)，具有各種詞類的功能的詞(比方代詞)；由一種詞類過渡到另一種詞類的詞(比方由形容成的名詞，由副詞變成的前置詞)。

大部分發言者對進行討論的結果都表示滿意。同時了個別的缺點。比方，在若干組織性質的嚴重疏忽中，措克指出一種情況，就是說，在討論以前沒有在報告人言人在會上所依據的語言學術語方面進行精確化和一致工作。同時，這樣的工作無疑地會促使在討論辯論中的問題時，對於許多語言學概念的實質的看法達到更大致性。

有人指出，詞類問題是語言科學中那些複雜的問題之一，它們的正確提法和解決對於一般理論方面和實踐方面非常重要。討論毫無疑問會促進蘇聯語言學家在關於詞類用到各種類型的語言的研究上的發展方面能夠進一步有成效的科學研究工作。

Н. З. Гаджиева, Е. А. Иванчикова.

(彭楚南譯自《語言學問題》，1955年第一期)



## “停”是詞嗎？“止”不是詞嗎？

呂叔湘先生的《語法學習》的練習一(8頁)的第一題要讀者辨別“底下這些字裏邊，哪些是詞，哪些不是？”底下一共三十七個字，第一個是“停”，第二個是“止”。在練習一的答案(109頁)裏，呂先生告訴我們，“停”是詞，“止”不是詞。這引起了我的懷疑。記得作者給詞下的定義是“語言的最小的獨立運用的單位”。我不知道這“獨立運用”究竟應該怎樣解釋。如果說“獨立運用”的意思是“不能作為一個詞的一部分看待”的話，那末我認為“止”字也有詞的資格，因為我們可以說“從十二日起到十五日止”。總不能說“十五日止”是一個詞吧？那末，就得承認“止”是一個詞。我不敢相信我的結論，又翻到同書第2頁去仔細研究作者對於“詞”的說明。這一研究使我更加糊塗了。呂先生說：

要知道詞是什麼，還得從語言的本質說起。

我們听人說話，耳朵接觸一連串聲音，同時腦子裏接受一些意義，可見語言是聲音跟意義的結合。詞就是這種結合的最小單位，例如“語言”；再分析下去就只有聲音，沒有意義，至少是沒有明確的意義了，例如“語”和“言”。這個話你也許不信服，你會說“語”字和“言”字是有明確的意義的。要知道這完全是靠漢字的力量，說話的時候是只聽見字音不看見字形的。你單說 y，人家只會想到天上掉下來的“雨”，你單說 ian，人家只會想到廚房裏的“鹽”；誰會想到“語”和“言”呢？只有 y 和 ian 連起來說，人家才知道是“語言”，才是一個正確的意義和聲音的結合體，才能獨立運用，才是一個詞。

按這個說法，“止”當然不是詞，因為單聽見止，我們只會想到寫字的“紙”，不會想到停止的“止”。可是，按同樣的道理，單聽見 ㄒㄩ，我們怎麼知道是停止的“停”而不是亭子的“亭”或家庭的“庭”呢？這個“停”字又是怎樣取得詞的資格的呢？

於是我檢查了一下同一習題裏的其餘的字，發現類似“止”的情形還有“訴”(“訴了一陣苦”)，“實”(“照實說”，“實打實，有一句說一句”)，“髮”(“理了髮”)，“農”(“工農聯盟”)。類似“停”的情形就更多了：TIX 可以是“修”，也可以是“羞”；ㄒㄩ 可以是“城”，可以是“成”，可以是盛飯的“盛”，可以是二乘三的“乘”……為節省篇幅起見，我不寫下去了。

總之，我覺得呂先生對於“詞”的解釋不能適用於他的答案，他的答案不能符合他的解釋，這二者是不相容的。我提出來向呂先生和讀者請教。

附帶着我還想請教呂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在他們合編的《語法修辭講話》第二講起頭說“多音詞裏最常見的是兩個字組成的，我們管它叫雙音詞”，可是底下講雙音詞的構成方式，又說，“第一類是聯合式，就是把兩個同類的單音詞連起來構成一個新詞，如‘鬥爭’，‘擁護’，‘豐富’，‘擔任’等等……”要按這裏的說法來推論，那末，“停止”是一個雙音詞，由兩個單音詞構成，“停”和“止”都是單音詞，為什麼呂先生又說“停”是詞，“止”不是詞呢？(潘山)

潘山先生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語法學習》第2頁對於“詞”的說明跟第109頁的習題答案是不相容的。是哪一處錯了呢？應該說是第2頁的說明錯了。

《語法學習》需要修訂，這是首先要修改的地方。《語法修辭講話》第38頁說聯合式的雙音詞是把兩個同類的單音詞連起來構成一個新詞，主從式的雙音詞是兩個詞裏有一個是主體，無異於肯定所有的雙音詞都是複合詞，事實上當然不是這樣，第8頁對於詞的說明也不是這樣。這完全是粗心大意，前後不相照顧。38頁的“單音詞”應改為“成分”，“兩個詞”應改為“兩個成分”。我非常感謝潘山先生引起我的注意。

《語法學習》第2頁對於“詞”的說明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完全沒有考慮到現代漢語裏同音字的分佈情形。假如每一個音節只分配到一個能“獨立運用”的字，其餘的字都是不能獨立運用的，那末，那一段話還大致近於實際。可是事實上的分配情形不是這樣。拿北京話來說，按它的音韻系統可能有的音節有1600左右，但是這裏面倒有四分之一光景是有音無字的，分配給其餘的音節的字也多寡不等。(1)有些音節只有一個字，如“怪”，“壞”，“苦”，“光”，“廣”，這些音節只要聽到聲音就會聯想到一定的意義(字)。甚至是一個不能獨立運用的字，也會被人想起來，例如听到 liu(上)會想起“柳”，雖然“柳”字並不單用。(2)有些音節分配到的字不止一個，可是只有一個是能單用的，y(上)的情形就是這樣，只有“雨”是能單用的，ting(陽)的情形也是這樣，只有“停”是能單用的(ian(陽)的情形就不完全這樣，“鹽”以外還有“嚴”)。(3)有些音節分配到的字很多，能單用的也不止一個，例如 bao(上)的“飽”，“寶”，“保”，gao(陰)的“高”和“糕”。我們不能因為首先想到的是“飽”就否認“寶”和“保”是詞，也不能因為首先想到的是“寶”就否認“飽”和“保”是詞。如果說凡是一個音節所能喚起的字都是詞，那末只要多想想(尤其是在受過漢字教育的人)，有好些不能單用的字也會被想起，潘山先生舉的“亭”和“庭”就是例子。《語法學習》第2頁的說法只一般適用於第二種情形，沒把別種情形(“柳”，“飽：寶：保”，乃至“停：亭：庭”)考慮進去，顯然是以偏概全，是不合適的。

這是“停”字那一面的情形，現在再來談談“止”字這一面的情形。漢語的歷史演變在現代漢語中造成這樣的一種情況：有好些字，一般不單用，但是在一定的上下文裏，不能不承認是單用(就是說，不能說它是和前面的或後面的字合成一個詞)，例如“止”在“到……止”的格式裏，“訴”在和“苦”同時出現的時候，“髮”在和“理”同時出現的時候。這是很叫人為難的情形。如果根據這些格式決定“止”，“訴”，“髮”是詞，那末連“鞠”和“躬”也都得承認是詞。如果不承認它們是詞，對於這些格式就得有一種解釋。有些語法學家願意承認有一種“可分離詞”，我覺得這不失為一條出路，雖然在劃定範圍上也還有些困難。“實”字應該怎樣處理，需要另作考慮。至於“工農聯盟”，“工農幹部”，“工農速成中學”，那是另一回事。我覺得“工農”只能算是一個詞，正如“津浦鐵路”，“數理課程”等等，只能說“津浦”是一個詞，“數理”是一個詞，不能說“津”，“浦”，“數”，“理”在這裏都是詞。

怎樣分別現代漢語裏的詞和非詞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也是個很不簡單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多討論。(呂叔湘)

# 新書預告

## 論共產主義教育

全一冊 安·謝·馬卡連柯著 劉長松、楊慕之等譯

本書係蘇聯的卓越教育家馬卡連柯的教育論文選集。

全書計分五編：第一編論述蘇維埃人道主義的力量；第二編論述教育學的一般問題，其中包括教育的目的、共產主義教育和行為；第三編論述教育工作方法，其中包括兒童工學團工作方法經驗、教育過程組織的方法等；第四編論述蘇維埃學校中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也談到家庭教育問題；第五編論述教育經驗中的若干結論。在這些論文中，馬卡連柯總結了他多年來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充分表現了他的創造精神和教育機智。

這本書不僅在教育理論和實踐方面給予教育工作者很多寶貴的指示，而且在怎樣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創造性地從事教育工作方面，也給以很大的啟發。

(預計六月份出版)

## 蘇維埃學校的課堂教學

全一冊 伊·恩·加贊采夫著 李鏞等譯

本書闡述有關課堂教學各方面的問題。全書除序言外，分九章：普通學校課堂教學的歷史；蘇維埃學校的課堂教學問題；對課堂教學的基本要求；課堂教學的結構和類型；課堂教學的方法；學生在課堂上的紀律；教師對課堂教學的準備；改善課堂教學的校內教學研究工作；成功的課堂教學所必備的組織條件與物質條件。

本書對師範院校師生和中小學教師深入學習教育學的教學理論部分和提高課堂教學的質量，都有不少的幫助。

(預計六月份出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更正：“中國語文”一九五五年一月號封底廣告內所列“幾何証題集”定價應為8,100元(舊幣)，誤刊為5,600元(舊幣)，特此更正。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〇二二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為定期出版物

每冊定價人民幣二角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一九五五年五月號

第三十五期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社長 章 愨

編輯委員 丁西林 王 力 呂叔湘  
杜松壽 吳曉鈴 林漢達  
高名凱 陸志韋 陳 剛  
倪海曙 章 愨 曹伯韓  
莊 棟 傅懋勳 葉恭綽  
葉聖陶 葉籟士 鄭之東  
黎錦熙 魏建功 羅常培

總編輯 林漢達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  
北京景山東街四十五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佟麟閣路十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  
北京虎坊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

代銷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

1-37,200

預訂

三個月三期 六 角  
半年六期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期 二元四角

寄費

1. 平郵寄費不計  
2. 掛號郵費由定戶負擔

100